

出版者說明

拉薩爾主義是德國工人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中最早的機會主義流派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拉薩爾主義的鬥爭，是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的一次劇烈的交鋒。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一再指出，需要“肅清關於拉薩爾的神話”，並且在這方面進行了許多工作。然而近百年來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分子，卻把拉薩爾的機會主義當作傳家寶，利用一切機會來大肆宣揚。在這方面最賣力的一个就是伯恩施坦。他公然提出了担負“為大家復活這一被遺忘的遺產”的任務，為此他不僅編輯了拉薩爾的語錄、講演和論文集，而且还寫作了三種關於拉薩爾的專著，本書就是其中之一。

本書是伯恩施坦一九〇四年為紀念拉薩爾逝世四十周年而寫的。書中系統地介紹了拉薩爾的生平和他在全德工人聯合會中的活動，重點地評介了拉薩爾在各個時期的主要著作。伯恩施坦在評述拉薩爾的生平和活動時，竭力想把拉薩爾描繪為一個工人階級的“先進戰士”，說他“嚴肅地對待勞動人民的事業”，“对党始終無限忠誠”，他的缺點“終究是其內部閃爍着真正的金光的明星上的斑點”，根本不提他的原則性的機會主義錯誤。相反，他還盡力吹捧他的機會主義觀點，千方百計地用這些觀點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主張。例如伯恩施坦在書中大力宣揚拉薩爾的通過普選權求得工人階級解放這一實質上是主張和平過渡的論點。他屢屢引用拉薩爾的話說明直接的普選權不僅是工人的基本政治原則，而且是工人的基本社會原則。對於拉薩爾宣揚這些論點的《工人綱領》，伯恩施坦恭維為“工人階級的一曲頌歌”，認為“作者真正科學地洞察了歷史事件”。拉薩爾為了換取普選權和國家對合作社

的資助，無耻地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公然勾結俾斯麥，伯恩施坦却不惜抹煞歷史事實，為之辯解說，“拉薩爾就是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同政府有若何聯繫”，說這一切“只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慮”，認為“拉薩爾的策略手段從原則觀點看來是有充分根據的”，而德國之所以有直接的普選權應歸功于拉薩爾。伯恩施坦對普選權的這種頌揚，在一九一九年寫的本書第二版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了。他在这里大肆攻擊蘇維埃制度，原因就因為它用“階級選派代表權來代替普選權”。他特別不滿意剝奪資本家的選舉權，認為這是“不承認資本主義企業主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所承擔的經濟職能，……直接抑制其有效地為文明進步創造基礎的這種職能”。

拉薩爾在德國統一和意大利戰爭問題上曾經同馬克思恩格斯發生過沖突。拉薩爾主張在普魯士的領導下從上面來實現德國的統一，並且趁意大利戰爭的機會來打擊奧地利。他所著的《意大利戰爭和普魯士的任務》和恩格斯在《波河和萊茵河》一書中所闡述的觀點直接對立。伯恩施坦敘述這一史實時也顯然袒護拉薩爾的機會主義觀點，硬說拉薩爾的“政策”是“既合理而又具有民主精神的”。關於拉薩爾的歷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伯恩施坦也作了錯誤的評價。馬克思早就指出這個劇本錯誤地把騎士而不是農民和城市平民看作十六世紀革命的动力，把農民運動污蔑為反動的。伯恩施坦避而不提這些錯誤，反而贊揚說，劇本的“傾向是絕對革命的”，具有“豐富的思想內容”。

拉薩爾在工人運動中舉起了機會主義的旗幟，他的有些做法連伯恩施坦也不得不稱之為“冒險的賭博”，承認“拉薩爾非常喜歡和其他政黨及官憲進行政治勾結”。他說，拉薩爾“是極易被視為機會主義精神之父的”，但馬上又為之開脫說，“然而拉薩爾不是一個機會主義的理論家，因此在具體場合下是否可以這樣稱呼拉薩爾，還是很成問題的”。他還為拉薩爾的宗派主義辯解，說那種認為拉薩爾犯了宗派主義的看法是“非常肤淺的”，“在拉薩爾身上很少有宗派主義的傾向”。

整个来说，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是一个美化了的、不真实的拉萨儿，但是透过这些描述，我们却完全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伯恩施坦。它使我们知道伯恩施坦主义同拉萨儿主义的渊源和联系，更清楚地认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面目。此外伯恩施坦在论述拉萨儿的为人、作风以及私生活等方面时，也无意中勾画出一个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的面貌，对于我们了解拉萨儿的这方面情况起了一些提供材料的作用。

这个译本大部分是根据圣彼得堡格拉哥列夫出版社出版的《拉萨儿文集》第一卷所载俄译文并参照德文原文译出的，第一、二、四、五章和第二版跋及附录则是直接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

目 录

第一版序	1
第二版序	2
一、拉薩尔的出身和青年时代。他的日記	3
二、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案件	9
三、革命年代中的拉薩尔。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說	12
四、反动年代和哈茨費尔特案件的結束。《赫拉克利特 的哲学》	14
五、新紀元和意大利战争。《弗兰茨·馮·济金根》	19
六、《既得权利体系》	25
七、拉薩尔和柏林社会。洛塔尔·布赫尔和《尤利安· 施米特》	32
八、拉薩尔在柏林的头三个讲演。《費希特的哲学》；《論 宪法的实质》；《工人綱領》	36
九、拉薩尔的刑事案。《科学和工人》的演說和論間接稅 的文章	42
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公开复信》；《論工人問題》； 《工人讀本》	45
十一、拉薩尔在联合会的初期活动和策略的改变。莱茵 “閱兵”讲演	57
十二、“圍攻”柏林和俾斯麥。告柏林工人书和叛国案	65

十三、拉薩尔的主要經濟著作：《巴师夏-舒尔采·馮·德里奇》或《資本与劳动》	71
十四、在德国国土上的最后几个月。在龙茨多弗的演說和杜塞尔多夫案件	77
十五、拉薩尔爭夺海倫·馮·敦尼盖斯的斗爭。拉薩尔之死	85
十六、拉薩尔的生平業績	94
第二版跋：拉薩尔和布尔什維主义	101
附录：拉薩尔致筹备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錫委员会的两封信	
一、拉薩尔談他的发展过程和对工人运动的态度 的信	105
二、拉薩尔关于《公开复信》和檢驗工人成熟程度的信	109



第一版序

本书准备简略地评介拉薩尔的生平和活动。我以极大的兴趣从事这一工作。我曾不止一次地給工人们讲课，每一次都使我确信，工人、特别是工人中年輕的一代对拉薩尔知道得太少了，其中多数人完全不知道拉薩尔留給工人阶级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我想用本书来为大家复活这一被遗忘的遗产。

本书对拉薩尔的评价，在某些方面和我在拉薩尔全集德文版的序文中所作的评价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原因很简单，以后对拉薩尔較詳尽的研究和我自己的理論发展使我能更好地理解他，现在拉薩尔的形象比我在写作上述序文时更为完整地浮在我的面前了。但是，现在我所力图做到的只有一点——首先說明其名声的真相，我极力避免对拉薩尔个人盲目的或过分的崇拜，而只想給予这一喚起德国工人运动的人物以应有的评价。工人阶级不需要圣徒傳。它不怕在描繪其先进战士时将其缺点公諸于世。而对拉薩尔來說，把他的缺点和弱点公諸全世界也并不可怕。这终究是其内部閃爍着真正的金光的明星上的斑点。

我对拉薩尔的评价在某些地方几乎和海·昂肯博士不久前发表的拉薩尔傳^①中的論点完全相同。对此我必须声明，我是在本书手稿已經付印的时候才看到昂肯的著作的。

爱·伯恩施坦

一九〇四年八月于柏林

^① 海爾曼·昂肯：《拉薩尔》，斯图加特，一九〇五年版。

第二版序

本版是十五年前写就的紀念性著作的第二版，作者对印刷中的錯誤和風格不協調的地方作了仔細的校訂。此外，我认为应当指出的是，在本书的附录中我增加了由昂肯教授发表于格吕恩别尔格主編的《文庫》中的两封拉薩尔为召开全德工人大会致莱比錫委员会的信，这是评价拉薩尔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有力价值的文献。再者，还有一个需要提請注意的地方就是我在“跋”中对俄国布尔什維克及其派別最近所宣揚的輕視平等、直接的普选权的社会作用的思想所作的某些評論，而号召德国工人争取和运用这种选举权，恰恰是斐迪南·拉薩尔的偉大功績。对著作本身我没有作什么实质性的修改。

爱·伯恩施坦

一九一九年八月于柏林



一、拉薩尔的出身和青年时代

他的日記

斐迪南·拉薩尔一八二五年四月十一日生于布累斯劳。他的父亲海姆·拉薩尔是个富有的絲綢商人，并且根据现有的材料看来，他是一位能干而性格刚强的人。拉薩尔本人經常怀着无比的敬爱談起他的父亲。看来，他的母亲不大惹人喜欢，而拉薩尔的一部分缺点甚至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他是一个健壮、漂亮、在許多事情上显得異常早熟和极有才能的少年。一八九一年首次在布累斯劳出版的他的日記可以证明这点。未滿十五岁的拉薩尔从一八四〇年一月一日开始写日記，一直記到一八四一年春天。这本日記相当清楚地揭示了拉薩尔的家庭生活和他本人的思想发展，同时也在无意中展現了一幅未加修飾的他那时代文化生活的图景。

起初，拉薩尔在布累斯劳的一所新学制的中学学习，后来，轉到同地的馬格达雷那中学学习，他的日記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的。他并不是通常所謂的那种模范学生，他不断地同教师們找麻煩，像那些頑皮而任性的小伙子一样干出各种各样恶作剧。他常常草率地对待学校的作业，在不得已的时候，他毫不在乎地照抄同学的作业。然而，他却很爱看书，并且，从日記可看出，他能深刻地理解通常易为其他少年所忽視的那些作品。十五岁的拉薩尔談吐已經“像大人”一样，而成年人在談話中也往往把他当作大人来看待。下面这个例子就很能說明他的特点：他在一八四〇年四月四日的日記中写道，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应当讀希腊或羅馬詩人的作品来代替德国小說和德文詩集，“看起来，按照父亲的意見，做一件事不是

为了事情的本身，讀荷馬的詩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思想和充实自己的心灵，不是为了欣赏美和詩人的才华，不是为了让它影响我們的道德原則，而仅仅是为了学希腊文！！”

四天前，即一八四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拉薩尔的日記写道：“今天，我起床之后，讀維兰特^①的《詩神繆司》、《智慧三女神》和《被控告的阿穆尔》^②。維兰特这个老色鬼，这个浪蕩哥儿和寻花問柳之徒，他只是把丰满的乳房看得高于一切！人們常說，应当憎恶那些邪书，只去讀古典著作。去讀讀維兰特的杰作吧，看看是否比保尔·德·科克的最邪恶的小說更加猥亵一些。”

由此可见，一个尚未滿十五岁的青年，已經讀了保尔·德·科克的著作，并以一个成年人的眼光来評論他和維兰特的淫猥作風了。

几星期以后，在一八四〇年四月，父亲发现，斐迪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学生成績单方面有欺騙他的行为，甚至在这上面伪造他的签名，这个发现使父亲难过得掉下泪来，結果拉薩尔按照他本人的願望被送到萊比錫的一所商业学校去学习。但是，在那里，又重复了过去在布累斯劳时的行为。拉薩尔还是吊儿郎当，常常与教員和同学发生爭吵，但是，在智力方面，他已經达到了应有的高度。一八四一年八月的证书表明，他在各門主要学科上获得了良好的分数。但是证书上批着，“應該可以学得更好，須严加督促。”校长还进一步指出：“他既得不到教員又得不到同学的尊重。”证书里的这种藐視的評語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这个原因我們不能仅仅从上面提到的拉薩尔的缺点中去寻找。一种新的思想注入了拉薩尔的腦子，这个十五岁的青年人开始研究起政治問題，并成了狂热的民主主义者。許多年以后，他在給卡尔·馬克思的信

① 維兰特，克利斯托夫·馬丁（一七三三——一八一三年），德国作家，曾参加十八世紀温和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譯者注

② 阿穆尔，古羅馬的爱神，古希腊爱神爱羅斯傳入羅馬后的名称。阿穆尔被描写为身背弓箭，生有两翼的孩童。——譯者注

中写道：“我所写的东西和論文证明，我从一八四〇年起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了。”（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一日致馬克思的信）他的日記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他的日記还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地方，

“除了开始讀埃尔斯納的《拿破侖一生中重要的日子》外，沒有做別的事情。多么有力的語言，而又多么憤激地反对暴君的独裁制度！人們几乎不能相信，一个德国人会如此强烈地热爱自由。一本絕妙的书！”（一八四〇年七月三——四日）

“……尽管現在我怀着革命民主共和主义信念，但是，我仍然这样感到，如果我处在拉梵伯爵（席勒的《費埃斯柯》）的地位上，我说不定也会像他那样的做，不满足于做热那亚的第一市民，而要伸手去取王冠。由此可見，如果我对这件事仔細加以观察，就会发现，我簡直是个利己主义者。假如我的出身是王子或公爵，我将是个彻头彻尾的贵族，但是，我不过是一个普通资产者的儿子，因而我将是当代的民主主义者。”（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九日）

这些話可以证明，作者是多么深思熟虑和多么喜欢作自我批評！

“但是，为了做个买卖人，我自願放棄了艺术生活，虽然我的父亲劝說并誘导我繼續求学……然而一般說来，这使我过早地处于十字路口，而如果不是父母的督促，那么我当时那非常可怕的处境反正也会把我推到这个地方去的，而那种处境我是願意不惜代价以求摆脱的。我已看到，我不能总是在那里編造謊言，它已行不通了……，我应当老实地說，任何人不能迫使我放棄社会的、美学的或者政治的活动……我信賴偶然的机緣和我的坚强意志，我宁願为繆斯女神忙碌，而不願和总賬及流水賬打交道，宁願去探討希腊和东方国家，而不願去識別鮭藍和甜菜，宁願为塞来阿^①和她的祭司們奔走，而不願为老板和他們的店伙忙碌，我更关心的是自由問

^① 塞来阿，司快活田园生活与喜照之女神，为九艺术女神之一。——譯者注

題，而不是商品的价格，我比咒罵搞坏行情的竞争者更猛烈地去咒罵貴族的走狗，这些家伙从人們那里搶去最貴重的財宝。誠然，不應該只停留在咒罵上。”（一八四〇年八月三日）

“但是，不，即使我在这方面有才能，（1）我也不願意做一个胆小怕事、吹牛拍馬的趋炎附勢的小人！我要向人民宣告自由，尽管我会因这种嘗試而牺牲……啊！法兰西，我梦想、我渴望的国家！啊，你是多么地吸引着我！你争得了自由，你是自由的故乡。但是你还是沒有放下武器。你認識到，还必须做些什么，同时不被阴險的貴族的諾言所麻醉。”（一八四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总之，遺憾得很，我沒有繼續求學。現在我很清楚，我想成为一个作家……我将像白尔尼一样，从巴黎这块自由的国土上向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們发出号召，而所有的王公們将会吓得发抖，并意識到他們的末日到了。瞧，我給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設置了何等的障碍！我的敌人将如何地侮辱一个以尺换笔的开小差的商人……‘小商人！’、‘小販！’从四面八方发出了唧唧喳喳的咒罵声。然而偏見不得不退出宝座，小商人用他的話說得他們哑口无言了。”（一八四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我爱这个海涅，他是我的第二个‘我’。多么大胆的思想，而語言又是多么有力！……这个人从自己头上扯下了雅各宾式的帽子并在他优美的鬚发上戴上飾有金銀絲帶的帽子！我常常想，当他說：‘我是保皇党人，而不是民主主义者！’的时候，那不过是开玩笑，我觉得，这是一种諷刺，可能事实也正是这样。”（一八四〇年九月九日）

“午飯后，霍施凱尔（教員）发还我的德語作文《友誼的原則》。我在这篇作文里猛烈地攻击了所有的庸人市儈和愚蠢的理論家。我根本就不想去創立什么友誼的原則，我的作文无非是痛罵那些甚至想为我們的感情規定准則的人……霍施凱尔首先跟我爭論起来，在这次爭論中我仍然成了胜利者。由于我推崇那种真正的、高尚的友誼的理想观点，人們把我叫做狂热者。可怜的人們！如果

他們目前就这样冷靜地談論友誼，那么，五十年后他們对友誼还将說些什么！……

今天晚上，L. 到我这里来，我和他玩惠斯特牌。无耻到难以想像的地步。到一个昨天要你从他家滾蛋的人那里去！我无法理解。当我看到这种人或类似这种人的时候，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立刻抓住我。因为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犹太人之所以被輕視的真正原因。而这一流人物正好促使别人这样对待他們。这是思想卑鄙，这是奴顏婢膝，这是庸俗行为，——呸，多么丑恶的混合物！我和L. 交談，請他还来串門，以便有可能研究这一流人物的性格。

犹太人唯一的、天赋的良好品质是温厚，而他就是高度温厚的人。”（一八四一年二月十七日）

“今天演出了《埃格蒙特》。令人惊奇的是，永远臉帶笑容的哥德竟能写出如此一再談論自由和宪法的作品。当然，关于自由的話是对人民說的，而不是对它的王公們說的。”（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人們从这些引文中可看出，这个年轻人内心是多么的激动。当然，不能把他在這裡所說的全部极端激烈的思想都看作是拉薩尔本人想出来的。誰要是熟悉“青年德意志派”以及正是在这时候非常活跃的激进的左翼黑格尔主义者的作品，誰就很容易在拉薩尔的这些話中听到这类作品的回声。但是，这些話毕竟不只是个回声，这些思想已在这个青年人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在父亲同意他重新留在商业学校以前，这位充滿了推翻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大厦的战士的精神的拉薩尔一直无法平靜下来。他要学习，但这不是为了謀取一块面包。他的最后一篇日記記載了他和父亲的一次談話，時間大約在一八四一年降臨节前后。父亲問拉薩尔打算研究什么时，他回答說：“研究世界上最偉大最广泛的科学，这門科学和人类最神圣的利益有着最紧密的联系，这就是历史的科学。”他父亲曾劝他說，作为犹太人別想能在普魯士得到大学教席和一般的官职，而他为什么不去学医或学法律呢？拉薩尔回絕道：“医生

和律師都是用自己的知識作交易的商人”，而他則打算為**事業**本身，為**工作**而學習。

他，雙親的唯一的希望，他們未來的唯一的依靠，為什麼要去做一個殉道者、犧牲者——他父親的這一忠告對這個發熱的頭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假如所有的人都這麼說，假如所有的人都這樣胆怯”，拉薩爾在日記中寫道，“那末，戰士從何而來呢？為什麼我應當做一個殉道者呢？為什麼？因為神的声音号召我去斗争，因為上帝給我以力量，這種力量（我感觉得到）使我具有斗争的能力，因為我能夠為崇高的目的而斗争并忍受苦难，因為我不願欺騙上帝，它為了特定的目標而給我以力量，總之，因為我沒有其他辦法。”而父親終究還是不了解他。“他使我能夠學習，但不承認他稱之為自由主義的那種神聖而高尚的思想！仿佛不是它、不是這種思想驅使我去學習，仿佛我不是打算為這種思想而斗争，而如果没有這種思想，那我倒寧願使自己像現在這個樣子的。”

日記以這些話結束，這對少年拉薩爾的高尚精神來說就像是個政綱。漂亮的結尾。拉薩爾滿懷著這種思想開始準備考大學了。從拉薩爾的這個自白中可以感覺到一股古老、偉大、無所不包並且充滿了人類解放思想的自由主義氣息。在上面所引的給馬克思的信中，拉薩爾還說，他“從一八四三年起就已經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了”。這就是說在日記上寫完最後幾個字的兩年以後，拉薩爾已經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在《萊茵報》和當時的其他新聞刊物上已經找到了自己的辯護人。在精神上這位十八歲的青年人是不会停留在半路上的。

在離開商業學校一整年之後，拉薩爾已經打算放棄參加大學的入學考試的想法了。起初他研究語言學，以後改為哲學，並在這兩個科學領域內擬定了一項規模龐大的工作計劃。拉薩爾的這項工作是研究希臘哲學家埃弗塞斯的赫拉克利特的哲學，赫拉克利特由於他的學說的難以了解，從來都是學者們的一個難題，然而同

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的思想家能用比赫拉克利特更为鲜明的形式来表述世界处于不断地发展中这一革命思想。

拉薩尔开始从事这样艰巨的工作这件事本身，是很能说明他的特点的。这证明他既深信自己的力量，也忠于人类最伟大的思想。他选择了一位思想家作为自己的第一个课题，而这位思想家只给我们留下一些残缺不全的语录。不过，这项工作他只是在这以后经过十四年才完成。

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案件

为了求学，拉薩尔首先到了柏林，在那儿他经常和著名的学者们往来，并从亚历山大·冯·洪堡那儿得到“神童”的外号。为了在各种图书馆内进行研究，他于一八四五年先后来到了莱茵省和巴黎等地。在巴黎，他结识了海因里希·海涅，并为这位亡命他乡的诗人在遗产的争执上出过很大的力。海涅给拉薩尔以很高的评价，这可以从他为拉薩尔所写的给万哈根·冯·恩塞^①的一封信推荐书得到证明。信中说：“他把那使我不胜惊奇的意志力及工作才干和那种我所曾见过的坚实而渊博的学识、广泛的知识和过人的机智融合在一起。”对海涅来说，拉薩尔是“新时代的真正的儿子，这个时代不知道棄絕私利和謙恭溫雅为何物，而我们那时代却多少有点虚伪地以此为满足，并以此为炫耀。这新一代需要享乐，它想要显露头角”。令人惊奇的是，这位扶病的诗人用这短短的几句话概括了少年拉薩尔的日记中如此强烈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特性，虽然在日记中这一切还只处于萌芽状态。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就在留居巴黎的这段时间内，拉薩尔在自己的姓——Lassal之后加上了一个法语音节“le”。为什么要这样

^① 万哈根·冯·恩塞(一七八四——一八五八年)，德国作家。——译者注

作，是想使法国人在念自己的姓时容易些呢，还是有别的根据，这很难说。不管怎么样，他是很喜欢这种新的写法的，自此以后一直保留了这种写法。这种写法在德国有个好处，不大容易立刻从姓上认出带这种姓的人的犹太血统。拉薩尔不止一次地说过，犹太血统成了他的负担；在性格方面，他与现代的犹太人毫无共同之点；他在自己同时代的犹太人身上所看到的只是“伟大的、但早已成为过去的老一代的极端堕落的后裔”。这是他在1860年十月写给索菲娅·桑采娃的自白书中所说的。这虽言过其实，然而却完全可以理解地总结了犹太人的某些缺点。

回到德国以后，拉薩尔于一八四六年一月在柏林认识了索菲·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当时她为离婚和分出应属于她的那一份财产问题而与自己的丈夫、一位极富有和极有势力的普鲁士封建主进行激烈的斗争。由于丈夫有权有势的人情关系，甚至那些为伯爵粗暴地虐待伯爵夫人而愤愤不平的亲戚也抛开她不管了。她已经失去了获得自己权利的任何希望。无论到哪里，她都碰到重重障碍。显然，只有法庭才能够制服这位专横的伯爵的顽固执拗。然而就是起诉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办法，因为封建贵族在当时享有巨大的特权。除此以外，起诉这一事实本身势必使伯爵夫人在她那圈子里完全孤立起来。因为在那种社会里，公开揭露丑事的人比干丑事的祸首更惹人厌恶。因此伯爵夫人根本不知道她该怎么办了。当一八四六年复活节伯爵打算用威胁手段从她那里夺走留在她身边的十四岁的小儿子保尔时，她的绝望达到了极点。拉薩尔认识伯爵夫人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她的命运打动了她，他表示愿意帮助她。拉薩尔不是一位律师，但是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深信自己有办理伯爵夫人案件的力量。在拉薩尔的眼中，伯爵夫人是受迫害的牺牲者，阶级或等级在这里起了压迫者的作用，正如他的日记所证明的，拉薩尔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对它怀着刻骨的仇恨。伯爵夫人案件在他的眼中变成了具有莫大重要性的政治事件。后来，他曾在给索菲娅·桑采娃的信中写

道，他对伯爵夫人案件的看法，就像罗伯斯庇尔在其宪法条文中所說的那样：只要有一个人遭受压迫，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压迫的社会。为伯爵夫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对他来说是一场反对国家上层特权的革命斗争。

当然，这是言过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问题根本不在于卫护新的权利，而是对现存的旧的权利的解释；问题是在业已过时的法权的基础上、在旧的特权范围之内的司法争讼。但是如果就形式而论这儿有错误的話，那么特殊情况多多少少宽恕了拉薩尔的行为。社会建筑可以从内部来动摇；法权上的变革也可以通过用新的精神来解释它而达到。而事实上拉薩尔保卫伯爵夫人的斗争有时是具有革命冲击的性质的，但是接着就又变成普通的、而且相当不干净的离婚和财产案件，充满了通常的妥协、勾结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

在这个哈茨費尔特訴訟中，特别吸引社会注意力的是著名的**首飾匣案**。

一八四六年夏，拉薩尔秘密派遣他的两位自願效劳的朋友門德尔森医生和法官奥彭海姆到伯爵的情妇那里去向她打听关于贈与证书的事，据揣测，这份贈与证书应当在她那儿。这是反对伯爵的重要罪证。在科倫，奥彭海姆遇到了一个机会，能把估計装有所探寻的文据的首飾匣弄到手，他毫不犹豫地就干脆偷走了它，并把它轉交给門德尔森。但是后者还没有来得及把匣子藏在安全的地方，警察就出现在他面前了。只是逃跑才使他免于被捕。他不得不丢掉他自己的藏有首飾匣的箱子。結果箱子落到了警察手里。根据在箱内发现的字据，警察局按盗窃嫌疑罪逮捕了奥彭海姆，并把他送交法院审判。在法庭上，他招认了全部罪行并說明了他这样做的动机。法院判他无罪。后来門德尔森从国外回来，也同样出庭受审。一八四八年一月，科倫陪审法院判他五年苦役。后来，这项惩罚赦减为一年徒刑，規定刑滿后不得留在国内。哈茨費尔特伯爵对这一通过影响輿論（如果不是直接賄賂的話）而爭得的

严厉的判决并不感到满足。他向这个用一系列案件搞得他非常恼火的拉薩尔提出了思想上教唆盗窃的控告，并找来了形形色色的证人。伯爵上下左右使用了大批金錢，还收买了拉薩尔的佣人来作伪证。但是三月革命的爆发和拉薩尔頑强的毅力破坏了伯爵的全部计划。一八四八年八月开始公开审理該案，持續了七天。拉薩尔由自己作辯护，在辯护中他施展了自己的全部雄辯的口才，及他在这段期間所获得的全部法学論辯术。他在談到自己在这方面的修养时說：“在办理这些案件时，我自己成了法学家。几个月之后我已經能够和律师較量了，而再过两年，我可以說，我已經比他們所有人都高出一头了。”（給索菲婭·桑采娃的自白书）他的結語长达六小时，他以惊人的技巧使之成为对伯爵的强有力的控訴。这一讲演后来曾出单行本，以《关于首飾匪的演說》这一标题而馳名。

拉薩尔被宣告无罪。由于这一案件，他成为非常出名的人物了。他善于把民主派报刊吸引到他所捍卫的事业这边来，同时（还是不免有夸大之处）把伯爵夫人的处境同无产阶级作类比。

当他回到当时他居住的杜塞尔多夫时，大批的人群用欢呼来欢迎他。人們从他的馬車上卸下馬来，他如同凱旋一般騎着馬游遍了全城。

三、革命年代中的拉薩尔

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說

然而拉薩尔呼請民主派給予协助并不是为了謀利。現在他自己也为之尽力了，他成了杜塞尔多夫民主派的领导人之一，和萊茵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建立了联系，該中央委员会設在科倫，其领导人是卡尔·馬克思。拉薩尔常常往訪科倫，不久就和馬克思以“你”来互相称呼了。但是他們从来也沒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

友，并且以后也没有成为这样的朋友。但是拉薩尔对比他年长七岁的馬克思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极为敬重。作为社会主义者，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非常接近，在反动年代里一直是他的忠实的朋友。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普魯士政府解散了国民議會，在柏林宣布了戒严。莱茵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要求莱茵省的一切民主团体拒絕納稅并組織武装反抗。杜塞尔多夫是这一号召得到有力支持的地区之一，拉薩尔非常热心地进行了組織和武装工作。他参加了民軍，而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已經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以杜塞尔多夫区民軍的名义給国民議会的信，其中写道：

“我們向国民議會宣誓，我們手握武器等待着它的召喚，以便向它表明，祖国儿女的力量还没竭尽。”

出自拉薩尔手笔的杜塞尔多夫民軍的另一封信中說：

“消极反抗已經結束。我們恳求国民議會：去号召武装、号召尽責！”

然后，在拉薩尔于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給阿尔滕基尔申区維尔芬农业家施坦吉尔的信中我們看到：

“不久全国将武装起来。武装你們那边的入們，关心他們的装备吧。杜塞尔多夫不久将爆发斗争。我希望你在接到这一消息时馬上帶領数百人上这儿来……不管怎么样，这一次我們定将胜利，到那时候你們的贫困也就永远結束了”。

同一天，拉薩尔和工人彼得·韦耶尔斯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諾伊斯召开了人民大会，会上他再一次号召人民武装起来。而发出同样号召的韦耶尔斯除此以外还高呼：“处死国王！”

一天以后拉薩尔和韦耶尔斯就被捕了。审讯拖了一个月，为加速审讯而采取的一切可能的措施都没有收效。拉薩尔在獄中越是对逮捕提出抗議，社会上声援他的运动越是强烈，他的控告者也就越需要等待审理案件的有利时机。同样被捕的杜塞尔多夫民主派首領康塔多在三月月中旬已經获釋，停止了对他的控告，然而还

是沒有釋放拉薩爾和韦耶尔斯。韦耶尔斯显然只是用以对拉薩爾起訴的掩蔽物。个人的影响、向拉薩爾报私仇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了保证能把拉薩爾定罪，对他提出了双重控訴；如果陪审法庭判決无罪，那么后边还有逃警法庭。

陪审法庭证实这种考虑是确有根据的。不錯，資產階級已經放松和反动派的斗争，但是它还没有卖身投靠他們。一八四九年五月三日和四日开始审理了，——然而拉薩爾的法官們还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审理的前一天拉薩爾发表了他的辯护詞。根据这一点，法官們决定不公开审讯。拉薩爾的一切抗議都沒有結果，于是他干脆拒絕辯护，并說服陪审法官們，要他們同样拒絕执行其法官的職責。看来有些陪审法官願意照这个建議去做，但是多数人却另有打算。沒有怎么犹豫，他們就判決拉薩爾和韦耶尔斯两人无罪。但是拉薩爾还没有立即获得自由。根据第二个、可以称之为后备的控告，他繼續被監禁在獄中。逃警法庭終於开庭了，职业法官們比較好說話，拉薩爾被判6个月的徒刑。

拉薩爾的上述辯护詞曾以《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說》（五月三日于杜塞尔多夫）为题出版并多次再版。如我們所知道的，这一講演沒有在法庭上发表，它是遞交給法官們的。这一演說不免有些矯揉造作的动听的廢話，但是即使如此，它仍然卓越地捍卫了人民用武装反抗来对付任何侵犯宪法的权利，同时，它也提供了一八四八年斗争中宪制这个側面的鮮明的图景。

四、反动年代和哈茨費尔特 案件的結束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

拉薩爾甚至在坐牢的时候仍不遺余力地繼續办理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的案件。除了其他一些方便而外，他还爭得了当需要出

庭办理伯爵夫人的案件时可以离开牢房的权利。但是，反动势力开始抬头了，他在法庭上遇到的已是另外一种气氛。以前绝大部分是同情伯爵夫人的，现在对革命以及一切与此相关的东西的仇恨笼罩着法庭。一次又一次的审讯都遭到了失败，然而拉薩尔并不让步。在一八五四年夏天他终于战胜伯爵以前，他一直用顽强的毅力不断地去搜寻新的材料，重新进行斗争，他用书面和口头的答辩使伯爵的律师和法官们大伤脑筋。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写道：“我终于打败了这个绅士！我终于把他踩在脚下了！我终于把这个女人从他的暴力下解救出来，并迫使他把他很大一部分财产分给了她。”

一八五七年交易所发生巨大危机的时候，伯爵夫人损失了这笔财产中的一大部分。另一部分她给了她后来从事外交工作的儿子保尔。她给自己留下的也不少，足供她过十分富裕的独立生活了。拉薩尔获得了七千塔勒的固定年金，这样他也能随心所欲地过活了。

如果说哈茨费尔特案件是顺利地完结了，那么，在另一方面，它却给拉薩尔带来了一些损失。虽然未必能有其他线索可以证明关于他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除了友谊和同情外还有其他关系，然而还是有许多人（不只是资产阶级庸人）攻击他，认为拉薩尔是不走正道的人物，似乎是他诱使伯爵夫人出头露面的。在审讯期间，拉薩尔不得不访问各种形迹可疑的人物，以搜集有关伯爵荒淫放荡的材料，而这种行为未必能对他的性格产生有益的影响。后来同索菲·馮·哈茨费尔特的友谊对拉薩尔今后的行动是否就没有大的坏处，这也是大可怀疑的。事实上，这种与爱情全然无关而是出于强烈的内心的热忱的关系，正好对拉薩尔这样的人物的行动会产生极强烈的影响。索菲·馮·哈茨费尔特是一位聪慧、有教养且有才能的女人。她的极广泛的交际和作为上流社会妇女的一些看法，一定使拉薩尔获益不浅。关于索菲·馮·哈茨费尔特，拉薩尔在写给索菲娅·桑采娃的信中说，“她使我变得比先前好多

了。当然，我可以說，我有着一颗无比热情的心，但是我身上也有各种毛病。我本性粗野，易暴怒也易陷入狂热；而有时则严酷无情。她帮我矫正了这些毛病。她使我好的本性获得了发揚，坏的受到了抑制。”他簡直无法称道她那“心灵的高尚和情操的偉大”，他要求他的未婚妻像热爱自己的亲生母亲那样，“用儿女的真情”去热爱索菲·馮·哈茨费尔特。他說：“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感到幸福。”毫无疑问，这是他真挚的感情。^①

此外，无可置疑的是，伯爵夫人尽其所能地吸取了拉薩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利烏斯·瓦尔泰希在关于拉薩尔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作中說，她在拉薩尔逝世后按自己的想法繼續推行拉薩尔运动的尝试失败后就隱退了，此后直至去世一直无所作为，这种說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她虽心怀不滿地站在一旁，然而一八七八年（这一年德皇遇刺）俾斯麦准备将社会民主党置于非常法限制之下的时候，她不愿可能给她和对拉薩尔的印象带来所謂損害，而給党提供了有利于同俾斯麦斗争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也确实被党用了。此外，如果說拉薩尔的如此重要的遺著至此尚未整理和发表，那么这也不全是她的过错。她一直在努力寻求一位合适的人来整理拉薩尔的遺著，假如她为此要求监督这项整理工作的話，这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她曾是拉薩尔的知心人，直至他去世止，她是最接近他的，因此她有一定的权利被看作是他的思想上的遺囑执行人。此外重要的不在于如何来評注拉薩尔的遺著，而在于它終究会被发表。这一情况沒有受到足够的重視，这不能不指責那些受索菲·馮·哈茨费尔特委托过的人。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如果說伯爵夫人对工人运动的看法和目前社会民主党的看法不同，那她也决不是打算使这个运动服从某些政客或其他政党的目的。她的錯誤和缺点在于她将运动仅仅限制在拉薩尔的范围之内，就在拉

^① 同一時間，他在写給另一位同他相爱的女人的告別信中，用更为热烈的語句描繪了他同索菲·馮·哈茨费尔特的内心感情。參看《拉薩尔的家书》，柏林，前述出版社，一九〇五年版，第160頁。

薩爾最後達到的地方停住了。拉薩爾在世的時候，她自然會一再企圖在政治上影響他。然而由於社會教育的關係，她很熟悉各種手腕，因此，在這方面她對拉薩爾的影響並不總是好的。拉薩爾在上面的信中稱頌她的那些好處，在某些方面她似乎作得過分了。

這在當時還不具有特殊意義。至少如同他對伯爵夫人的關係一樣，他在政治上的激進主義使他在他所處的那個社交界中得到了壞名聲。許久以來流傳極廣的關於他在反動時期沒有關心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說法，今天看來，可以說是無稽之談，是已被駁倒的了。狄茲出版社出版的由弗·梅林編輯的拉薩爾致馬克思的書信集以及倍倍爾和筆者發表的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證明，一八六三年拉薩爾在《慶宴，報刊……》的演講里向萊茵工人所說的決不是空話，在講演里他說：“你們知道，是誰的家不顧辛克爾代·威斯特華倫的白色恐怖，不顧當時野蠻的無法無天狀態（一直到我留在萊茵省的最后一刻鐘），成了民主宣傳的無畏的避難所，成了最大膽最堅決地給黨以援助的可靠的避難所。”這些書信充分地證實了，拉薩爾對黨始終是無限忠誠的，幫助了許多在患難中的黨內的朋友，而且只要在促進運動的團結方面還有人共事的話，那他是竭誠地為此盡力的。在反動的年月里，他尤其是幫了馬克思很大的忙，此外還協助把馬克思的許多著作偷運進來。他一直不斷地注視着經濟進程以及政治事件，研究它們對民主事業以及對着手新的鬥爭的可能性的意義。從這種觀點來看他的書信是很說明問題的，它告訴我們，他多么嚴肅地對待勞動人民的事業，多么深刻地觸及時代的問題並力求找出其中的關鍵。在涉及國內外政治問題的時候，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交往對他是十分有利的。我們知道，一八五四——一八五六年克里木戰爭期間，他為馬克思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關於外交事件的情報，提供了許多資料，這對馬克思為《紐約論壇報》寫作通訊報道起了很大的作用。馬克思某些通訊的主要內容甚至是从拉薩爾的書信中轉譯去的。

就在這反動時期拉薩爾還完成了關於赫拉克利特的語言一哲

学著作。为了完成这本书，他曾为取得移居柏林的許可作了許多努力，为此他在一八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向柏林警察局长辛克尔代递交了申請书，并于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五日上书普魯士王子（后来的威廉一世）。这些文献，曾由秘密档案保管人白劳易发表在一九〇三年的《德意志政論报》第六期上，后来《社会主义文庫》杂志一九〇三年第九期曾予以轉載。这些文献有不利于拉薩尔的一面。如果說他既不打算改变他的思想，也不准备放棄他的原則，而以他工作的学术性作为一定的理由，要求移居到設有科学机构的首都，这样做是可以容許的話，那么他在以上两封信中向当时统治者所作的让步却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深信拉薩尔民主共和信念真实的人，对此只能表示惋惜。这暴露了拉薩尔的一个特点，即在選擇手段的时候常常越过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的自尊心所能容許的界限。这一特点在他的日記中已經显示出来了，而哈茨费尔特案件无疑地是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特点。

不管人們如何評論拉薩尔的这种做法，它終归还是奏效了。一八五七年初拉薩尔迁到了柏林，誠然，在很长時間里警察局只是容忍了他呆在这儿。一八五八年在那里他发表了《愛非斯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这本书使他在学者当中取得了很大的名气。由于它主要的是闡述涉及赫拉克利特的文献的語言与哲学意义，因此对它本身就用不着作什么评价了。为了說明本书的精神，現从书中引出两段話来看看：

“任何东西就其个体本身是无法被認識的，相反地，一切事物只有在与其物质和精神世界的‘何来，何往’的有机联系中，即在和整体或絕對物的联系中才能得到应有的理解，只有这种認識才能称之为理性。这是迄今为止所有哲学思想中最深刻的思想之一。”（第二卷第 309 頁）以及，

“赫拉克利特創造了一般思辨的真正基本形式概念，对立面演進着的同一。他还創造了一般道德的真正基本形式概念。他的倫理学歸結为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同时也是道德的永恒的基本概念，

‘服从于普遍性的东西’。”

拉薩尔的哲学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五、新紀元和意大利战争

《弗兰茨·冯·济金根》

拉薩尔移居柏林的时候，普魯士恰好宣告了“新紀元”。克里木战争严重地动摇了欧洲反动的主要支柱——俄国的威望。尼古拉第一这时已经逝世，他的忠实盟友弗利得里希·威廉第四患了神经病。具有全欧意义的民族问题，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问题迫切地需要解决。替患病的哥哥摄政的普魯士亲王威廉感到旧的制度已经摇摇欲坠。虽然他还不打算同普魯士容克集团决裂，但他已亲身饱尝其业已天主教化的极端反动的一翼之苦，无论如何他不能不希望摆脱这一“小而强大的”《十字报》集团的束缚。这就不能不向资产阶级作出一定的让步，除此之外国家对现款日益增长的需要也要求同资产阶级金融界搞好关系。这一切在亲王的某些声明中得到了反映，一向乐于夸大领导人物言论的德国资产阶级欢呼这种自由主义新纪元的征兆。而事实上，亲王言论的价值在于，承认官僚机器已陷入混乱，而人民群众逐渐有勇气重新以强硬的语言来讲话了。在议会中组成了青年立陶宛党团，此后扩充为进步党。虽然他们有一部分是贵族地主，他们的子弟后来大都重新成了典型的容克，但是他们都装出一付民主的模样。运动逐渐扩大到居民中的各个阶级，当一八五九年春天法意奥三国战争爆发的时候，普魯士的舆论十分激昂。人们普遍地认为，现在德国的统一问题是提到日程或者必须提到日程上来的的时候了。

但是，对意大利战争应抱什么态度呢？任何怀有民主情绪或甚至只有一点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对为获得自由的自决权利而奋斗

爭的意大利人民是不会不表同情的。然而，領導意大利人的却是一八五一年政变的英雄拿破侖第三，民主派痛恨这个背信棄義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扼杀者。除此以外，戰爭是針對奥地利和奥地利轄区的，而奥地利却屬於德意志同盟。难道能够坐視盟国孤立无援地单独作战嗎？

德国的所有反动人物，自然都傾向于奥地利。然而也有許多具有自由思想的政治家、甚至极端民主派都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必須采取反对奥地利的对手的立場。他們认为，不能以牺牲德国来建立意大利的統一。現在問題在于，号召全民去反对拿破侖，在抗击他对德国的阴谋中，德国人民将使自己的統一运动成为不可阻擋的。

当时也曾有人将这种思想看作是妄想，而他們认为，德国人民根本没有理由去捍卫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利益。奥地利原来就是一个反动的国家，它只是靠暴力統治来維持的，因此根本不可能贊成什么自由发展。奥地利的崩潰或至少是屈从才是德国按照民主精神实现統一的前提。意大利人的事业是絕對正义的，凡是不放棄自己信仰的自由思想者是不会反对它的。不应当动员德国去捍卫奥地利，相反地，应该是德国动员起来在适当的时机排斥奥地利来实现德国的統一，在防止为奥地利的非德意志領地而牺牲的情况下实现德国的統一。

后一个綱領只有两种实现的办法：用革命运动去反对所有現存的德国各邦，或者同普魯士政府一道为获得普魯士在德意志的霸权而斗争。当时还不能指望于革命的人民运动，这一点拉薩尔早已充分認識到了。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日他在給马克思的信中说：“您远离这儿已有十年，您真的簡直想像不到我們的人民在摆脱保皇主义情緒上的进展是多么小。我是在柏林才初次痛心地看到这一点的。”但是另一方面，拉薩尔是小德意志自由主义党的坚决反对者。这个党主張以普魯士为首建立一个脱离奥地利的，然而繼續保持小国分治的德国。拉薩尔却把建立一个包括全德人民

的共和国——“沒有君主专制的大德意志国家”（如同他四年后致洛贝尔图斯的信中所說的那样）作为目标。这一点在当时已經看出是无法实现的，然而拉薩尔对运动並沒有在一旁观望，而不去和那些支持奥地利的人作斗争。因此，他写了《意大利战争和普魯士的任务》一书。起初拉薩尔用假名“来自民主的声音”，第二版才用他自己的名字出版。本书的基本思想如下：

1. 反对法国的叫嚷是完全不适当的。即使有理由仇恨拿破侖第三，但是这里必須把个人同国家制度区别开来。路易·波拿巴的統治制度是同他自己宣布的原则相互矛盾的。它一定会由于这种引起不停的摩擦的矛盾而破产，因此，它比地位稳固而本质反动的奥地利的統治制度的危险性要小得多。拉薩尔写道：一个理論原则是民主的、而統治手段是反动和暴虐的統治制度自然可能是民主发展的凶暴的敌人，然而它对民主发展來說决不像一个代表完整的反动原则的統治制度那样危险。“路易·拿破侖可以随心所欲地沒收所有从倫敦和澤西島秘密运抵法国试图出售的著作。然而难道有人沒收了它的綱領、通告和宣言嗎？”他的政府充满着內在的矛盾和內部摩擦，它暂时可能比奥地利更能給民主带来严重的損害，它可能害了一种痛苦的剧病，但这不是奥地利那种慢性病。法国的情况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当拿破侖企图玩弄民族原则的时候（只要它“还是保守的”），全国立即就会从革命的意义上去理解。“法兰西的管風琴立即会重新奏起革命歌曲，军队唱起馬賽曲，在工人群众中間出現大规模的騷动。”在这一情况下起而反对法国，并阻止它援助意大利人，这将会是德国民主力量的最大錯誤。在这一情况下，如果德意志同盟为了捍卫奥地利的利益而出兵法国的話，法兰西民族将被迫团結在拿破侖的周围，法国的民主人士必将“痛心疾首”举起拿破侖的旗帜。只有当拿破侖打算把从奥地利人手中夺来的战利品据为己有，或者在中部意大利把他的堂兄弟拿破侖亲王扶上王座的时候，才是用战争反对拿破侖的时机。“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下，都只有同意大利人民和法兰西民族的民主本

能結成联盟才能进行战争。”在这以前或在目前，德国人民应当抱一种小心翼翼地耐心等待的态度。

2. 至于普魯士政府，某个弗里得利希大帝会把这“看作是进军奥地利和宣布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好机会，而听任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諸邦以外去为所欲为”。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决不能指望普魯士內閣采取类似的作法。恰恰相反，首先应当要求它保持中立，使它的军队严陣以待；“如果拿破侖在南方按照民族的原則窜改欧洲地图的話，那好，我們在北方也照样行事。如果拿破侖解放了意大利，好，我們就去占领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而我們的军队就在这种宣言下进军丹麦！”如果政府决定执行这种政策，那么德国的民主派就会站在它这一边。如果它躊躇不决和什么也不做的話，那就只能再一次“证明，德国的君主制度已經无法胜任民族的事业”。最后，如果法国沒有进攻，如果沒有发生上述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而政府还是把德国投入一場反对法国的骨肉相殘的战争中去的話，那它就势必“遭到民主派的反抗”。

在一封未注明日期，但照內容看来大概是一八五九年七月二十日的信中，拉薩尔对馬克思写道，他“由可靠方面”获悉普魯士的摄政王已經决定支持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小册子是反对普魯士官方政策的斗争的准备。为此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一再为这本小册子辯解，因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战争問題上赞成另外一种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场战争是俄国和拿破侖策划已久的阴谋，它的锋芒是直接针对德国的。它們的胜利一定会巩固拿破侖在法国的统治，俄国又会重新影响欧洲的命运。在他們看来，拉薩尔所建議的政策在实践上和拿破侖在德国的代理人所宣傳的旨在孤立奥地利的綱領沒有两样。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摧毁这种阴谋看做是他們党所面临的任务。同拉薩尔相反，他們认为甚至暂时地支持波拿巴的代理人所宣傳的观点也是錯誤的。

由于这些意見分歧，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薩尔之間曾一度出現十分激烈的爭論。虽然这种爭論不久就停止了，然而畢竟留下

了后果。从此以后拉薩尔同馬克思之間通訊的口吻不再像以往那样亲切了，而一八六二年夏天拉薩尔訪問倫敦之后，就完全中断了。

事后也难于判断哪一种策略比較正确，因为战争进程和双方所設想的不同，而且事变本身的发展也和預計的有很大的不同。至于拉薩尔，假如同意他的前提的話，那只能說他的政策是既合理又具有民主精神的。誠然，他向普魯士政府发出了呼吁，一旦普魯士政府接受他建議的政策的話，那就必然会为它效劳。这是一个极其危險的尝试。然而，如上面指出的，他深信普魯士政府是**不会**接受这种政策的。下面这句引自他的小册子里的話可以說明这一点：

“在两种战争中無論政府决定打哪一种战争——当它不得不向人民的力量呼吁时，它就会发现輿論的力量是站在哪一边的。”这最后一句話包含着非常明显的战争威胁。这同这本小册子引自維尔吉尔^①的題辞是一致的：“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假如我不能使神明发慈悲的話，我就要去惊动幽灵！按照拉薩尔的意图，这一著作也是他那激进民主主义原则的公告。

几乎同《意大利战争》同时，拉薩尔的剧本《弗兰茨·馮·济金根》出版了。一八五八年他已經写完了这个剧本，并且送給皇家剧院上演，这自然是不会得到上演的恩准的。从戏剧的观点来看，这个剧本的确不免有缺点。它的价值在于：这是个富有倾向性的剧本。这与其說是由于它的主角济金根（历史上的济金根的理想化），毋宁說是由于剧本的悲剧性的主题思想。这一点拉薩尔曾在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里闡述过。这篇文章只在他的較亲近的朋友中傳閱，有一份曾在馬克思的遺物中发现。拉薩尔在文中指出，弗兰茨·馮·济金根悲剧性的錯誤在于他在武装起义的时候沒有认

^① 維尔吉尔，古羅馬詩人。——譯者注

濟自己的全部綱領——反對割據的諸侯國家，而在一個錯誤的綱領——似乎僅僅是同特利爾大主教的地方性的衝突——指導下進行鬥爭。這樣，就使他賴以達到鬥爭目標的群眾不能了解其鬥爭的意義，從而失去他們的支持。然而敵人——封建諸侯——却由於訓練有素的階級敏感而能很快地覺察出問題之所在，他們聯合起來粉碎了濟金根的創舉。濟金根“不僅沒有公開求助於原則，不僅沒有賦予原則以革命力量，而且由於向特利爾的進軍，歷史觀念和民族事業都完全失去了其普遍價值和意義，因而一切都披上某種偶然性的外衣。”儘管濟金根力求用周密的準備來避免一切偶然事件，然而他自己就求助於偶然性，他使自己處於這種地位，只有偶然事件才能幫他的忙。不是由於舊勢力的實際優勢，而是由於他自己的失策毀滅了他。

在該劇的最後一幕里，拉薩爾讓濟金根的私人秘書巴爾塔莎爾·斯洛夫用如下的話表達了他的這一基本思想：

“啊，你不是頭一個，也不是

最後一位，

在巨大的事變中

為玩弄權術而丟掉腦袋。

在歷史舞台上，

喬裝易服全都是白費，

……

……

因此，你要自始至終

勇敢地保持旗幟的光輝。

然後投身偉大的鬥爭

檢驗真正支持你的全部力量，

不問成敗，鞠躬盡瘁。”

如果劇中的主角與其說是社會民主黨人，倒不如說更像自由主義的人物的話，那麼劇本在“道德”方面則從進步的激進主義觀

点对自由派的策略提出了批評。其倾向是絕對革命的。拉薩尔在上述(傳閱的)文章中說,革命归根到底只能靠群众来进行,然而群众所关心的經常只是极端的和整个的东西,那些在革命事业中使自己的行动只受制于現有手段的百般盘算的革命計算家們,最后只能是敌人重重,而沒有人拥护他的原則。在偉大的历史性的革命中,抽象的唯心主义者往往比现实的政治家更能抓住当时有可能和实际上能实现的东西。

假如柏林皇家剧院的主管(拉薩尔将剧本給了他們)鉴于情节还不太有害而接受了这个剧本,并且利用皇家舞台从革命的激进主义的立場来批判自由主义的不彻底性的話,这对现实來說倒也是个不坏的諷刺。然而他顾虑重重,还是退回了剧本。如上所述,这个剧本虽然在技巧上不免有缺点,然而它毕竟具有許多优美的地方和丰富的思想內容。从許多精辟的句子中,我們选出一句来。这是济金根对烏尔利希·馮·胡登所說的名言:

“不仅指出目标,还得指出道路,
道路和目标是如此密切相連,
一个变了,另一个也跟着变,
不同的道路走向不同的終点。”

六、《既得权利体系》

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一年期間,拉薩尔在路得維希·瓦列斯罗得出版的《民主学报》杂志上发表了兩篇論文,《費希特的政治遺囑和最新的现实》以及《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萊辛》。第一篇坦率地贊揚了偉大統一的德意志共和国的思想,第二篇歌頌了这一思想的革命家萊辛。然而在这兩篇文章中拉薩尔主要只是闡述別人的著作。可是,一八六一年初拉薩尔却发表了一部独立的巨著,这部著作可以看作是拉薩尔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这就是兩卷本

的《既得权利体系》一书。拉薩尔以此献给他的七十大寿的父亲，作为“敬愛的表示”。

下面我們简单地向讀者介绍一下拉薩尔这本探討极共抽象的法的問題的著作。

既得权利体系的副标题是：实在法和法哲学的协调。这就是說，他这本书企图指出如何使实在法，即作为实际要求和社会力量对比之表现的历史上形成的法律，同从对法的本质所作的一般哲学考察中得出的法的基本原则相协调的途径。由于这种法的基本原则不受時間条件的限制，相反地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因此也被称作自然法。自然法在一定意义上是非历史法，因为它不受或不应受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它必然是一种抽象法；它提供抽象的原理，而这些抽象原理是如此的一般，以至于根本不能解决某一具体的法权問題。例如，承认取得财产是天赋的权利的学说一点也沒有說明某一种取得财产的具体形式，例如购买土地是否被允許的問題。另一方面，写在法典上的实在法却当然能够解决这种取得财产的方式是否被允許的問題。但是这种解决是建立在下述法权观念之上的，这种观念反映了可能已不存在的关系，或已經瓦解以至与之相应的法权严重地侵害了新的要求的关系。如果新的需要——例如城市土地市有化——已成熟到要求规定新的法律和新的权利，那么就产生一个問題，这新的法权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侵犯那在旧的法权基础上产生的法权关系。換句話說，在什么条件下新法律才会具有回溯效力。

这是在法学家中間引起热烈爭論的問題。任何人，只要他不願拜倒在野蛮的强权和专横之下，那么，他就会承认找出这样一种原則或規則是有价值的任务，它将一劳永逸地規定解决这些冲突的方式，而又同时兼顧双方的利益。实质上这里指的是与旧的法权对立的形成中的法权，或者用另一种說法，是与过时的机构或腐朽的社会阶级的法权对立的革命的法权。

在表现于法律的实在法的基础上产生或为其核准的权利叫做

既得权利。而既得权利体系的任务在于：确定这些权利有多大意义，并同时为之确定界限。

拉薩尔也为自己提出了这一任务。毫无疑问，是由于哈茨费尔特案件他才碰到这个问题的，在那里常触及一些产生于封建时代，特别是一八四八年以前时期，而至今尚存的法权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常发生争论，这些法权关系是否实际上已被新的法律所废除。而且普鲁士立法的发展进程本身也不由地引起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在反动时期，容克利用既得权利原则，以求在废除封建徭役时（这是一八四八年决定实行并已是势所难免的了）取得高额赎金。并且在其他许多场合“既得权利”也成了迫切的政治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怎么对待这些“既得权利”呢？人民应当为每一项进步措施而向历来的特权者付出高额的赎金吗？应当承认后者有权任意规定每一项进步措施的赎金吗？立法应当在任何条件下永远屈从于“既得权利”吗？

拉薩尔回答了这些问题。首先他力求为既得权利的概念找出一个新的公式，这个公式将比过去更明确地限定它的范围。他用下列两条原理表述了一个严密的定义：

（1）“凡仅借助于个人意志力而涉及个人的任何法律都不应当具有回溯效力。”

（2）“凡不通过这种自由意志行为而涉及个人的，因而是不通过其不由自主的、一般人类或自然的、或者得自社会的特性而直接涉及个人的，或者只是通过在社会组织设施中改变社会本身的办法涉及个人的任何法律都应当具有回溯效力。”

举个例子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两条原理的意义。假如颁布一条法律，规定年满三十岁、而不是先前规定的年满二十一岁才能不经父母同意而结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原先达到法定年龄而拥有这一权利的年龄不满三十岁的人，现在就都被取消了这种权利。因为他们获得这项权利并不是由于他们个人的意志力，而是由

于国家承认他有这种权能，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只要达到一定年龄，他们就获得这种权能。相反地，不满三十岁的人所締結的婚約在新法律下仍然有效，虽然新法令已把婚齡提高到三十岁了。其原因在于，这种婚姻取决于意志行为，按照过去的法律个人有权这样做。这种婚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例如指定由这种婚姻所生的孩子为合法继承人——就是既得权利。

这是比較简单的情况。在生活中常有极其錯綜复杂的事例。有时問題不在于早几年还是迟几年获得法权能力，而在于权利的有效性，这些权利在几十年前，而有时甚至几百年前就出现了。这些权利通过世襲相傳可能成为永世长存的。这样就产生一个問題，是否可以把世襲相傳看作是这样一种意志行为，它一次又一次地造成既得权利，延长现存法权的有效期限。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拉薩尔在上述两条原理中提出的定义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人类的进步也就会取决于享有特权的集团或个人的善良意願，并且没有办法去反对踐踏一切权利的罪恶的意志。

然而拉薩尔成功地克服了这种困难：他还从内容方面来限制由个人的意志行动取得的既得权利。只有其内容为現行法律所准許的权利才能被看作是既得权利。为更清楚起见，我們再举一个例子。例如对徭役劳动的封建权利。只要法律准許徭役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贖买才能消灭对徭役劳动的权利（既然这是上述意义上的“既得”权利）。但是，如果表达社会意識的法律宣布徭役义务应一律禁止，那么，根据拉薩尔的意见，对这种权利的任何要求就都丧失了既得权利的性质，并同时失去了要求贖买的权利。他說，“权利的唯一源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認識，普遍精神。”（第一卷，第二版，第164頁）如果这种普遍精神通过一定的步驟判明至今一直有效的某一权利是違背本法权意識的，即不能被准許的，那么一切与此不符的个人意志行为都将是无效的。“个人无力在法权的地基上打上任何标记，他不能用这种办法宣布自己永远是独立自主的，而无視未来的全部强制的或禁止的、即宣布一

般禁令的法律。”(同上,第166頁)在社会中除了社会本身創立的法权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法权。因此,拉薩尔写道,只有“永远放棄(只要这是可能的)任何取得享受或拥有这些权利的要求”(第166頁)的人,才能使自己避免普遍法权意識的任何影响。然而这是不可思議的。^①正是那些拥有既得权利的人最不可能支持这种观点,因为这一来他們的既得权利就会变成零,而他們自己倒会宣布专横为唯一的决定性的力量。誰同意这一点,他就必然承认下述原理,这是拉薩尔全部論点的中心:

“任何条約从一开始就必然附有默认的保留,即为自己或为他人所商定的权利,只有在立法一般地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方为有效。”(第164頁)

試举在實踐中多次遇到的另一个例子來說明。只要法律承认买卖酒精飲料是合法的,那么,如果社会因某种原因,例如为了修路而征用酒店主人的酒店,酒店主人就完全有权要求报償。但是如果法律根本就不允許买卖酒精飲料,那么,根据拉薩尔的原理,就根本談不上什么要求报償的問題。

然而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由法令来弄清社会意識已不承认某种权利的内容为合法的了。普遍意志也可以通过下列办法表现出来,即人民通过明确的行动徑直去摧毁某种法权制度。例如法国革命时代的国民公会把攻占巴士底獄的那一天看作新法权制度的开始。这一当时在統治的法权观念中的变革所产生的后果从这时起都生效了。二年雪月十七日(一七九四年一月二日)的法令規定,这一廢除限定世襲权的法律适用于所有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獄的那一天)以后开始的繼承。法律的这一要求絲毫不違背既得权利的原则,它絲毫不違背认为一切法律都沒有回溯效力的法权原则。在这里法律不过是宣布,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前通过的任何指令对新的法律都是

^① 也許只有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捍卫这种观点,虽然是否有人会始終如一地贯彻它还是值得怀疑的。

无效的。这完全符合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原则：任何时代都不能为后代预先拟定法律。

所有这些思想的革命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只要法律简单地宣布既得权利的内容是不合法的，或只要完成某种反对这种权利的革命行动，就能消灭它了，那么是否还可以相信既得权利的稳定性呢？但是，这里忽视了一点：并不是所有人民群众摧毁某种建筑物的行动都具有攻占巴士底狱的意义，这次的攻击之所以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意义只是由于事变的环境，由于它在民族中所遇到的支持。同样，如果不存在必要的条件，那么任何立法团都不能对某种权利的内容发出禁令（例如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权利），无法使这种禁令生效。因此，问题决不在于把既得权利的有效期限交由立法团去随意处置，或听任骚乱的群众去解决。重要的是保障人民的自决权，使免受已失去其合理根据的东西的侵犯。

这就是拉薩尔在《既得权利体系》一书中为自己提出的任务，而据我们看来，在理论著作一般所能解决的实践问题的范围内，他是成功地解决了这一任务的。他提供了一条能使革命者和法学家都同样感到满意的准绳，如果后者不把实在法看作是立法的开始和终结的话。^①

拉薩尔证明，伟大的罗马法学家已多少明确地阐述了他所提出的原则，他用法的各种范畴证明这一原则的意义和作用，关于这些我们就一一介绍了。扼要地转述他那机智的论述，如果不是歪曲它的话，那也只会增加理解上的困难。因此，这里只再指出一点，拉薩尔在这里发挥了一个完整的剥夺论，此外，在另一个地方在一条很长的注释中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纲领，其中还包括国民经济学。拉薩尔打算在完成《体系》后着手写作的国民经济学著作的纲要就是以此为为基础的。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值得在这

^① 第二版注：根据上面所讲看来，拉薩尔将会如何看待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国起义对德国各王国的某些既得权利的意义，这是很清楚的。

里至少介紹一下這一綱要的两个最主要的思想。

1. 一切法权史的文化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是：越来越限制个人所有制的范围，越来越多的对象越出了私有制的范围。

2. 与这一法的发展进程同时并行的，在經濟发展中也可以发现与之完全相应的趋势，即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以及产品本身，越来越多地从有报酬的变成无偿的（由于降低销售价格和經常降低生产成本）。拉薩尔在这儿进一步指出，巴师夏在其关于經濟协調論的著作中已經說过这一思想，但“由于无批判地理解經濟范畴，他是用完全錯誤的和片面的方式来说明它的”。以后拉薩尔曾对洛贝尔图斯写道，这应当理解为，由于铁的工資經濟規律及由于地租增长律，工人失去了享受产品的这种日益增长的无偿的可能性。

無論如何，从这一論点看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拉薩尔极其深刻地懂得經濟問題。

由于既得权利可以世襲，因而能給后代带来沉重的負担，所以关于繼承权問題必然具有巨大的意义。有鉴于此，在《体系》的第二部分拉薩尔分析了这一問題，得出下列結論：現代的遺囑权是沿用古羅馬法的。在这里它是基于下列概念的，'繼承人是亡人意志的后繼者。因此，这一权利归根到底是基于对宅神和家神的崇拜上的，而履行这种崇拜的义务由遺囑人傳給繼承人。由于我們的时代已不知道这种崇拜，因而最后支配权只是社会給予个人的，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取消它，而决不因此違背既得权利的原则。并且拉薩尔还引用哲学家萊布尼茨的話来为这个論点作证，萊布尼茨說，如果灵魂不是不灭的話，那么遺囑，即死后意志的表现就会失去任何合理的含义。这样，如果灵魂不灭的信仰是站不住脚的話，那就根本不可能把遺囑权說成是既得权利。拉薩尔的这一論据給了过去对于現代的权利以新的打击。可以不同意拉薩尔的个人論点，例如他对羅馬法的基础和历史发展进程的观点，但是整个說来他的邏輯是严密的，是駁不倒的。

七、拉薩尔和柏林社会

洛塔尔·布赫尔和《尤利安·施米特》

《既得权利体系》大大提高了拉薩尔在柏林知識界中的威望。人們乐于原諒他的激进主义倾向，因为他所反对的首先是普魯士容克集团移植到现代来的、敌視自由主义者的半封建主义机构，同时，拉薩尔也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公侯专制制度。不錯，拉薩尔还触及了重大的社会問題，并且是作为經濟問題提出的。此外，在上面摘引的那个附注中，他直接地提出了一个社会問題：企业主剝削工人的权利是否还应当繼續存在下去？然而，所有这些暂时还是用抽象的理論的形式提出的。所有这些暂时还不使人觉得可怕。尤其是会賦予这一思想以威胁资产阶级的面貌的工人运动还完全没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正是在这时候资产阶级的代表們开始试图以教育协会来組織工人，或在这方面給工人們以协助。非常现实的問題是、或看来是另一种所有权問題，拉薩尔把它叫作时代問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这就是“消灭那整个民族的公众意志成为一个家族的财产的事实”。他指的是下列事实：在德国“不仅民族意志的内容，而且甚至那使德意志民族根本不再存在的东西——瓦解民族精神的权利——都成了几个家族的所有权”。家族在这里指的当然是那些分立的德意志各邦的王室。

对当时德意志同盟制的这一挑战获得了应有的諒解，而且正中自由主义庸人的心怀。而拉薩尔在理論上的激进主义絲毫也没有使资产阶级思想家感到不安。学术界很尊敬他，如果拉薩尔自己的行动中沒有那些会使許多正直人士离开他的特点的話，这种尊敬也許还会更大一些。不錯，拉薩尔是和藹可亲的。但同时他也常常喜欢炫示自己的优点，因而为自己树立了不少的敌人。从日記就可以看出，拉薩尔的这一特点在少年时代已有所表现了。他

和軍需官法布利采的冲突是很出名的。有一天拉薩尔用傲慢的笑声激怒了他，以至使他向拉薩尔发出了决斗的挑战。拉薩尔冷靜地拒絕了挑战。因而法布利采和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街上拦住了他，打算用皮鞭痛打他一頓。拉薩尔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法布利采头部受了重伤。这件事引起很大的轰动，拉薩尔几乎为此而不得不离开柏林。只是由于向各有关当局多方奔走（就在这时候他向普魯士亲王写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拉薩尔才得以免于麻烦。但是，如果說这一次拉薩尔是正确的話，那么在胡鬧中有些終究是不能不归咎于他的。

在許多人心目中，拉薩尔是喜欢追逐女人的那一流人物。这种名声显然是由于他的讲究穿戴和經常贏得女人的欢心而造成的。然而不能不相信一八六〇年三月二十日他給馬克思的信中所說的：“我从来沒有淫佚放蕩过。”从他的各种书信可以看出，在和女人的关系上他决不是个太严谨的人。他自然有不少形形色色的恋爱史，但是如果想一想，他在这比較短促的一生中在学术上、在政治領域內做了多么多的事情，那就会不由地承认，所有这些恋爱史对他來說好像只是献身于人类最崇高利益的紧张的劳动中的休息。当然，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他免受可能的攻击。

在这些恋爱史中有两件是比較严肃的。头一件的女主角是年輕的俄国小姐、貴族出身的索菲婭·桑采娃。拉薩尔是一八六〇年秋在阿亨認識她的。她和打算在这儿疗养的父亲一起来到这儿，拉薩尔也为同样的目的住在这里。显然，索菲婭·桑采娃給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頑強地向她求爱，并向她求婚，但她不願他狂热的一再要求而拒絕了。在拉薩尔給索菲婭·桑采娃的許多信件中有一封达三十六印刷頁的长信。在这封信里拉薩尔仿佛是在向少女自白，向她吐露了共生活的打算和斗争。毫无疑问，类似的自白是从来也不会吐露出全部真情的，特别是当問題在于（如现在这种情况下）要給少女的心灵留下某种印象的話。但是，任何一个想正确地評論拉薩尔的人看一看这封信終究还是必要的。

在這封信里拉薩爾談到了自己過去對待女人的態度：

“到現在為止，我的愛情只是女人所追逐的熄滅中的火焰。我還沒有見過一個不力求占有我的女人，雖然她連一分鐘也不會相信我會容忍和她結婚的念頭。我對您說過，我常常躲避年輕的姑娘們。只有兩次我和年輕姑娘們談過愛，她們熱烈地愛我，並引起我占有她們的欲望。在這兩次中我都是以表白我永遠不會和她們結婚開始的。除了這兩次而外，我只和已婚婦女打交道，在她們身邊我如您有一次所說的，只是個‘寵兒’。其中有些人確實愛過我。您知道，女人在戀愛的時候有不斷地提問題的習慣。沒有一個人我不是以習有的坦率回答她說，即使她是自由的，我也會娶她。然而儘管如此，而也許是正因為如此，她們強烈地愛着我。我想要，但不想把自己給予別人。”（《斐迪南·拉薩爾戀愛中一段插曲》第33頁）

在索菲婭·桑采娃堅決拒絕的一年以後，拉薩爾在柏林希爾瑟門采爾律師家里認識了一位巴伐利亞高級國家官員的女兒海倫·馮·敦尼蓋斯。她曾寫了一本關於自己和拉薩爾的關係的回憶錄，她說，雙方的友人都認為他倆非常相稱，而拉薩爾在第一次見面時就已使她感到，他喜歡她。但是，這時候在他倆之間還沒有愛情的結合。這位有着金黃色頭髮樂觀愉快的姑娘在拉薩爾的生命中扮演極其不祥的角色，這是整整兩年以後的事。

從拉薩爾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和諸如語文學家伯克、哲學家米歇萊、法學家格奈斯特這批人有來往；萬哈根·馮·恩賽非常賞識他。其次可以知道，亞歷山大·馮·洪堡對拉薩爾的評價是多麼高，而當拉薩爾有被逐出柏林之虞時，他是多麼努力地為之在普魯士親王面前斡旋。同時拉薩爾和柏林《人民報》發行人弗蘭茨·敦克爾及其妻子麗娜（亨利希·勞貝的女兒）保持着密切的友誼，在他們家里聚集了許多藝術家和政治家。和拉薩爾交好的藝術家中間，特別應當提及的是音樂家漢斯·馮·華洛夫。在旅行期間，拉薩爾結交了居住在法國、瑞士、意大利的革

命家。他和海尔維格夫妇，加里波的手下的吕斯托夫上校特别亲密；他还到卡卜莱腊島拜訪了加里波的本人。由于这一切，他所交游的朋友和熟人极为广泛。一八六一年威廉第一即普魯士王位而宣布大赦后，許多政治流亡者回到了德国，因而拉薩尔的朋友和熟人就更多了。这次大赦与馬克思无关，拉薩尔虽然为馬克思在自由主义新紀元的大臣們面前多方交涉，但无結果，馬克思就这样沒有恢复丧失了公民权。拉薩尔准备和馬克思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出版类似《新莱茵报》的大型政治性报纸的计划也多少是因此而破产的，这份报纸应当成为激进民主派的机关报。

在归国的流亡者中間有曾經拒絕納稅的洛塔尔·布赫尔。拉薩尔現在和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并力图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但他沒有完全成功。从布赫尔在一八六二年一月十九日給拉薩尔的信可以看出，拉薩尔在这时候强烈地指望意大利革命者发动对奥地利的新的进攻的可能性，并打算与此同时在德国举行起义。^①他致馬克思的一封介紹信也证明了拉薩尔的这些指望，这封信是一八六二年七月他为一个姓施魏格爾特的上尉写的，这个人领导德国的自卫团体，他到倫敦去是为了征集购置三千支枪支的經費，拉薩尔把他作为实干家——“*homme d'action*”——介紹給馬克思。这同样是基于上述指望的。然而这些指望并没有实现。

与此同时，在普魯士在政府和自由民主派議会党团之間为改組军队的新法案而发生了冲突。部分旧自由主义者想躲避这场斗争。拉薩尔发表了一篇极其激烈的論爭性文章来反对这一倾向的文学上的首倡者、作家尤利安·施米特。这就是他的小册子，《尤利安·施米特先生，文学史家。附排字工的評注》。虽然这一小册子主要是针对作为文学批評家的尤利安·施米特的，并受到他无情的反駁，但結果它还是使“小德意志”的鼓吹者、德国普魯士化的

^① 如同他給父亲的信中所說的，在一八六一年旅行意大利时他曾訪問了加里波的手下的許多意大利革命家，从他們那儿获悉与上述大意相同的計劃。参看《拉薩尔的家书》（柏林，前进出版社），特别是第七十八号。

辯護士們大為震驚。在小冊子里拉薩爾以“排字工”的身分出現，對摘自施米特德國文學史上的引文加上評注。他指出了其所有的重大謬誤和妄誕議論，並極其毒辣地嘲笑了作者。在某些地方用“排字工之妻”代替排字工，這個筆名指的是洛塔爾·布赫爾。

八、拉薩爾在柏林的頭三個講演

《費希特的哲學》；《論憲法的實質》；《工人綱領》

就在這時候，拉薩爾在柏林發表了三次講演，其中的每一篇都具有重大意義。按時間順序，最後一個是紀念會上的講演：《費希特的哲學和德意志國民精神的意義》。這是一八六二年五月十九日拉薩爾在由哲學學會和科學藝術聯合會舉行的紀念哲學家費希特誕辰一百周年的大會上發表的。委託拉薩爾來作講演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他在這些團體里所受到的尊敬。而拉薩爾也沒有辜負這種信任。就結構和思想深度而言，拉薩爾的這一講演是篇傑作。它用鮮明的形式說明了作為偉大的哲學三星（康德、費希特、黑格爾）之一的費希特的作用。在敘述費希特的思辨哲學時，拉薩爾贊揚了他的通俗哲學，贊揚他把思辨觀念運用於時代和人民生活的實際問題。他特別強調了成為費希特的演說和國家哲學論文基礎的民主內核。費希特曾宣稱，德國人民的历史交給德國人民的任務是“自覺地創造其自身”，拉薩爾以滿腔激情闡述了費希特的這一思想。在拉薩爾看來，這就是說需要建立德意志國家，如他在這種情況下所採用的說法，以和德意志諸侯對立。他說，在德國，這種公國不是真正的國家機構，而是“某種私有的和獨特的東西，是在這些偶然的人民集合體中間進行統治的私有權，是塗着一層特殊的、為其所特有的神聖色彩的私有權”。（這就是分立的各邦。）這種權利在历史上已經過時了。而我們從《既得權利體系》已經知道，拉薩爾對待那些共內容在历史上已經過時了的私有權

的态度。因此，我們很容易理解拉薩尔在共讲演的結尾中所說的意思：“当所有的钟都响亮地郑重宣布这种精神得到体现的那一天——‘德意志国家诞生的节日’到来的时候，这一天我們將真正地紀念費希特，我們將庆祝他的精神和现实的婚礼。”

看来这个讲演沒有得到听众的贊許，在这些听众中不仅有上面提到的两个协会的会员，并且还有带着太太的各种各样的宾客。他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隔壁大厅內的（从这个大厅內发出了摆設盆碟的碰撞声）盛大午宴。如果願意，可以把对这一向德国资产阶級闡述了他們的崇高使命的讲演的反应看作是一种象征。

在这里第二个引起我們注意的讲演是拉薩尔于一八六二年四月和五月在柏林的几个区联合会上所作的《論宪法的实质》。同年秋和一九六二——六三年冬拉薩尔还在柏林这些区联合会发表了另一个讲演《現在怎么办？》，它是和上一个讲演紧密相連的。《論宪法的实质》这篇讲演是拉薩尔最优秀的小作品之一。虽然它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写的，但至今沒有失去其意义。拉薩尔浅显而生动地闡述了国家宪法的实质。他用历史实例十分明晰地說明，制訂出来的宪法只有表现出实际力量对比才会是富有生命力的。与此同时，拉薩尔也决沒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力量对比的概念局限于軍事和财政手段的概念上。他指的是国内从事活动的各种力量的总和。除了政府的財源以外，他还注意到政权的深刻基础，国家的經濟制度和精神生活，——人民的沒有組織的力量（如拉薩尔所采用的絕妙說法）。从拉薩尔的讲演可以看出，虽然与其說他是国民經济学家倒不如說他更像个法学家，虽然他常常使用抽象的法学語言，但他毕竟清楚地懂得法律和人民經济生活之間的密切关系。他清楚地懂得，和人民經济生活根本矛盾的法权机关必然逐漸瓦解。拉薩尔以其特有的善于洞察事物本质的科学头脑，沉着地在其听众面前揭示了当时普魯士宪制生活的性质。他说明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弱点和力量之所在（对普魯士政府而言）。他指出，在这种环境下应当如何对待政府的軍事提案。政府的目的不仅在

于扩大军队，而且更想使之成为国王手中的驯服工具。当时，在政府和国民議員之間的宪制冲突还非常不明显的时候，拉薩尔已經非常明确地宣布說，这一切实质上只是实力問題，而政府及其机构在这方面的行动是如此地自觉，是如此地具有实践的敏锐性，这是人民那一方所完全沒有的。“先生們，公侯那里尚有实干的僕役，不是光爱說漂亮話的人，但願你們都是这样的人。”

讲演就以这几句話作結束。它深深地刺痛了普魯士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至少在头一个阶段是宁可完全依据法律和政府进行斗争的。他們坚决反对必要时上街去解决问题，他們觉得自己沒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可是容克和軍閥集团的机关报《十字报》却幸灾乐禍地欢迎拉薩尔的文章。国王和自由主义者之間的冲突越是成为实力問題，則国王也就必然在整个城市资产阶级倒向自由主义一边的时候，更多地投靠不大自然却是强有力的由教士、容克分子和軍閥組成的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的体现者就是《十字报》。因此《十字报》一八六二年六月八日的社論竭力利用这一讲演，以唆使国王去反对議院中的自由主义多数派。

当拉薩尔发表其第二篇讲演的时候，国王和議院之間的冲突已經爆发了。这时拉薩尔已开始探索，在这场对政府的斗争中必要时什么力量能給予国民議員以援助。他說，自然不能指望于武装起义。也許在春天拉薩尔还把它看作是外部冲突所可能带来的后果，然而到夏天他已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了。相反地他却更为强烈地把希望寄托于国际糾紛，虽然着眼点已有所不同。正如俾斯麦一八六二年九月在下議院預算委员会所直言不諱地說出的那样（即著名的铁血演說），拉薩尔預見到，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解决的德国統一問題必須在戰場上解决。他建議議院采取的和政府作斗争的方案，就激进主义而論是沒有比这更好的了。他向下議院建議，只要政府不停止侵犯国民議会的預算权，那么就不客气地休会。換句話說，議院应当使其會議延期至政府作出让步时为止。拉薩尔接着說，自然，政府沒有宪制也行，然而宪制的外衣則是不可

或缺的。一个为本国广大居民群众所反对的政府对外也不可能是强大的，而如果向全世界公开地宣布普鲁士政府反宪制的财政经济，那么这就会在列强面前大大地损害它的尊严。那时候“在任何国际纠纷中，它都必然会碰到其他政府侮辱性的和无法容忍的钉子”。那时它的外交地位就会是难堪而不稳固的。拉薩尔指出，用不着顾虑这种指望政府遇到外交上的困难的政策会是非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如同自然科学家一样，首先应当考虑到所有起作用的力量，一切现存的力量。

拉薩尔接着说：“先生们，在寂静的书房里的历史探索中，我多次无可辩驳地亲自证实了下面这一伟大的真理：假如政府间的相互仇视和敌对没有迫使它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去为进步事业服务的话，那么甚至很难设想，今天我们、以至整个世界将会处于多么野蛮的状态。”

此外，德国政府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民族的真正危险。德国人民完成了伟大的文明事业，这是全欧的榜样。所以为其民族的继续存在而忧心是毫无根据的。

“因此，如果我们被卷进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那么在战争中我们的某些政府——萨克森、普鲁士、巴伐利亚的政府——自然可能会垮台。但是，如同凤凰一样，在其灰烬中复活的将是不可摧毁的德国人民。而我们所感到兴趣的本来也只能是这一点”。说明真相，这是一切大规模政治行动的出发点，而与此同时，一切政治上的局限性却经常表现于隐讳和掩饰事物的实际状况。因而，决不能掩饰！坚决拒绝继续举行议院的会议，需要以此昭然若揭地向全世界说明事物的真实状况。政府顽抗得越久，那么，归根到底它们也就将遭到越为可耻的必然败局。而然后是，“不要有任何调和的幻想，不要和旧的专制制度作任何新的妥协！需要的只是，手扞着脖子，和膝抵着胸膛！”

自由党及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翼根本就没有理睬拉薩尔的这一建议并且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它。同时，进步党的《柏林人

民報》不指名地痛罵拉薩爾，顯然，他們根本就不想和拉薩爾本人打交道。用來反對他的建議的論據是相當無力的。可以一眼看出，《人民報》不想觸及當時事物現狀中的某些問題。剛剛成立的進步黨是個形形色色的人們組成的混合物，因而它不能奉行那種如果政府不是等待、而是實行新的強制的話就必需進行暴力反抗的政策。所以，直至一八六六年普魯士的勝利大大地鞏固了政府在國內的地位時為止，進步黨只限於繼續拒絕批准政府的預算。而自由主義分子把政府宣布在整個不斷破壞憲法的年代給予他們以豁免權（豁免權）看作一種恩典。

拉薩爾和進步黨就其第二篇講演所展開的這一爭論，導致了他和諸如柏林（改良）這些資產階級激進報紙決裂，這些報紙至今還為拉薩爾提供篇幅。拉薩爾在一篇短篇《強權和法律》中曾談及這一決裂。像他論憲法的第二篇講演一樣，這篇文章曾在蘇黎世由邁耶爾和采勒爾出版社出過單行本。

這時候（一八六二年春），拉薩爾在柏林發表了第三個講演，它引起了更廣泛的注意。由於柏林的檢察機關，它導致或至少是加速了拉薩爾所希望達到的目的的实现。

這就是他的講演《論目前歷史時期同工人等級思想的特殊聯繫》，這一講演他以《工人綱領》為題出版過小冊子。這是一八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在當時機器製造工人區奧蘭寧堡（柏林城郊）手工業協會發表的，因此可能是對工人聽眾講的。就其內容而言，是針對工人的。從標題就可以看出，講演是論述工人階級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問題的。它指出，現代工人階級是怎樣由於機器技術的發展所引起的生產條件的改變而形成起來的，由於階級地位，它代表著而且必然代表著新的社會原則，一切人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原則，廢除一切特權的原則。拉薩爾說，這一原則要求以平等和直接的普選權為其實現的手段。人民應當永遠把這一權利看作“自己不可或缺的政治鬥爭手段，看作其要求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條”。這一原則的道德內容是要求把社會生活建立在團結的基礎上、在

发展中一致和互惠的基础上。最后，这一原则要求把国家变成这样的社会，它“完全自願地并最彻底地”实现至今只是点点滴滴地从它那儿夺得的极不完整的那些东西；它要求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全面实现人类所能达到的文明。和直接的普选权相反，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存在着凭资格投票的选举制，这种制度使选举权取决于财产或收入，而这种选举制的最恶劣的形式乃是普鲁士强制施行的三級选举法。关于賦稅的立法也同样反映了现代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使間接稅制度发展到前所未聞的程度，把国家的大量开支放在貧苦人民的肩上。然而，除此以外，资产阶级社会的特点还在于使任何权利都取决于财产。而工人阶级，——拉薩尔接着說，——力求祛除所有这些限制，工人们将因此而处在幸福的境地。凡是代表他們真正利益的东西同时也是推动道德发展的根本原则。因此，工人可以怀着个人的激情投身于历史发展；他可以坚信，这种激情越有力、越飽滿地掌握了他，那末他就成为越有道德的人。工人应当充滿这种思想。让它的崇高的道德严肃性掌握他們所有的人，让他們的生命无愧于它！“被压迫者的恶习，沒有头脑的人无所事事的寻欢作乐，甚至小人物天真的輕率，——現在这一切都是和你們不相称的。你們是应当据以建立起現代教堂的山岩！”

最后这段话是讲演的中心。并且可以說，在这以前讲演中还未曾用过如此优美、隽永的語言来贊揚工人阶级的使命。讲演自然不是无懈可击的。如果說拉薩尔在讲演的题目、以及在讲演的正文中經常提到工人等級，那么在这种場合他只是采用了当时流行的說法，对現代工人阶级的真正性质他絲毫也沒有誤解之处。拉薩尔当然知道，“工人等級不是旧的各封建等級意义上的等級”。他使用的等級这个詞在这里和阶级这个詞在意义上是全然相同的。只是在今天这个詞才专门用来表示各种职业集团，如社会阶层或集团，例如常常說教师阶层、医生阶层、商人阶层^①等等。但在拉薩尔那儿，这个詞的用法含有另一种性质。通常拉薩尔是

非常严格地选用合适的說法的，因而，使用“等級”这个詞表明了他所固有的那种傾向，即在討論社会政治問題时常常轉向形式的法学观点上去。例如他把资产階級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所建立的一些法权机关看作是资产階級发展的普遍典型現象，也就是說，他好像把它們看作某种僵化的东西。这从拉薩尔所規定的资产者的概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没有把小市民归入资产者之列，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按照他的看法，资本家只有当他把自己的财产、資本变成参加国家政权的条件的時候才成其为资产者，也就是說，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一个人的經濟地位，而是他的政治法权地位，或甚至只是他的政治观点，这种限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拉薩尔所指出的那些东西本身自然是完全正确的，他在这儿是想指出与存在于貴族和封建主之間的差別相同的那种差別：貴族只不过就其出身来讲是貴族，而封建主则依据其出身，享受封建权利或要求享受这些权利。但是不能这样来縮小一般的階級概念。除了某些从整个說来未必具有什么本质意义的其他毛病而外，应当說这篇讲演是篇卓越的作品。这是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語言写成的，它表明作者真正科学地洞察了历史事件。所有閱讀这一讲演的人都不能不被文中真正崇高的語言的迷人魔力所折服。可以把这篇讲演叫做工人階級的一曲頌歌，而只要地球上一般地还存在着工人运动，那么《工人綱領》也将作为这样的歌而长期流傳下去。

九、拉薩尔的刑事案

《科学和工人》的演說和論間接稅的文章

拉薩尔在其讲演中一个字也沒提到暴力。他完全客观地談論和工人階級对立的那些階級。他认为，宣布工人階級思想，这是

① “等級”和“阶层”两个詞在这里原文都是 Stand，只能根据詞的不同搭配来譯。——譯者注

“和解的呼声”^①。他甚至向工人宣布說，“既經合法获得的任何财产都是完全不可侵犯而合理的”。就是这样，拉薩尔还是没能幸免根据旧普魯士刑法中声名狼藉的关于煽起仇恨和蔑視的条文的指控。拉薩尔把他的讲演交付柏林的一家印刷厂印刷。但是印刷厂剛把样本呈交警局，警局就馬上命令把所印的三千本全部沒收。只有早先印刷厂寄給拉薩尔的那五十本逃出了警局之手，而且一八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他家搜查时也沒有被搜出来。此外，对拉薩尔提出了刑事起訴，一八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柏林刑事法院进行公开审判。拉薩尔由本人作辯护。在这里他发表了精心草拟的演說，这篇演說后来曾以《科学和工人》为题公布。它以雄辯的語言徹底駁倒了起訴书，并且在許多地方成功地利用哲学家謝林反对他儿子的办法，使起訴书的作者——檢察官謝林直接陷于四面受敌的处境。謝林先生自然知道拉薩尔的意图，他有預見地避免出庭，而让他的一名助手代替他。审判具有相当大的戏剧性。拉薩尔和檢察官及法官之間不止一次地发生爭論。有时法官威胁拉薩尔，要剝夺他的发言权。有时被弄得走投无路的檢察官要求法官真的对他采取这一措施。但是鉴于法庭上有很多著作界的代表人物，因而法官們不敢冒然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然而尽管拉薩尔出色地进行了辯护，他还是被判处四个月的徒刑和賠償訴訟費用。此外，还对他提出了污辱檢察官謝林的新的控告。該案于一八六三年四月二十日在柏林刑事法院第四分院审理。这一次拉薩尔被判处一个月的徒刑。檢察官甚至要求給与三个月的徒刑，作为污辱謝林（儿子）的懲罰。但是这一判決由于审判时手續上的差錯，后来（一八六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被柏林高等法院撤銷，案件重又退回初审法院，在这里似乎就无声无息地了結了。

至于第一个判決，拉薩尔向高等法庭提出了上訴。他在一篇

^① 这句话較費解。拉薩尔在《工人綱領》中的原語是：“从我向你們解釋过的意义上說，宣布工人等级的思想为社会的統治原則，这絕不是号召各社会阶級分裂和互相敌視，这是和解的呼声……”。——譯者注

以《間接稅和工人階級狀況》為題的論文中提出了論證。由於判決認為應受懲罰的主要是拉薩爾關於間接稅制度的階級性質的論斷，因而拉薩爾把其辯護的中心放在論證相應的論點上。拉薩爾把上訴狀寫成演說的形式。它在開庭以前已經出版了，因而在法庭上拉薩爾只宣讀了其中的個別地方。這是一整篇論述間接稅制度及關於它的影響的文章，而且在這方面，它是一本偉大的啟蒙著作，其中許多地方至今仍然沒有失去價值。拉薩爾的這一著作是他研究國民經濟學的卓越成果，關於這種研究他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曾經提及。辯護的結果，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九日高等法庭在判決中雖然宣布他的演說是應受懲罰的，然而判決已改為對拉薩爾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一百塔勒的罰金。

這裡還應當提一提，除了這兩個辯護詞以外，拉薩爾還發表了在初級法院審理此案的速記記錄和對判決的冗長的評論。兩者都以《拉薩爾刑事案》（第二和第三分冊）為題作為小冊子出版。

其次還需要指出，在兩個辯護詞中拉薩爾對待資產階級的語氣有值得注意的區別。在第一篇發言中還可以聽到和解的語調。它的結尾說：“資產階級和工人，我們同是人民的成員，並且完全一致地反對我們的壓迫者！”但在第二個發言的許多地方已經表示要對自由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當時自由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的代表人物被描繪成現代的野蠻人，為了剝削的利益，他們會非常樂於消滅國家本身，也許會把法庭和警察減到最低限度，通過股份公司來進行戰爭。拉薩爾在這裡向他的法官們大聲疾呼說，“我和你們一起保衛自古以來一切文明的維斯太的火焰^①——國家，反對這些現代的野蠻人。”

這時候他在外面已經開始和進步黨展開了公開的鬥爭。

① 維斯太——古羅馬灶神，這裡意謂永不熄滅的火焰。——譯者注

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

《公开复信》；《論工人問題》；《工人讀本》

上面我已經提到，一八六二年夏拉薩爾訪問了倫敦。从一八六八年馬克思給約·巴·馮-施韦澤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这时候拉薩爾已經同他交談了关于自己在工人中进行大规模的鼓动的计划。馬克思說，他曾劝拉薩爾不要把关于普选权和國家給生产合作社以貸款的要求提到第一位来。

这一年夏天还有许多德国工人代表团去倫敦参观世界博覽会。他們大部分都是受自由主义分子领导的。同年夏末，八月二十五日，在柏林召开了工人大会，会上訪問过倫敦的机器制造工人埃希列尔作了关于博覽会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召开德国工人代表大会。在城内不同地区召开的另外六个大会也通过了相同的決議。于是在最后一次大会上终于选出了一个由二十五人組成的委员会，負責筹备代表大会。一八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柏林《人民报》在編輯部专栏公布了該委员会邀請参加代表大会的号召书。号召书由二十一人签署。大会的議程規定如下：

- 1 和 2. 实行工商业自由和在圣德迁徙自由。
3. 議訂工人合作社和伤残儲金会的基本章程。
4. 在柏林举办世界工业博覽会。

尽管这一議程是无可指摘的，尽管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在議程前面所加的相当含糊的序言是毫无害处的，但是，它还是在当时的自由主义領袖中間引起了恐惧。在刊登号召书的同一期《人民报》上，在編輯部的贊許下发表了著名的进步党領袖阿·施特列克弗斯的一篇文章，急切地恳求工人們鉴于緊張的政治形势，放棄关于代表大会的念头，代表大会只会对反动派有利，而在目前的时刻应当把人民的全部力量用于爭取宪制的斗争。

但是，這篇文章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工人們不願未經繼續討論就放棄自己的想法。因此，最後同意把問題的決定交由十一月二日召開的會議去處理。

這時候（而在某些地方甚至還要早一些），在柏林、萊比錫、馬格德堡、紐倫堡、漢堡以及德國的其他一些地方工人已經活躍起來。一八六二年春天萊比錫工人教育協會甚至鬧得分裂了。比較激進的會員，其中包括工人弗利契和瓦爾泰希，化學博士奧托·達麥爾和洛斯麥斯列爾教授組織了以“前進”為名的單獨協會。瓦爾泰希在其所著《斐迪南·拉薩爾和德國工人運動》一書中說，還在一八六二年夏天拉薩爾的小冊子《論憲法的實質》和《工人綱領》已在這一協會中廣為傳播。它們在各種會議上被宣讀，並產生了極為強烈的影響。其他地方的工人無疑也讀過這些小冊子。

在萊比錫也有人擁護召開全德工人代表大會的思想。為此目的這裡選出了一個委員會。埃希列爾從柏林向它發出了號召，而且後來還親自來到萊比錫。在這裡他大罵進步黨並証實說，事實上已經获悉普魯士政府準備為工人們做一些事情，作為一個開端，它同意提供三萬塔勒供建辦生產合作社之用。但是這一聲明產生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後果，它只是引起人們對這位使者的懷疑。最後，決定派遣弗利契和瓦爾泰希作為代表出席十一月二日在柏林召開的會議。

與會人數極多，會議開得非常熱烈。工人們憤怒地控訴對他們實行監護的企圖。會前曾同進步黨首領進行談判的弗利契和瓦爾泰希用和解的聲調講了話；他們號召工人們在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中站在進步黨一邊。代表大會必須延至一月底召開。最後，在熱烈的掌聲中，以合作運動的倡導者而著名的進步黨議員，舒爾采-德里奇開始講話。他表示同意為籌備代表大會的召開而發表幾次關於勞資關係的講演。他說，如果民主不能使工人階級的境遇改善，那他完全同意把民主叫作空話。以後還有其他幾個工人發了言。然後決定，萊比錫工人打算召開的代表大會延期，並委託

萊比錫委員會籌備大會召開事宜。

就在这时候曾有人试图使萊比錫代表亲自同拉薩尔接触。奥托·达麦尔的一个朋友，年轻的柏林民主主义者（以后成了厂主）路德维希·列威曾设法把他们领到拉薩尔家里。但是，如瓦尔泰希所说的，拉薩尔是很难在家里碰到的。因而，起初拉薩尔和萊比錫代表之间只限于通信联系。后者，即瓦尔泰希、弗利契及其亲近的朋友们，心里根本就不愿听命于进步党，但是他们还没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去和它公开决裂。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奥托·达麦尔受萊比錫“前进”协会常委会的委托，邀请拉薩尔参加该组织的成立大会。拉薩尔回答说，他目前没有时间，但是他希望几个月以后能去萊比錫，以便有机会“观光一下协会生气勃勃的工作”。达麦尔给拉薩尔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似乎也是以常委会的名义写的），要求拉薩尔来领导独立的工人运动。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拉薩尔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表示基本上同意这种要求，并略述了其整个政治和著作活动的概况，人们可以由此了解到他对工人政党的态度。这封信和拉薩尔致萊比錫工人代表的其他信件一起，由海爾曼·昂肯发表在格呂恩貝尔克所編《社会主义历史文庫》（第二年集第二——三册）上，这封信对评价拉薩尔极为重要，因此我們把它列入本书附录之中。这封信获得了好評。又经过一些通信之后，一八六二年圣诞节，达麦尔、弗利契和瓦尔泰希去柏林訪問了拉薩尔，拉薩尔向他们阐述了自己的綱領，并同他們商定了进行公开活动的全盘作战计划。作为向自由主义者进行的最后一次試探，萊比錫人向德国国民联合会的一些领导人提出建議，希望修改章程中关于会費的規定，以便使工人也能入会，此外，他們还問这些人，是否打算把普选权作为綱領性要求写在該联合会的旗帜上。但是这两个要求都沒有得到多少支持。国民联合会的首領們根本不願意有大批的工人加入自己的队伍。显然，他們非常不喜欢在柏林和萊比錫，以及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汉堡所发生的事情。工人们听到的答复是：他們可以自认为是国民联合会的荣誉会员。与

此同时，同意把年会費改成按月繳納。至于普选权的要求，一部分领导人连听都不願意听，而另外一些人則声称，現在还不是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甚至許多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一些有激进情緒的工人也贊同后一种意見。据說，法国路易·波拿巴就是在普选权的帮助下战胜了一八四八年的共和国的，并且在議會中拥有为他服务的俯首听命的多数。因此在許多激进分子的心目中都认为在人民群众当时的文化水平下，普选权是沒有絲毫用处的。

事实上也不应当忘記，当时德国很大一部分工人政治上和經濟上仍然是相当落后的。手工业帮工占工人的絕大多数，对他們来說，帮工的地位仍然是通往独立工匠的过渡阶梯。他們在工匠那里吃住。因此，他們远未感觉到自己是國家的公民。同时，当时的资产阶级也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工人，由于它以自己受过教育而自負，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在它的眼中所有的工人全都是未成年的，或至多也只是半成年的人。許多自由主义者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正是經常受对工人的这种片面的、缺乏远見的估价所决定的。清楚地意識到真正的階級利益的对立在这儿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同时，一八六三年初科堡国民联合会领导人費多尔·施特萊特律師創辦了頗为激进的《工人日报》。在其版面上时而出現对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他自由主义經濟政策代表打算用以解决工人問題的那些方案的批評。这部分地显示了拉薩尔的直接影响。回到萊比錫以后，这些使者們在他們的协会中宣傳了拉薩尔的思想并且促使当地筹备代表大会的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完全像自由主义分子秋天所做的那样）反对匆忙地召开代表大会。但这是另有所图的。一八六三年二月十日，在公布这一声明的同时，委员会決定写一封信給拉薩尔，其中援引了他在《工人綱領》中所發揮的思想，并且指出工人們对舒尔采-德里奇的草案持有不同意見。因此委员会請拉薩尔用他方便的形式就工人問題、工人应当选用的手段、特别是合作社的意义发表意見。信中写道：“我們认为您在上述小

册子中所阐述的观点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完全能看出您今后所告知的意见的真正价值。”

拉薩尔以一本题为《給筹备莱比錫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的小册子(书上标明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三月一日)作为对该信的回答。

在此小册子出版以前，拉薩尔曾在一八六三年三月十三日給达麦尔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詳尽地談到了这本小册子，及其在目前蓬勃开展的运动中的预期影响和未来的地位。这封信对認識拉薩尔的形象也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們决定在附录中全文公布这封信(保留拉薩尔所作的記号)。

这本小册子的問世开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历史。

这封公开复信在形式上显示了拉薩尔著作的全部优点：淺显易懂的語言和深思熟慮、邏輯严密的結構。拉薩尔从政治方面对进步党在議會中的言行提出了他在《現在怎么办？》和《强权和法律》小册子中已經提出过的批評。拉薩尔說，該党怯懦的和前后不一的行为使每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都无法留在它的行列之中。在經濟方面，拉薩尔坚决反对让工人們把時間耗費在討論那些諸如迁徙自由和工商业自由等早已成为街談巷議的問題上。同样，問題不在于改善工人个人的状况，而在于提高工人这一階級，这一“整个工人等級”的正常生活水平。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靠进步党人舒尔采-德里奇建立的那些合作社还是不够的。信貸合作社以及类似的組織是为从事小生产的那些人和手工业者而設的。但是就是对手工业阶层它們是否能給以帮助还是值得怀疑的。誠然，消費合作社能給雇傭工人带来暂时的好处，但是，作为不断提高的手段，它是不中用的。因为它无力反对下列事实，即在供求影响下工資經常重新降低到通常仅够維持生命所必需的水平。这一事实，这一殘酷的铁的規律在資本主义經濟下决定着工人的状况。因此，如果謹向工人讲改善他們的境地，工人就应当首先問問他，他是否承认工資的这一經濟規律，以及他能提出什么样的克服办法。

如果他不承认这一规律，那么他或者是无知，或者是有意欺騙他們。如果他不能提出有效措施，那他只不过是空談家。只有一种和这种工资规律作斗争的真正手段：这就是通过合作社使工人等級变成独立的企业主。在小范围内这是做不到的。而在大范围内，由于工人缺乏资金，只有国家通过贷款向工人提供必需的资金才能做到。工人不应当被“国家资助”一詞所吓倒，因为国家提供援助并不排除社会自助。而到底什么是国家呢？被压迫阶级组成了居民的絕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六。“你們貧苦阶级的大联合——这就是国家。”

拉薩尔接着說，当然，像目前这样組織起来的国家是不願向工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普遍直接的选举权才能迫使它这样做。普选权，这不仅是工人的政治原則，而且也是他們的基本社会原則，是一切社会援助的根本条件。因此工人必須組織在巨大的全德工人联合会里，联合会应当以英国“反谷物稅同盟”为榜样，为普选权进行不懈的鼓动。为了获得一定的实际效果，必須把全部力量集中于一点。“不要左盼右顾，对一切不帶直接的普选权字号的、或与之无关的、以及不能引向它的东西要置若罔聞！……这是你們致胜的旗帜！对你們來說，再沒有别的旗帜了！”

这就是公开复信的内容，关于这封信拉薩尔在給他住在杜塞尔多夫的朋友古斯塔夫·列維的信中完全有权利說：“这一切讀起来是那么浅显易解，它使工人立刻觉得，这一切他好像早已知道了。”他本来想让小册子发生像一五一七年路德張貼在維登堡教堂院前的論綱那样的作用。然而，工人等級一般地說也許还没有成熟到这地步。

公开复信在工人中間所引起的反应整个地說起初还是不强烈的。自由派报刊对拉薩尔发起了瘋狂的攻击，指責他分裂民主力量，宣布他的工资铁律是无稽之談，而拉薩尔关于合作社的思想只不过是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的建議的翻版。一八四八年法国国民工場的破产业已证明它是无法实现的。同时对拉薩尔所引

用的統計数字的准确性也表示怀疑。由于自由派首領当时頗有聲望，并且掌握了在人民中流行的报刊，因而他們轻而易举地在絕大多数工人协会里通过了反对拉薩尔的決議。拉薩尔的著作只有在那些依然保存着一八四八年社会主义运动的傳統的工人核心心里才得到同情和支持。

拉薩尔竭尽全力来反駁自由派的这种批評。一八六三年四月十五日他在萊比錫的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說，逐点分析了对手的全部論据。这一演讲的詳細記錄曾以《論工人問題》为题作为小册子发表。在这次会议上教师薩洛蒙曾发言反对拉薩尔，他是在拉薩尔之后从柏林来的。拉薩尔很容易地就击败了他，絕大多数与会者都贊同根据拉薩尔的精神起草的決議。四月底拉薩尔在萊比錫《德意志总汇报》上发表了《一八四八年法国的国民工場》一文，駁斥了认为馳名的“国民工場”和路易·勃朗的計劃是一回事的上述說法。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二日他在柏林《福斯报》发表文章，答复海得耳堡政治經济学教授卡尔·勞对他的攻击。同时五月初他还在柏林各报发表了《胡伯尔教授对工人問題的意見》一文。拉薩尔试图利用保守派社会政治家 V·A·胡伯尔发表在《德意志总汇报》上的一封信来进行論战。在所有这些文章中，只有第一篇是能完全令人信服的。拉薩尔曾打算引用勞本人的教科书来批駁他关于工資铁律的論断。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拉薩尔完全忽視了书中許多有待于爭論的論点。而他利用胡伯尔的企图使他在合作社問題上犯了极大的錯誤。后来胡伯尔在《工人及其謀士》一文中毫不容情地指出了这点。

在从事这些公开活动的同时，拉薩尔在书信中加紧展开了宣傳活动。他不願使新建的联合会单具工人性质，而竭力把资产阶级的各种各样的代表吸收到它的队伍中来。只要有希望把资产阶级的某一学者或任何一个著名人士吸收到联合会来，或至少能給联合会带来好处，他就会孜孜不倦地去写一封又一封的长信。当他企图把某一道地的庸人說成雄獅的时候，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常

常会鬧出一些笑話来。但是，总的說来，当你看到他为了把著名人士或他认为这一类的人物吸引到运动中來而白費了許多精力的时候，你就会不由地对他产生深切的同情。因为他的努力很少有奏效的。或者是全部事情以“不行”告終，或者即使被糾纏的人因劝說而道出了“行”字，但随后却不为拉薩尔的联合会尽一点力。

在那些尽管拉薩尔竭尽全力而最后还是报以冷淡的“不”字的人們中間，也有社会問題理論家卡尔·洛貝尔图斯。正是在这时候，拉薩尔给他写了一連串的信，这些信对评价作为政治經濟学家的拉薩尔具有重大的意义。像其他許多反对資產階級曼彻斯特学派^①而接近拉薩尔的学者一样，洛貝尔图斯坚决反对普选权和工人的政治运动。他在給萊比錫工人的公开信中說明了这种敌对观点，这使拉薩尔很为痛苦。洛貝尔图斯甚至还是拉薩尔合作社思想的坚决反对者，他攻击这一思想，从而使拉薩尔非常难堪。事实上，拉薩尔关于用国家信貸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观点中包含着一个很大的矛盾。有时这是舒尔采-德里奇式的个体合作社，只是规模大一些而已；有时它却像生产組合，包括該行业的全体工人，因而必然具有壟断性质，但它不是整个社会的企业，而只是加入这个組織的工人的企业。因此，像洛貝尔图斯这样有理論修养的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难把拉薩尔逼得走投无路的。然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拉薩尔以自己的文字論战表明，他是完全能和洛貝尔图斯相匹敌的。

关于合作社思想这里还需要簡短地指出几点。

无疑，起初拉薩尔对这一思想尚缺乏研究。他自己說，关于国家資助生产合作社的要求他是从一八四八年借用来的，那时这一思想在人民中間极受欢迎。而事实也是这样，早在一八四八年，特别是在萊茵区社会主义者已經提出了这种思想。稍迟，同一思想

^① 曼彻斯特学派是英国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在反谷物法中出現的工业資產階級的经济学派，主張自由貿易，反对国家对經濟生活的干預。其主要代表是曼彻斯特城的科布頓和布萊特。——譯者注

又在經濟比德國較為發達的英國，在和馬克思交好的憲章運動者的激進派的綱領中出現。這是下列經濟制度的必然產物，這種經濟制度已經超出了小資產階級生產的範圍，但是它還沒有被大資本主義生產所控制，因此，工人的利益在這兒還不能成為社會的利益。這特別表現在那些國家和鄉鎮的**管理權**還完全掌握在有產階級或專制官僚手裏的地方。在這些條件下，生產合作社是把工人從僱傭奴隸制中解放出來的最合適的手段。而只有在國家信貸的資助下生產合作社才可能高於小資產階級水平。顯而易見，在這種社會制度下，生產合作社**勝過**消費合作社。一方面，工人（特別是在拉薩爾時代易北河以東的普魯士）作為消費者在社會中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手工業幫工還根本不是獨立的消費者）；另一方面，小商販卻又和整個社會生活密切相連。顯然，消費合作社幾乎到處都會碰到巨大的困難。而拉薩爾是對的，他斷言，個別工人可能從消費合作社獲得的利益，但由於對其工資的加緊壓榨，它又會從他的手中跑掉。只要工會還未擁有強大的合作社組織，他們就不能和壓榨其工資的現象進行真正的鬥爭。

拉薩爾對工會的估計是很低的。而這也同樣是由當時德國、特別是普魯士的經濟和政治狀況所造成的。甚至在英國，當時工會在鬥爭中也常是失敗多於勝利。在三十、四十年代的革命時期之後英國的工會運動收縮得很厲害，大部分組織內部還不夠穩定，而一八五二年英國機器製造業工人的鬥爭在拉薩爾腦海中還記憶猶新。關於這點我們可以从拉薩爾和馬克思的通信中看出。拉薩爾曾帶着極大的興趣關注這一鬥爭。儘管犧牲慘重，鬥爭還是以工人的完全失敗而告終。顯然，拉薩爾忽略了，正是這次鬥爭出色地證明了工會運動的驚人適應性。然而，即使他不是沒看見，即使他真正了解到，儘管遭到了失敗，但是機器製造工人聯合會終究還是繼續存在並得到發展，那他在这里看見的也只能是“商品-勞動力圖以人的形態出現”的頑強的堅持性，因而他就會更迫切地想到把德國工人從這種“貧困”（用他自己的話來講）中拯救出來。自

然，联合会尽管继续存在着，但是却沒有取得什么可称道的显著成就。

总而言之，拉薩尔的錯誤在多数场合是其时代的錯誤。这些錯誤是当时的条件在一个社会主义者意識中的必然反映，他认清了发展的总趋向，并为用組織工人和要求国家資助的办法去促使共继续前进的思想所鼓舞。对拉薩尔來說，使国家民主化的手段除普选权外，主要就是**国家資助的原則**，并且是在**广大範圍內的資助**。他把这和組織工人生产合作社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当时社会主义思想界对这一思想极感兴趣。两年以后，我們在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中、接着又在該协会代表大会的決議中再一次看到了这一思想。当时拉薩尔的建議並沒有遇到社会主义观点的认真批評。甚至馬克思也沒有提出这种批評，他在上面提到的給約·巴·馮-施韦澤的信中也只是更多地批評了拉薩尔計劃中甚至也为他本人所一再否定的方案，而且沒有提到草案在經濟方面的缺点。相反地，資產階級在这方面的批評倒要多一些，例如，拉薩尔的对手舒尔采-德里奇就提出过这种批評。但是資產階級对拉薩尔的批評也沒能在工人中发生应有的影响，因为他们沒有揭示生产合作社思想之所以不适用的深刻的經濟原因——这种批評对那些就生产合作社問題拟訂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方案也将会是致命的批判。同时，在这种批評中还混杂着对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的虛偽的粉飾，这种粉飾恰好就成了拉薩尔对手的致命伤。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七日和十九日拉薩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演說的时候，这一切清楚地暴露出来了。这些演說的結果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受資產階級領導人影响的美因河地区的各工人教育协会表示反对拉薩尔。这以后不久，四月十九日在呂德耳海姆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路德維希·毕希納博士在会上作了一个客观的报告，然后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在討論过程中有些发言者表示支持拉薩尔。根据 L·桑納曼的建議，决定四星期后召开

第二次大会，既邀請舒尔采-德里奇，也邀請拉薩尔參加。舒尔采-德里奇借口忙拒絕參加，而拉薩尔却接受了邀請，并于五月十七日在会上发表了演說，大厅里的大多数听众都是各工人协会的会员和代表，其他的工人听众只让呆在走廊上。在开始演說的时候，拉薩尔对这种安排提出了批評。但是显然他只是想以此指出，他只好在对他们怀着敌对情緒的（正如各协会单独表决时所表明的那样）听众面前講話，否則这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相反地，不寻常之处倒在于大会的經過。拉薩尔在自己的講演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和統計資料。对他來說重要的是反对资产阶级批評家、捍卫自己关于铁的工資規律的原理。他想证明，这一原理是为科学所承认并为事实所证实的。这一爭論不能不涉及像土地肥力递减率这样一些重要問題，这且不提，单是拉薩尔所引用的資料本身就已搞得听众头昏脑脹了。而摘自各种著作的无穷尽的引文使大部分听众头都听疼了。拉薩尔的演讲已經拖了約四小时了，越来越頻繁地传来了該結束了的喊声，拉薩尔只好自己中断了講演。其拥护者之一木匠海曼代他宣布，两天后他将在下次工人大会上讲完自己的演說。

在这第二次大会上拉薩尔首先發揮了他的合作社思想，闡述了社会問題和政治問題之間的实际联系。然后轉入了当前的政治問題，并以其慣有的尖銳性猛烈地抨击了进步党。他再一次強調說，他不打算建立某种工人們的特殊阶级政党，他只想打起民主的旗帜，一視同仁地既号召资产者，也号召工人們站到这一旗帜下面来。但是工人由于其阶级地位的緣故应当是民主的主要支柱。正因为他把阶级利益作为政治自由的基础，因而他創造了使民主必然取胜的条件。

拉薩尔以极大的热情所說的这些話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至今还不拥护他的听众爭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了。这还因为某些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从倫敦流亡回来的伯恩哈特·貝克尔，在这以前已經用了数星期时间在法兰克福进行了支持拉薩尔的口头和文字的大

力宣傳。會上通過了符合拉薩爾精神的決議。反對的只有占無足輕重的少數舒爾采-德里奇擁護者，他們在向自己的領袖表示敬意的喊聲中退出了會場。

一天以後拉薩爾在美因茲工人大會上講了話，據貝克爾說，參加大會的約有七百人。這裡一致通過了他的決議。

三天以後，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萊比錫名人紀念堂的大廳里全德工人聯合會宣告成立。總共十二名代表代表了十個城市（巴門，德累斯頓，杜塞爾多夫，愛北斐特，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漢堡，哈爾堡，科倫，萊比錫，美因茲，佐林根）。此外專門邀請了法蘭克福的伯恩哈特·貝克爾、阿爾托納的卡爾·布龍、萊比錫的愛·呂文塔爾和伍特克教授以及拉薩爾本人。拉薩爾的朋友漢斯·馮·畢洛夫以來賓的身分列席。聯合會是建立在嚴格的集中制的基础上的，之所以這樣，部分是由於德國的結社法禁止各政治協會之間發生關係。由五年一任的主席領導（這一條曾遭到某些反對），在需要時主席有權任命副主席。這一切自然是以拉薩爾將當選主席為前提的。而他也真的是以僅一票（哈爾堡的泰奧多爾·約克）反對的多數當選了。經過某些猶豫之後，拉薩爾同意接受主席的職位。在主席下面設有理事會，由分布於全德的二十四名理事組成。十四名理事當時立即選出，而剩下的位子留給以後加入聯合會的那些城市。

這一切是在秘密會議上決定的。然後在晚上舉行公開會議，約有六百名工人參加。在這裡隆重宣布全德工人聯合會成立。

總共只有十二人代表十個城市！真是個微小的數目。十四天以後，一八六三年六月七日，仍在資產階級領導下的德國工人協會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了代表大會。五十四個協會派去了一百十名代表。當然，資產階級的報紙那時有理由來挖苦拉薩爾的“死產兒”。但是海爾維格已經為共產黨人高歌道：

別嘲笑這一星點兒人；

羅馬的雄鷹是被

比这还少的使徒击落的。

是的，在莱比锡的只是些使徒。但他们所开始的运动是必然会使雄鹰战栗的。

十一、拉薩尔在联合会的初期 活动和策略的改变

莱茵“閩兵”讲演

但暂时离此尚远。年轻的联合会还必须为自己的继续发展，为其成员的增加而操心。为此必须加紧开展鼓动工作，必须继续拉薩尔所开始的事业，即必须找到鼓动者和组织者并把他们派往各地。但是年轻的联合会没有为此所必须的资金。联合会在各地建立了分会。但是新会员的数目是非常不足道的。而且新会员也经常不按时缴纳会费。收到的会费远不足以维持联合会的生存。显然，在这种条件下要做什么大一点的事情都是不可想像的。联合会的一些创始人十分希望拉薩尔本人能提供必需的资金。但他们的指望落空了。拉薩尔过着閩縉的生活，并且几乎把全部收入都用在他个人的花费上。他什么也不能给予联合会。这使某些人感到不满。伯恩哈特·貝克尔說拉薩尔“吝啬”。但这是不正确的，拉薩尔不是为金钱而追求金钱的人。这种情况只是说明了拉薩尔性格的两重性。在《公开复信》中他指示德国工人以英国反谷物税同盟的鼓动为榜样。然而，他本人也不妨向这一同盟的首领理查·科布頓学习一些东西。他正好特别缺乏后者的朴实和沉着的坚毅精神。有时他展开了超乎常人的活动，而接着一下子又完全停下来了。他虽然领导工人运动，但并没终止资产阶级贵族式的生活。因此，他帮助联合会的金额只能是微乎其微的。而靠这一点资金是不可能向全国各地派遣合适的宣传员的。

因而拉薩尔首先大力展开通讯活动。他为把“著名人士”吸引

到联合会来而终日奔忙。他极力劝说许多一八四八年的老民主主义者加入联合会。一旦达到了目的，他极乐意让加入的人担任联合会的高职。例如他任命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为瑞士首席全权代表。考克门的律师马丁任议员时曾表示支持他关于议会罢工的建議，拉薩尔任命他担任东普魯士省的首席全权代表。但是，即使拉薩尔做得恰巧相反，即任命住在苏黎世的海尔维格为东普魯士的全权代表，而住在考克门的马丁为瑞士的全权代表，那联合会也不致因此遭受任何損失。他們两人都同样不善于为联合会征集新會員及完成联合会的任何工作。在和著名的民主派代表相处的其他場合，拉薩尔也碰到过同样的遭遇。在加入联合会的著名人士中除上面讲到的以外，首先应该提到的还有莫澤斯·赫斯，德国的第一批社会主义战士之一；其次是法兰克福的律师約·巴·馮·施韦澤，他在这以前已經以自己的某些著作而聞名。

我們不打算在这儿叙述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历史。我們只想評論一下作为联合会领导人的拉薩尔的活动。因此，我們不可能細述工人階級和小資产階級中的許多人的功績，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新的运动。我們只是簡單地說一下：如果在最初几年在拉薩尔沒有参預下联合会曾有所建树的話，那么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这些“无名者”。

宣布任命馬丁律師为首席全权代表的文件签署的日期是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其前言中通告，拉薩尔将作一次水上旅行，在其外出期間任命奥托·达麦尔为联合会的副主席。联合会成立后一共还不到五个星期，就发出作“水上旅行”(原文如此)的通告，这就不能不引起敌人的譏笑和工人們的驚訝。因为这是和工人們原先对工人階級領袖所抱的看法背道而馳的。和現在比起来，当时更把水上旅行看作純粹是特权人物的奢侈玩乐。通告的其他內容也傳为笑柄。拉薩尔得意忘形地列举联合会所获得的成就：《十字报》法律顧問瓦盖納在一次讲演中表示贊成建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产业評議會以調整工資；舒尔采-德里奇宣布成立了

三个生产合作社，有产阶级为它提供了十万塔勒作为信贷保证金。诚然，在后一种情况下，拉薩尔还有某种权利说是迫于竞争的需要而作让步的，但瓦盖納的建議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沒有和拉薩尔的竞争，而是极其清楚地表现了一种为了保守的目的而利用拉薩尔所发起的鼓动的願望。从策略上考虑如果着重指出瓦盖納方案的这一面，拉薩尔是会感到有所不便的。但在这种场合完全沉默要比这种夸夸其談的欢迎好得多，后者容易使人怀疑他进行一場联合保守党人来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賭博。

但是，拉薩尔恰好在这时候产生一种想法，用这种或那种办法利用政府，即保守党人和进步党之間的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他近三个月的水上旅行期間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更巩固了他的这种打算。拉薩尔在这段期間的生活极其活跃。他和联合会的秘书瓦尔泰希和其他会员以及許多在政治上和他接近的人保持頻繁的通信联系。和瓦尔泰希的通信表明，联合会会员数額的增长比拉薩尔所設想的要緩慢得多。它不仅沒有超过国民联合会，而且远远地落在它的后面。如果拉薩尔是打算通过不断的鼓动使运动逐步开展的話，那么开始时緩慢的步伐就一点儿也不会使他感到惶惑不安。但是他相信，他的話、他的著作具有仿佛能从地下呼唤出整个的群众运动那样的力量和說服力，而这既然沒有立即发生，他就认为自己的威望完全破产了，因而开始考虑用其他办法来补救这一失敗。

在普魯士这时候政府和議會多数之間的冲突特別强烈地尖锐起来了。在下議院里大臣們經常碰到敌对的态度。下院議長甚至决定实际上不讓他們发言。解散議會和进行新的选举未必能削弱反对派。每一次新的选举都給政府带来更为沉重的失敗。最后，一八六三年春，五月底，鉴于沒有任何其他出路，政府突然封閉議會。四天以后，一八六三年六月一日公布了新的出版法。凡蓄意詆毀政府指令的报纸，在两次警告之后得停止其出版，直至另有通告变更为止。

这一法令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但绝大多数报纸都听天由命，并且暂时停止发表社论。由于这一法令只在议会开幕前有效，因此都认为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最容易地擋住指望使反对派报刊遭受物质损失的打击。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为議員們举行了豪华的宴会，这些宴会以七月十八、十九日在科倫举办的盛大宴会为顶点，下院的議長們也应邀参加。然后于八月二十一和二十二两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了議員大会。大会激烈指責普魯士政府拒絕参加奥地利国王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諸侯大会的行为。在这一大会上打算討論奥地利政府提出的德意志同盟的改革問題。

在柏林政府影响下的那些报纸极其毒辣地嘲笑了这一切。它們嘲笑自由主义报纸的怯懦，而这些报纸之所以在限制面前俯首听命并不是毫无打算的。它們俏皮地挖苦那些被政府遣送回家而却像英雄似的为自己举行庆宴的議員們。它們指責那些参加議員大会的普魯士議員們在道德上背叛祖国。与此同时还暗示說，議員們根本没有表达全国的意志，因为三級选举制是不可能正确表达人民的真正意見的。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拉薩尔在水上旅行期間起草了新的演說。还在动身之前他就計劃对联合会萊茵地区的組織进行一次“閱兵”，同时并发表剛写好的演說。而他真的在九月二十、二十七和二十八日发表了这一演說，第一次是在巴門，然后在佐林根，最后在杜塞尔多夫。演說的題目是：《庆宴，报刊和法兰克福議員大会。社会情緒的三个象征》。伯恩哈特·貝克尔說，拉薩尔在杜塞尔多夫准备把这篇演讲付印时向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列維指出：“我在这里所写的是专供柏林的两、三位先生看的。”伯恩哈特·貝克尔决不是絕對可靠的证人，但是这一回是可以相信他的。讲演真的是为柏林的两个人而作的。而这就是：俾斯麦和普魯士国王。只有注意到这一切，在讀的时候才能理解和給以正确的评价。

这一整篇演說自始至终都是对进步党的激烈挑战。拉薩尔真的被进步党报刊激怒了。这些报刊并不仅仅限于反对他的观点，

而且不惜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它們把他說成是一知半解的空談家，是政治冒險家，甚至猜疑他是政府的秘密奸細。这一切自然极端地激怒了拉薩尔。加之他和进步党的許多首領个人間还有私怨。但这一切还不足以解釋他在起草演說所使用的那种語气。拉薩尔就上述各点从左的方面向进步党人提出了指責，这同政府的报刊从右的方面向他們提出的指責是完全一致的。不錯，拉薩尔是从另一方面提出論证的。其議論的中心点是进步党人在反对政府中行动不够坚决；缺乏不顾一切用最有效的武器来反对它的勇气。但是这些攻击的結果却只能是政府当时所希望的和所需要的，在人民的心目中贬低进步党反对派的意义。当然，拉薩尔最后还是表示在当时刚刚宣布的选举中，在政府的候选人有可能当选的选区支持进步党人。但是由于联合会軟弱无力，这在实践上沒有任何意义。对拉薩尔來說当时重要的是說服政府改变选举制度。因此他在演說中特別強調了下列一点：現行普魯士宪法已經失去任何合法根据。自由主义分子对破坏宪法的抗議他称之为“伪善的叫喊”和“背叛民权”。国王对这一宪法所作的誓言同样不具任何意义。議會多数为維護宪法所作的一切斗争对民主派都不具“任何原則意义”。恰好相反，民主派所关心的是使普魯士宪法“尽快地消失”。但是，“只要还没有普选权，只要我們因此还没法处在独立的地位上，那么从策略观点看来，在这之前对我们最为要紧的是让反动派和进步党人之間的这一斗争再繼續下去”。为了“使进步党之树长不到天上去”，“俾斯麦先生已經在費尽心計了”。“因此，我們在必要的时候就必須設法不让进步党人为反动派所吞噬”。（《拉薩尔全集》第二卷第 661 頁）

我們可以一点也不違背严格的历史客观性而把拉薩尔的这些话看作是一种劝說柏林政府实行普选权的**食餌**。毫無疑問，拉薩尔就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和政府有若何联系，只是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他才发表这些演說的。并且它們應該像音乐一样使柏林政府感到悅耳。我們可以不管俾斯麦这时候是否真的已經考虑在

必要时試行普选权这一問題。无论如何，关于这一点是有过風傳的。而拉薩尔及其女友索菲·馮·哈茨費尔特有够好的联系以获悉柏林威廉街上所发生的事情。傳說那儿准备对选举法作某些修改。拉薩尔想从自己这一方面去巩固这种意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所說的話：“只要还没有普选权，并且只要我們因此(!)还无法处在独立地位上，那么在此之前我們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支持进步党人的”，有“因此”字样的这些話，从这一观点看是对柏林的最好警告。他什么也没保证，他根本没談到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独立地位”。他只是让政府明白，只要工人阶级沒有选举权，那么政府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工人政党有所指望。

是否可以因对政府采取这些步驟而指責拉薩尔呢？是否可以因为他使自己的讲演适合这一目标而指責他呢？

要回答这一問題并不容易。拉薩尔开始了冒險的賭博。不錯，他沒有承担义务。然而，他在演說中搞得过火了，以致把自己的弱点和自己党的弱点全暴露在他人的面前了。如果与此同时他不正确地描繪了进步党人的活动，这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他如何对待宪制冲突。普魯士宪法在形式上是否合法，这在当时完全是一个历史的爭論問題。宪法是存在的，它在生活中业已生根，并且成了进行全部政治生活的基本問題——**国民議會預算权**而斗争的基础。这一权利还成問題，对这一点拉薩尔在演說中只字未提。他故意不提这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否則他就不可能把这一宪制冲突說成是与人民毫不相干的无謂小事。当时的情况远不是这样。而全体人民也都感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一般地都关心政治問題。如果說，后来柏林工人破坏了拉薩尔的會議并对他个人表现了敌意，那么根据这篇演說看来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一方面无论如何它在政治上是該受指摘的。

但只是在这一方面以及在上面提到的一些次要問題上是如此。至于其他部分，特别是刚刚談到的策略方面，那拉薩尔是无可指責的。当然，公正点說，当时争取或保证国民議會的預算权要比

爭取普選權更為重要一些。在當時廣大居民群眾不夠成熟的情況下，普選權至少在最初階段很容易像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那樣產生一個更壞的議院。但是如果考慮一下拉薩爾是如何看待普選權的，——而為了正確地評論某一政治家，必須考慮到他的出發點，——那麼就不能否認拉薩爾策略的正確性。他對普選權的看法是和當時幾乎所有自由主義民主派分子及社會主義者不同的。他注意地觀察了法國的選舉鬥爭。他知道，雖然那里的鬥爭條件不利（省長們的壓力，對新聞和集會權的限制），但是任何選舉都帶來了從民主觀點看來是比以前的選舉更為良好的結果。因而，他堅信普選權的教育力量。也許在這裡如同別人估計不足一樣，他把它估計得過高了。當然，我們不能把普選權在今天所起的作用當作衡量的尺度，目前居民的社会成分已經和過去完全不同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今天應當承認，拉薩爾比那些簡單地摒棄普選權，或把它看作是無關緊要的人要更為正確一些。毫無疑問，普選權作為工人階級政治教育的工具、作為推行其政治影響的杠桿的確起了巨大的作用。拉薩爾懂得普選權的這一意義，他突出地強調了這一點——而這正是他最偉大的功績之一。

此外，拉薩爾的策略部分地還可以從下列情況得到辯白，即他的進步黨對手是從頑固的曼徹斯特學派的觀點來探討工人問題的。很難想像還有什麼比當時自由主義報刊對社會主義和工人問題進行的通常的討論更為幼稚的了。自由主義演說家到處演說的也是些同樣的貨色。當時普魯士的自由主義還完全處在資本主義曼徹斯特學派的影響之下。當然，從工人觀點看來，是自由主義內閣執政（它將把國家變成企業主的股份公司——如當時一位自由主義經濟專家給國家所下的定義那樣），還是由舊官僚制度（這種官僚制度還保持着某些開明專制制度的優良傳統）繼續來領導國家，這都是完全無關緊要的。容克集團和產業工人當時在經濟上還完全互不為害。甚至常有這一個或那一個容克集團的代表想仿效著名的保護工人利益的英國律師舍夫茨利別助爵，在德國扮演

社会政治家的角色。总之，諸如在当时自由资产阶级看来加强保守派就是民族的不幸的种种观点，对拉薩尔来说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只具有十分微小的意义。

因此，拉薩尔可以丝毫不捐棄自己的主張，而繼續相当放心地貫徹原来的政策。但有一条界限他是不应越过的：不应当使这一政策变成單純的賭博。作为建党的領袖，他应当顧及党的政治感及其政治教育。而任何賭博在这方面必然会起各种各样的消极作用。拉薩尔恰好忘了这一点。他缺乏通过逐步的和緩慢的工作去建党的耐性。有一次他对索菲·馮·哈茨費尔特写道，对为联合会謀利的这种微小的事情来说他觉得自己是过于巨大了。他想用突击的办法来取得胜利。但是由于用通常的鼓动方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而他打算通过賭博来获得它。在这种場合他以罕見的机智作了細心的盘算。但这终究是賭博。而既然开始了賭博，那就很容易放松对整个重大工作的領導。

这在第二次大会上就已經表現出来了，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我們現在所說的讲演。大会是一八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佐林根举行的，有数千人参加。會議进行得很激烈，事情竟然发展到动武的地步。拉薩尔总共才作了三刻钟的讲演，宪兵就宣布封閉大会。拉薩尔提出了抗議。此后五分钟市长在武装宪兵和警察护送下亲自来了，并强迫中止大会。拉薩尔深为激怒。在大批人群伴随下他去电报局发出下列电报：

“內閣首相馮·俾斯麥，柏林。

进步党人市长在数十名武装宪兵及一些刀出鞘的警察护送下，沒有任何法律根据解散了我召开的工人大会。我根据結社法提出了抗議，但沒有用。我勉强制止了人民（在射击場的大厅約有五千人，厅外还有数千人）动武。宪兵和以为我已被捕的一万人民伴随我来到电报局。埃耳勃費尔特工人的旗帜被沒收了。請尽快地依法給以最严肃的賠償。

斐·拉薩尔。”

拉薩尔自己曾竭力設法让公众知道这份电报，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他自己起草的关于这份电报的报道刊登在《杜塞尔多夫报》上，該报編輯是他的私人朋友保尔·林道。参加大会的人数本身以及他們对拉薩尔的支持都被大大地夸大了。在报道中引用了电报的原文。电报清楚地表明，这时候拉薩尔在政治上已經是多么不識分寸了。拉薩尔所控告的一个市长的政派色彩跟大臣有什么相干？他需要这个干什么？所发生的一切和內閣首相又有什么关系？他怎么能干涉管理問題？他能“尽快地”依法給予什么样的“严肃”赔偿？接二连三地不識分寸。而拉薩尔的敌人却直接获得了在民主主义群众面前把拉薩尔說成是政府的同盟者的材料。

而这电报未必是拉薩尔在火气正盛已不可能作若何严肃考虑的时候起草的。看来，这一切他在从会場去电报局的路上已經考虑好了。他比誰都清楚，俾斯麦不是审理对市长的控告的好地方。拉薩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另有所图的。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合适机会給俾斯麦寄去已經开始印刷的讲演，并且在其編后还刊载着《杜塞尔多夫报》上的报道。在那儿指出的大会参加者的巨大数额及人群对他的热烈支持的描写对拉薩尔来讲都具有极大的意义。柏林将会得到一种印象：拉薩尔至少在莱茵地区已經拥有大量的拥护者。

十二、“圍攻”柏林和俾斯麦

告柏林工入书和叛国案

在莱茵河的鼓动沒有实现拉薩尔对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人数增长的期望。不錯，在回到柏林以后，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五日他給洛貝尔图斯写道：“我几乎无法告訴您在莱茵河一带事情是多么順利。比我所能作的最大胆的設想还要好好几倍。”然而，事实上新加入的会员的数额比原来所期望的要少得多。預定至少有二千

名新會員，但实际上甚至尚不足五百人。拉薩尔不得不放棄在漢堡講演的打算，因为在杜塞尔多夫他已經搞得聲嘶力竭，甚至無法講完自己的演說。

在柏林拉薩尔重又執掌了对聯合会的領導。与此同时，他竭力在普魯士首都为聯合会爭取相当数量的信徒。他在上述給洛貝爾图斯的信中写道：“进步党人在这儿还非常强大。但在六個月之內柏林定將轉屬於我。我將对它实行圍攻。”

他用一本不大的小冊子來圍攻柏林，小冊子是在這以前的前一天寫成的。他把它印了一萬六千份，書名為《告柏林工人書。全德工人聯合會工人宣言》。在這一小冊子里他激烈地攻擊柏林的兩份進步民主派報紙——《人民報》和《改革》，它們刊載了關於他在萊茵地區召開的歷次大會的別有用心的誹謗性報道。拉薩尔在這兒重復了他在這些大會上提出的對進步黨的那些指責。他用自己的全部過去的历史及自己著作的性質極其尖銳地駁斥了用以攻擊他的、說他為反动派效勞的猜疑。拉薩尔引用其論敵之一的意見，即刊載於激進的《南德意志報》上的下萊茵河通訊作為這種指責站不住腳的見證。毫無疑問，這篇通訊是以後《工人問題》的作者、卓越的弗里德里希·阿爾伯特·朗格所寫的。通訊抨擊和拉薩尔勾勾搭搭的反動分子的目光短淺。拉薩尔在萊茵的信徒與日俱增。和進步黨的信徒比較起來，這些完全不同的另一種類型的人，是充滿了另一種激情的人。通訊寫道：“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會在什麼時候看到由運動員和射擊手組成的大軍出動來捍衛憲法。但有一點我們是知道的，如果容許一切照舊，那末拉薩尔的工人大軍就會徹底摧毀德國現行的憲法，至少會摧毀國王的權杖、王冠、星星及其他的玩意兒。”

當警局突然宣布沒收剩下的小冊子及對拉薩尔起訴的時候，已經有一萬三千份小冊子散發出去了。結果檢察總長阿德龍于一八六四年二月四日向他提出了圖謀叛國、毀謗君主政體和侮辱內閣的控告。

小册子沒有博得柏林工人的同情，他們中間最优秀的和渴求知識的那一部分人当时是屬於舒尔采手工业联合会的。許多人甚至白給也不想要这个小册子。不錯，听众也頗乐意参加拉薩尔召开的會議，但有些人是为了进行破坏才来的。由于这些资产階級和警察唆使进行破坏，联合会不止一次地被迫改变自己的会址。但是，到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底新會員的數額还是增加到二百人，然而，下列事实說明这一切是多么的不稳定：到一八六四年二月初會員的数字又下降到三十五人了。并且其中一半以上不是雇傭工人，用現代話來說，这是些学会會員。还在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拉薩尔給洛貝爾图斯写道，对柏林的圍攻卓有成效，联合会在柏林已經有二百三十名會員，他現在已經在这儿作第三次讲演了，“在讲演会上他的論敌們沒有任何显示其在場的表现”。但这一切是某种假象。論敌們沒有出席是因为會議对他們来讲已經失去吸引人的新东西，而且进步党人已經相信，拉薩尔在柏林对他們已不会有什麼危險。冬天越是一天天地过去，拉薩尔也就越难欺騙自己，“冲击柏林”并沒成功，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

在向民主主义柏林进攻的同时，拉薩尔还发动了另一場攻势，并对它寄以更大的希望，他打算把領導普魯士政府的那个人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因此，我們必須了解一八六三——六四年冬拉薩尔同普魯士首相馮·俾斯麥先生(后来的俾斯麥公爵)所进行的一系列會談。还在萊茵地区，拉薩尔就曾給俾斯麥寄去自己关于“閱兵”的讲演，試圖以之和他建立联系。到柏林后他竭力爭取和俾斯麥亲自會談。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于一八七八年夏告訴柏林《自由新聞》当时的編輯說，当时的介紹人是皇族成員之一、一位在萊茵河畔有自己的行宮的親王。一八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俾斯麥在帝國議会上反駁了这一点。他还否認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另一声明的真实性，即他好像經常會見拉薩尔。但他不得不承認，那一个冬天他不止一次地和拉薩尔进行了长达數小時的會談，而談的是普選权問題。拉薩尔竭力設法使俾斯麥相信，尽管他們的观点不同，

但他們兩人都同樣地對以普選權來替換三級選舉制感到興趣。在這樣做的時候拉薩爾極力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說服人的才幹上，他對自己的這種才幹是無限信賴的。雖然俾斯麥常常顯得遲疑不決，或者在國王及其僚屬那兒也會遇到類似的情況，但當時拉薩爾並沒有遇到特別大的阻力。當拉薩爾極力催促的時候，俾斯麥至多只是拖延。

這就是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二日拉薩爾因《告柏林工人書》的講演被控叛國時的局勢。拉薩爾的辯護人是他的朋友霍爾特霍夫律師，但實際上作辯護的是拉薩爾本人。正如在歷次審訊時經常發生的那樣，這裡也和法官等人發生各種各樣的爭論和衝突。但是在整個審訊中，最精采的是拉薩爾的一段辯護詞，在那裡他公開宣稱，俾斯麥宣布強制實行普選權，從而進行了國家政變。拉薩爾說，他被控為謀取普選權，並企圖以此推翻憲法。但是，很可能不用一年，他——拉薩爾——就會把憲法推翻，而“既不流一滴血，也不動手使用暴力”。一場巨賭也許賭完了，——攤牌了。

“而我從這和平的地方向你們鄭重宣布，可能不要一年，馮·俾斯麥先生就會扮演羅伯特·皮爾的角色，而將給予普選權！當我公布《公開復信》、開始了這一鼓動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了這一點。而誰要是清楚地瞧瞧局勢，他也就不會不看到這一點”。

政府將扮演羅伯特·皮爾的角色，“原因極其簡單，因為它沒有別的办法”。

在王權和資產階級之間開始了無休止的殊死鬥爭，誰要讓步，誰就“毀滅”。王權不能向某一個集團作讓步，它不能使自己落在它的手裡。但是它也同樣無法使目前的不正常秩序永世長存。因而，它只有一條出路，讓人民本身登台並恢復其權利。迫在眉睫的大規模國際衝突也促使它這樣做，迫使王權到人民中間去尋找支持。當時的憲法、當時的選舉制度不是依法實行的，而是由王權用暴力片面地強制施行的。資產階級順從地接受了這種強制，“他們歡天喜地地接受了這種消滅民權及國王恩賜的特殊獎賞，並宣稱

这是国家的权力”。但是，“誰也不会自願地同意在他的脖子上套上将要絞死他的絞索，不能为此指責任何人，因而也不能在这一点上指責王权。由于經常被逼上‘法制’的道路，王权記起了（拉薩尔在这里是假定强制施行已經成功，因而他的义务是維護这一国家政变），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回到真正的法制的道路并让人民登台要比对某一集团让步好一些”。“因此，强制施行直接的普选权的人不仅不是法制的消灭者，相反地是法制的恢复者，是人民权利的恢复者。如果一八四八年只有过普选权，但不是直接的普选权，而现在后者也实现了，那么对此我将以馮·芬克在一八四七年联邦議会上有一次所高呼的那句話来回答：人民的自由，这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它从来不会随时间的消逝而减少，而只能不断地增多！”

“这样，諸位先生，如果你們控告我思想上串同阴谋推翻这一宪法，那么我将会立即起而为我自己和我的同伴辯护。我也将由于能比当时任何人都更为有力地协助民权的恢复而終身感到驕傲。”

讲完这些話拉薩尔坐下了。法官不得不提醒他，他还必須就控告的其余各点发表意見。他照这个要求做了。但是，上面所引的話实质上已經結束了就叛国罪所作的讲演。讲演从两方面看无疑地都是卓越的作品：在反駁叛国的控告上是如此，在对国王和大臣們的影响上也同样如此。它抓住了王权的弱点，并且向它說明，如果它不想丧失其尊严，那么在宪制冲突中它就不能再作絲毫让步了。它令人信服地对王室解釋了向人民呼应的思想。“路易·菲利浦式的王权，资产阶级創造的王权，自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拉薩尔在讲演的另一个地方这么說，“但是脫胎不久，手握劍柄的王权，只要它下决心去实现真正偉大的、民族的和人民的目的，那它就完全能做到这一点。”

从拉薩尔所追求的直接目标看来，其辯护詞的这个地方，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是写得非常清楚、而且也十分巧妙的。但是拉薩尔越来越发展到背棄他自己的观点的边緣了。只要把他在十六个

月以前就宪制冲突而作的关于宪法的第二个讲演中所說的和这最后一次讲演的相应部分对照一下，那就会很容易地看到拉薩尔在这段期間所完成的巨大转变。以前他号召議會拒絕开会以反对王权，使之成为公开的专制制度这一难堪的角色，以使用这种办法强迫它最后悄悄地让步。然后就是：“毫不留情地手掐着脖子，膝頂住胸膛！”而现在整个宪制問題只不过是跟某一集团的冲突，和人民毫不相干。从前，《人民报》因为不想断然拒絕为国王提供組織军队的资金而遭到痛斥，而现在拉薩尔向“手握劍柄”的王权呼吁了。当你看到了这一讲演，你就会不由地开始相信下面这些话是可能的，这些话据說是四星期之后他对那些被請来庆祝他的生日的党内朋友讲的：“朋友們，請答应我：当资产阶级和王权之間一旦发生斗争的时候，你們不要站在资产阶级那一边。”（威廉·白拉克引自《拉薩尔的建议》）

但是，拉薩尔终究还是没有背棄自己的信念。历史上有过人民領袖的这种转变。在拉薩尔以前两世紀多的民主主义煽动家平等論者約翰·李尔本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他的性格以及一般說来他的全部经历和拉薩尔极其相似。正如拉薩尔和进步党人斗争一样，李尔本这一争取民約和民主选举权的不屈不挠的战士，因为克倫威尔长期地同王室玩弄外交手腕而没有立即和它一刀两断，所以在一六四七年展开了反对克倫威尔的斗争。但是我们看到，一年以后李尔本却已經准备和王室一起去和克倫威尔作斗争了——只要国王保证执行民約。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怀疑約翰·李尔本的正直和清白。而且人民至終还是称他为“正直的約翰”。和王权接近在这两种場合下都是对当时这些敌人的日益增长的仇恨的自然結果。拉薩尔毕竟还是很清楚地意識到这一点的。在李尔本完全出于情感冲动而行动的地方，在拉薩尔则是完全自觉的。他在其演讲的另一地方說，“这是旧的历史規律，它在英国以及法国曾多次起过作用，各极端的政党相互之間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他們有某种自然的傾向性，就像某种化学亲和力一样，在反对中間政党

的斗争中相互支持。”他想把国王和保守党拉到自己这边来，以便使他们把他当作独立的盟友而给以协助。但是，他根本就不想因此而不做极左派的代表。毫无疑问，拉萨儿是知道他在以自己的策略进行一场极其危险的赌博。但是他相信他手中有够多的王牌，可以冒冒险。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能在任何时刻按照自己的愿望退却。但他忽略了一点，即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也存在着始终如一的法则，只有第一步可以充分自由地行动，而以后的步骤则已由第一步所预先规定好了。这也证实了《浮士德》里所说的一句话：第一步我们是自由的，而第二步我们则是奴隶。

上级法庭根据旧普鲁士刑法审理了本案，驳回了拉萨儿叛国的控告，并让检察官就其余各点向普通法院对他起诉。

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不太清楚。但是一八六四年六月却查禁了他作为小册子出版的辩护词，还就此对他提出了新的控告。警局、检察官和法庭没有放过拉萨儿，一案紧接着一案。例如，就其莱茵“阅兵讲演”（《庆宴，报刊……》等等）对他提出了控告（这以后他曾为传票而不停地多方奔走，并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而且有一次他真的被警察所扣押），并被杜塞尔多夫地方自治法院根据仇恨与藐视的旧条文 *in contumacium*^① 判处一年徒刑。他对这一判决提出了上诉，因此一八六四年夏重新审查此案。经常处在刽子手的斧头下，经常冒着入狱的危险，这就是拉萨儿所仅能享受到的自由。他的赌博远未操胜，而联合会也远未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作用来。

十三、拉萨儿的主要经济著作

《巴师夏-舒尔采·馮·德里奇》或《资本与劳动》

在叛国案的辩护词中拉萨儿引用了官方的《北德意志总汇报》

^① 缺席。——译者注

的一段話，其中以比利时为例证明說，在政治方面资产階級已經衰退了。拉薩尔就这一点指出：“先生們，你們看，这一切，从每一个字，从譬喻到表达的方式本身都完全证明了我的政治經濟学的最新著作《巴斯夏-舒尔采先生或資本与劳动》的影响。”甚至普魯士政府也“多少”被迫使用他的語言来說話了。^①

这一著作拉薩尔还在作水上旅行时就开始了，并在柏林写成。从标题本身可以看出，这是論爭性的著作。这是拉薩尔对进步党和自由派的議員舒尔采-德里奇于一八六二——六三年冬向柏林工人所作的几次讲演的答复。这些讲演是在上面提到的（本书第46頁第四段）在音乐厅举行的大会上发表的，以后曾以《德国工人手册之一章》为题出过单行本。舒尔采-德里奇在其最后一次讲演里同拉薩尔的《公开复信》展开了激烈的論战。《巴斯夏-舒尔采》就是拉薩尔对这一論战的回答。

拉薩尔的全部长处和弱点在这儿都表现得特别突出。先讲缺点。拉薩尔在文章中常常令人厌烦地咬文嚼字，甚至进而歪曲其論敌的思想。他本人在日記中也指出了自己的这种偏向，由于論据不足而极力想用喊声来压倒对方。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下列場合，他的論战常常沒反駁什么，而只是純粹在喊叫。拉薩尔不满足于仅只证明自己的对手及其方案缺乏科学論据，最后，还用极端粗暴的方式对对方动机的純洁性表示怀疑。与此同时，他却用一些无根据的論断来迴避舒尔采对国家資助生产合作社思想的实质性反駁。

但是书的出色的优点弥补了它的缺点。拉薩尔在这里显示出他是一个無論干什么事都到处力求洞察事物底細的人。用歌德的話來說，这就是：

“……放过一切表面的东西

^① 事实上，拉薩尔给傅斯麦寄去了自己的《巴斯夏-舒尔采》，并指出，他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反对进步党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巴斯夏-舒尔采》书上的附录对自由派政党和自由派报刊进行了特别猛烈的攻击。

只是探索事物的实质。”

舒尔采-德里奇本人最初有点倾向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在一八四八年后最初的反动年代里他参加了合作运动，这个运动当时在德国是由社会主义者发起的。由于政治迫害和当时经济关系不成熟，这一运动已行将完全停顿。如果追溯舒尔采合作社的最初历史，那么我們在这里就会看到，这是一八四八年工人兄弟会的最新分枝。在舒尔采住过的那些地方，工人合作社这一兄弟会的产物，变成了手工业合作社，只有在这种形式下它們才能在这些地方流行起来。因为，既然一般的雇佣工人还是旧的手工业帮工，那就是說工人合作社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手工业帮工中最发展的那些人一八四八年大都变成了手工业工匠。在舒尔采领导下的合作社正是越来越适应他們的需要。这些合作社的成就影响了舒尔采的社会政治思想，最后他甚至只能从小资产者——誠然，是从自由主义的小资产者的观点来观察世界。主張貿易自由的法国经济学家弗·巴师夏的政治经济思想和这种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极其相近的。在德国，貿易自由的拥护者傳播了这些思想。巴师夏用动人的雄辯来闡述的经济利益协调論，他为资产阶级的特殊经济范畴，如資本、货币、息金等等辯护而作的通俗著作都成了舒尔采的聖經。因而非常明显，在为柏林工人編写讲稿时，他非常热心地追随自己的老师巴师夏的学說。

但是拉薩尔也熟悉巴师夏，特别是清楚地知道巴师夏就利息的权利和蒲魯东所作的論爭。此外，拉薩尔还看过洛贝尔图斯致馮·基尔希曼的第三封《社会通信》。《信》是在一八五一——五二年間写成的，其中反駁了巴师夏的观点。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五日拉薩尔給洛贝尔图斯写道：“我在十年前讀过它(这封《社会通信》)，当时接連讀了三遍，并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反复的自我辯論。”因此，他在舒尔采《手册》中一听到巴师夏的声音，就能极其容易地证明，舒尔采在理論上只是在重彈《经济协调論》作者的老調。不过后一种情况未必可以归罪于舒尔采，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提出

什么自己独创的理论来。但是舒尔采却指责拉薩尔无知。因此，准确地揭露舒尔采缺乏科学论据，对拉薩尔来说就特别重要。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本书才采用了在语言上特别吸引人的书名：《巴师夏-舒尔采·馮·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利安》。后面的意思是说，舒尔采在经济学上是和文学史上的尤利安·施米特同一类型的人物。

再说一次，如果除去拉薩尔在反对舒尔采中的庸俗的狂妄行为为不论，那么这一著作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这种经济学在巴师夏身上得到了典型的表现。作为这样的一部著作，它无可争辩地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贡献。不是说它全都是正确的。由于论战极富个人性质，拉薩尔常常过分热衷于用一切法門去证明对方歪曲事实或给概念下了不正确的定义。凡是只有一半对或措词有誤的地方，拉薩尔都将之說成是某种全然虚妄的东西。在和錯誤论点酣战之时，他也往往說出某种同样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来。有时他武断地把个别的情形說成是一般的规律。这样，在他身上也能找到足够的可供批判的资料。但是整个說来，在论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而这占了全书的极大部分），拉薩尔是如此地熟悉经济問題，給经济概念下了如此透彻的定义，分析得如此深刻而述叙得又如此清楚——这一切在经济学文献中是不易多得的。拉薩尔給了工人一本极有价值的经济問題讀物，这样說对此书决不会有过誉之虞。拉薩尔提供了最好含意下的辩证思想的范例。他教給自己的讀者采用这种思想方法。这里根本就没有自由派通俗作家在議論经济問題时所固有的那种肤浅而又含糊的手法。拉薩尔并不像他們通常所做的那样抹煞矛盾。他完全没有他們那种故意夸大事物实际情况的倾向以及自由主义思想所固有的把不同的事物纳入一个概念的倾向。他学过哲学和法学，同时在经济学方面在对概念作严格的分类上也表现出自己是个行家。讀过这本书的工人都能很容易地看破和駁倒资产阶级曼彻斯特学派鼓吹者的虚妄結論，这一学派当时在北德意志特别盛行。拉薩尔特别尖

銳地指出，使用“服務”、“交換”等概念（如當時自由派經濟學家那
樣）會帶來如何致命的後果。

自然，在拉薩爾書中沒有一個經濟原理可以說是屬於他本人
的。他所提供的主要只是他用別人開采來的金屬鑄造出來的東
西。他的創造表現在對獲得的材料的加工上。其實創造性的思想
不僅表現在宣布了許多新的思想，而且還在於用新的方法去應用
它們，用新的方法使之相互結合。在拉薩爾以前還沒有一個人會
這樣明白地證明，資本不是邏輯範疇，而是歷史範疇。至於其他的
經濟範疇也同樣如此。這裡在我們面前的拉薩爾決不是一個正統
的舊黑格爾主義者，而是個深刻的現實主義的思想家，他是從實際
聯繫中去看待事物的。

不錯，就在《巴師夏-舒爾采》一書中，全部勞動所得權思想的
舊公式還起着某些作用，雖然當時馬克思已經在理論上批駁了這
一舊公式。在涉及價值理論的地方（他異常準確地說明了這一理
論），他像十九世紀二十和三十年代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一樣，從李
嘉圖的價值學說中引伸出工人對於其勞動產品的全部價值的權
利。這一部分是由於拉薩爾的直接任務所造成的，他是在這兒捍衛
國家貸款資助的生產合作社。前面（見第十章）我們已經指出，是
什麼促使拉薩爾提出這一要求的。這是和德國當時的經濟狀況相
適應的，在拉薩爾那時代的德國在這方面決不會高於英國的湯普
遜、布雷和格雷時代。但是從拉薩爾給洛貝爾圖斯的信可以看出，
他清楚地懂得，通過生產合作社實現對於全部勞動所得的權利並
沒有解決社會主義意義下的社會問題；社會還不會因此變成團結
一致的經濟統一體。他知道，各種形式的地租必然會導致各種各
樣的不平等。而他打算用相應的賦稅來消除這些不平等。在這方
面他的科學認識比他的實踐手段要走得遠。他在一八六三年五月
二十六日，即他着手寫作《巴師夏-舒爾采》這一著作的五個月之
前，給洛貝爾圖斯的一封信證明了他對這一切的了解是多麼深刻。
他在这里聲明，即使甚至土地、資本和勞動產品都屬於工人，這也

不意味着社会問題已經解决。如果让工人使用土地和資本，并且劳动产品也属于他，在这种場合下情况也大致相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工业合作社中获得的通常多于其劳动产品，而在农业合作社中則多于或者少于其劳动产品。由于洛貝尔图斯沒有立即懂得拉薩尔的意思，因此下一封信对他作了解釋。一些合作社因其所处条件較好，或有某种其他地域上的以及类似的优势，有可能获得超額利潤。因而其成员会获得多于其在社会总产量中所应得的那一份。拉薩尔接着說，劳动产品指的只是每一个人从社会总产量中获得与其劳动相当的那一份产品。如果一些人获得多于其应得的一份，那么，另一些人必然因而获得少于其应得的一份，即在某种程度上給少了。

这里拉薩尔是——如他自己所直接指出的——以建立在純粹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的“設想”为出发点的。这个社会的全体劳动成员都同样地享受与其所耗費的劳动相等的劳动所得。在这方面拉薩尔清楚地看到其生产合作社的不彻底的性质。拉薩尔本人在和洛貝尔图斯的通訊中极其突出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在《巴师夏-舒尔采》一书中拉薩尔力求比在《公开复信》以及萊比錫和法兰克福的演說中更为明确地按照这种“設想”来说明其合作社方案。現在他已經不再說，除了要求国家給予貸款这一点外，他对合作社的态度与舒尔采-德里奇并无不同了。現在他认为下列情况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就是使不同企业部門的合作社包括該行业的全体工人，使他們通过信贷和保險协会相互保障，以防遭到經營上的損失。但是在仿佛和共产主义最終目标相接近的同时，拉薩尔却越来越拋棄了目前能使之实现的基地。而与此同时他根本沒有接近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按照这种思想生产应当是为社会的需要服务，而不是为生产者赢利。萊美西耶和柯胥关于二月革命时期法国工人对合作社的渴望及关于某些还保存下来的合作社順利发展的被夸大了的資料也部分地促使拉薩尔陷入迷途。他沒看到这些合作社已經完全失去了工人合作社的性质。以后舒

尔采-德里奇对预防经营损失的保险合作社思想提出了有充分根据的反驳。

簡而言之，在《巴师夏-舒尔采》中有不少弱点，例如其結尾部分就是这样，在那里拉薩尔重又肯定地阐述了自己的合作社方案。但是书中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经济分析都显得十分出色。特别令人惊異的是，正当写作这一作品时拉薩尔不得不把好多注意力分散到其他問題上去。作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他得处理大量的来往信件，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操心，而且还得和当局及法庭进行斗争。而这一切他全都做到了。如果我们看到了他和馬克思及洛貝尔图斯的通訊，我们会对拉薩尔感到更大的惊異。从通訊可以看出，这一著作的出色成就并不是建立在因襲他人上面的，不是由于巧妙地运用华而不实的文学虛飾造成的，而是他满腔热情地研究了国民經济的基本問題的結果。

十四、在德国国土上的最后几个月

在龙茨多弗的演說和杜塞尔多夫案件

如果想要对拉薩尔从他回到柏林直到重新出发旅行，即从一八六三年十月中旬至一八六四年五月初这段期間的活动有一个概念，那只要回想一下，他在这段期間所写的下列著作就行了：

1. 《告柏林工人书》；
2. 《巴师夏-舒尔采》；
3. 准备出版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年冬在柏林所作的第一个、也許还有其他几个讲演；
4. 草拟了五十三个有时是非常长的給警察当局、法庭和內閣的呈文、申訴书、上訴状；^①

^① 細目見伯恩哈特·貝克爾：《斐迪南·拉薩尔的工人鼓动工作史》，第160—163頁。

5. 准备出版叛国案辩护詞；

6. 为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而草拟的信件。

誠然这些通信大部分是联合会書記写的，但是許多比較重要的信件都是拉薩尔自己起草或口授的。拉薩尔的这些信在大多数場合内容都十分丰富。上面我們已經提及，联合会的发展是多么緩慢，地方分会的會員得进行多么艰苦的斗争。几乎到处都感到财务上的困难。进款很少，然而就是这一点錢也被用来作維持各地全权代表之需或被他們抵數各項开支零星地花掉了。他們也浪費了不少時間。这一切换来的是苦惱的怨言、規劝和指責。还不得不写长篇的指示。由于事情是嶄新的，因此很难为全权代表們規定費用的數額。通信也因此变得更不愉快了。其次，由于經濟困难以及加入的新會員不多，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方案。为了使联合会更有吸引力，曾打算建立救济基金会及类似的組織。也曾打算改組联合会本身，使地方組織成为独立的团体。

鉴于联合会发展緩慢，拉薩尔起初对这一思想曾抱肯定的态度。但不久后就拒絕了并开始激烈地攻击这些方案。这也成了不愉快的通信的导火綫。而那个联合会头任書記瓦尔泰希开始宣傳分权制思想了。当拉薩尔拒絕給他假期以后，他干脆就丢下書記的职务不管了。这是一八六四年一月十一日的事，到二月刀劍鑄造工人佐林根的爱·維尔姆斯接替了他。瓦尔泰希不是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因而常常和拉薩尔发生冲突。并且作为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他对民主的看法和拉薩尔不同。拉薩尔是按照军队的从屬制度来看待联合会會員对主席的关系的。自然，决裂并没有消除相互間的不和。

除了組織問題以外，主席还得去处理各个組織中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他不得不为此草拟枯燥无味的信函，而有时还会陷于极其难堪的境地，最后搞得拉薩尔本人也以退出相威胁了。一八六三——六四年冬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的尖銳化使他大伤腦筋。波兰問題也是这样，由于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这一問題被

提出來了。聯合會必須對這一問題採取明確的立場。拉薩爾打算利用這些外部糾葛來迫使普魯士政府實行普選權。自然，他不能讓他所領導的聯合會就這兩個民族政治問題通過與普魯士內閣首相的意圖截然相反的決議，與此同時，拉薩爾也不得不顧及激進民主派對這兩個問題所持的傳統態度。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給在萊比錫的奧托·達美爾寫道：“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的混亂在好多方面對我來說都是極其傷腦筋的事！”不錯，關於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事件，除漢堡以外，他使各地通過了連俾斯麥也未必能想出比這更好的決議。但是在漢堡，儘管給當地的全權代表寫了長信，拉薩爾還是怎麼也無法說服聯合會會員採取他認為是最好的純粹觀望的立場。剛才提到的決議宣布這種立場是民主派對此問題所應採取的政策。決議要求把那些易北河公國併入德國版圖并反對建立義勇軍，它接着寫道：

“統一的德國本身自然會解決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問題。和這一偉大的任務比較起來，在三十三個德意志公侯中是否有一個外國人，這種問題只有很小的意義。國民聯合會和進步黨內那些奮起保衛正統的世襲公侯權的人，看來是打算借用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來轉移人們對國內狀況的注意力。他們企圖在愛國主義外衣的掩飾下，迴避對他們所無能為力的衝突的解決。人民應當小心！不能讓任何東西來轉移他們對巨大的基本任務的注意力！讓他們懂得，德國的自由、統一自然就會解決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問題。而在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上的任何成就也無力奠定德國的統一和自由。”

在實踐上，在當時的條件下，這就是說在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問題上聽任政府去為所欲為，而讓人民垂手退居一邊。和漢堡全權代表的意見相反，拉薩爾是這樣論證這一點的：“我們的策略應當是使志願軍、即人民的力量留在國內，而把軍隊打發到國外去！也就是說，使各國政府互相作戰！（因此進步黨在議會上不應當同意撥款）如果各國政府不開始戰爭，那麼我們手上就有了進行

鼓动的王牌——指責它們叛國。它們開始了戰爭——在一定程度上它們無論如何是會這樣做的，而那時我們的職責就是迫使它們再進一步——我們就會獲得雙重的勝利：軍隊在國外，人民的力量集中在國內。”這一切只是一滴鎮靜劑，——沒有更多的東西了。有一點是不能不同意拉薩爾的：為正統的世襲公侯權操心，這不是全德工人聯合會份內之事。

至於波蘭問題，拉薩爾則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決議抽象地宣稱，為復興波蘭而戰是直接符合德國利益的。但是德國占領的原波蘭土地，由於已日耳曼化了，應規定不再歸還波蘭。

到現在止講的是與拉薩爾在聯合會的活動有關的通信，是他和警察局及法庭的衝突（有一次他甚至被扣住了，因為他沒有按傳票出庭。從街上把他押送回家，在釋放他的命令到來之前，被警察拘押了六小時之久）。但是，除此以外還應當提提他在柏林所作的講演，他和俾斯麥舉行的會談，他和朋友們以及那些他希望將之爭取到聯合會這邊來的人們的廣泛通信。這一切加在一起說明他花費了如此大的勞動和精力，以致很難相信，這一切是一個人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做完的。因而，一八六四年二月，拉薩爾在把《巴師夏-舒爾采》寄給洛貝爾圖斯時，對他所寫的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說：“由於極度的緊張和寫作對神經的極端刺激，我感到精疲力盡了，我的神經像一根繩子似地在身上晃蕩。”

一八六四年五月初拉薩爾離開了柏林。他打算先訪問工人聯合會的各分會，然後赴溫泉療養。一八六四年四月七日他給聯合會的出納寫道，估計赴溫泉的旅行要“很晚才能回來”，他指的是要在那兒休息一下。可惜這個“很晚”竟成了“永別”。

拉薩爾旅行的第一個城市是萊比錫，到達的當晚（五月八日），他在那兒的聯合會大廳里同聯合會的會員進行了交談，第二天發表了公開講演。五月十二日他到達杜塞爾多夫。當天晚上歌詠團向他表示歡迎，在聯合會大廳里向他贈送了麵包之歌的作者比埃爾·杜邦的精裝本文集。原定五月十三日召開的大會未能舉行，

因为会场的主人在最后一分钟拒绝借给场地。接着五月十四日拉薩尔在佐林根讲了話，五月十五日——在巴門，十六日——在科倫，十八日——在韦默耳斯基尔亨，五月二十二日——在龙茨多弗。在所有这些城市拉薩尔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在由卡·布龙編輯的不大的周报(最初是联合会的机关报)《北极星》上刊登了关于这一切的多少有点夸大的报道。这些报道是由拉薩尔本人审定过的，这从伯恩哈特·貝克尔的話可以看出来，在这一点上我們是相信他的。到处都是同样的标题：《联合会的活动和成就》。为拉薩尔在龙茨多弗发表演說作了特殊准备。决定庆祝联合会成立一周年，邀請了附近工业区的联合会会员，还有从远方来的各种各样的客人参加。拉薩尔的賀辞談到了联合会的“空前”成就。这一講話曾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和普魯士国王的諾言》为题作为小册子出版。

所有写拉薩尔傳記的社会主义作家都一致承认，这次演說在任何方面都沒有为拉薩尔带来光采。其中很难找到其最初一些鼓动性著作中的出色的优点，而与此同时，拉薩尔的全部缺点在这儿却以双倍的形态出现了。这里已看不到那种特别是用来写作《工人綱領》的典范优雅的語言，代之出现在我們面前的是失去了全部高尚气质的浮夸的詞句，文句中充滿了乏味的夸张，而描述讲演在听众中所产生的印象的插語尤为夸张乏味。拉薩尔并不只限于用玫瑰色来描繪联合会的真正成就(这对一个政治鼓动家來說似乎是无可非議的)，他还把它的真正失败說成是偉大的成功。他只找到傲慢和嘲笑的字眼来对待自己的进步党对手(当时的这些人中間好多人后来成了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当他从他們那儿得到即使是有条件的贊同时也是这样。相反地，他却把从反动保守分子的嘴里向他发出的任何贊揚都毫无保留地一一記下。普魯士国王給了什列斯維希的一个紡織工人代表团以某些許諾，而拉薩尔也就决定利用这些許諾来进行自己的鼓动。如果說这一步驟从政治观点看来是容許的，那末無論如何它是含糊曖昧的。这个代表团是保守党人手中的玩物，是他們反对一个进步党人的厂主的

斗争中的工具。由于俾斯麦的努力，国王接见了代表团，并允诺尽快地采取立法措施以缓和纺织工人的悲惨境遇。拉萨尔蒙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个许诺不仅包含着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要求的承认，并且由于内在的逻辑它必然会导致给予直接的普选权，因为根据三级选举制选出的“进步议会”是什么时候也不会同意采取必要措施的。而由拉萨尔蒙本人审定的关于大会的报道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与会者在好几分钟内都沉浸在“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欢跃之中。报告作为小册子单独出版后，拉萨尔蒙让联合会书记维尔姆斯用写着“亲收”的信封给俾斯麦寄去两本。由此看来事情很清楚，拉萨尔蒙之所以强调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欢跃，是打算使俾斯麦，如果可能并通过他使国王本人获得某种印象。可见，这一切至少是有一定用意的。否则这一切只会是证明拉萨尔蒙的听众们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幼稚。

拉萨尔蒙之所以在上面那些话之后接着着重指出统治着联合会的非凡的纪律，以及对他的领导全心全意的服从，这大概也完全是针对俾斯麦和国王而发的。“从莱茵河到北海，从易北河到多瑙河”，拉萨尔蒙从来也没有从任何一个联合会会员口中听到“不”字。在联合会里根本就没有“腐蚀我们资产阶级整个机体的那种自由主义抱怨情绪，那种个人成见和自负博学的病态”。事实并非如此，——拉萨尔蒙不止一次地听到“不”字。就算它是那样，这也决不能表明联合会的崇高的精神生活。但对拉萨尔蒙来说，重要的是向俾斯麦证实，联合会完全愿意遵从拉萨尔蒙的指示。

在讲演的末尾，拉萨尔蒙提到了他所遭到的司法审讯，并取得了与会者所发的誓言：即使他甚至被消灭了，他们也不会让他所燃起的火焰熄灭下去。

拉萨尔蒙从莱茵地区出发，首先前往埃姆斯温泉疗养，他极其苦于咽喉的宿疾，只要发表几次演说，老病就会立即复发。在埃姆斯他起草了对《十字报》批评《巴师夏-舒尔采》的文章的辩驳。这个批评出自瓦盖纳的秘密顾问之手，这个人当时和俾斯麦非常接近。

这是封建保守派报纸专论拉薩尔著作的三篇文章中之最后一篇。作者指責拉薩尔，說他要求实行最粗陋的形式下的普选权。他強調“保藏”(保存)数量还相当多的中間阶层的必要性，而拉薩尔完全忽視了这一阶层。他坚决地要求拉薩尔給予直接而坦率的回答，他是否认为在現存基督教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范围内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計劃。在拉薩尔沒有对这問題作出解釋以前，他完全有权指責他……进行反对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制度的危險而极端的鼓动。

拉薩尔的回答看来写得非常委婉。“向我提出的要求，——拉薩尔写道，——显得过于得意忘形了。如果我对該书評作者的身分沒有搞錯的話，那么这书評是出自这么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因而应当对它再作一次詳細的研究。”实际上拉薩尔是引证他在《巴师夏-舒尔采》中已证明了的小資本“必然”为大工业所吞沒的論点。他說，与此同时中等阶层在被消灭。要制止这一过程，只有使国家和工业联結起来，如他所建議的，采取享受国家貸款的大型生产合作社的形式。这样，“将会組成包括全体人民的新的中等阶层。”接着拉薩尔力图证明，要在广大范围内实现合作化必須扩大生产的規模，必須使工人达到較高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但是这里絕對必要的先决条件是直接的普选权。除了这个，在我們面前的就只会是些小小的实验，它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也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他，拉薩尔，坚持这一点：财产資格、中国清朝官吏自上而下的科举資格不比这种所謂“粗陋的”直接的普选权好。应当使理性来自自由，因为“沒有比广大群众的健全理智更接近于真正的理性的了”。为了詳細地证明这一思想，拉薩尔“冒昧”地把自己的龙茨多弗演說推荐给“評論家先生”。并再一次宣布“好抱怨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是“我們时代的沉痾”。但是，这决不是群众的病症，而是“仅仅在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中間必然和自然地产生的病症”。拉薩尔在結束自己的答复时指出，“現代的发展”同样要成为“历史的”。同时拉薩尔就此問道：路易十六是根据杜尔哥的决心去消灭行会，还是在当时国家和社会制度的

压力下重新恢复行会更为合乎历史的要求呢？

全部事态表明，当时拉薩尔的境遇是多么的困难。俾斯麦的得力助手瓦盖納要求他发表必然会使他站到基督教专制国家制度的立場上去的声明，但是拉薩尔不能发表这种声明，同时也不能和俾斯麦—瓦盖納决裂。因而他把自己的能言善辯的所有本领全都用在說一些使瓦盖納感到快意的东西，同时在理論上和原則上不作任何让步。拉薩尔就像在鸡蛋上跳舞——并且有高超的技巧，——在这一点上是应当为他說句公道話的，給瓦盖納的答复从某一点来讲是件杰出的作品。但这究竟是跳舞，要是在以前拉薩尔早就激烈地反对了。拉薩尔已經失去了自由，——因而在所有的著作中都露出一种畏畏縮縮閃閃的口吻，仿佛他已經感觉到，他对俾斯麦的需要比俾斯麦对他的需要要大得多。^①

《十字报》編輯部迟迟不同意刊载拉薩尔的答复，为此他甚至不得以书面的形式訴諸瓦盖納。答复刊载在一八六四年六月十九日这一期上，編輯部按語說，它“只是作为例外”才为拉薩尔提供篇幅的。与此同时，它坚决拒絕“今后为拉薩尔提供本报的篇幅”，假如評論者打算答复他的話。这就是拉薩尔在其龙茨多弗讲演中如此得意地讲到的保守派报刊上的那种“大量的贊揚”的实况。这种結局是他政治上真诚正直的光荣明证。但是从这儿也可以同时看出，拉薩尔是多么易于两头落空。

八天之后，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新法院开始在杜塞尔多夫审訊有关《庆宴、报刊》等演說案。一級审法庭依据旧普魯士刑法关于煽起仇恨和藐視的条文缺席判处他一年徒刑。拉薩尔发表了长达四小时的演說为自己辯护。《杜塞尔多夫报》在三期中刊载了关于它的报道。編者过去和拉薩尔关系密切，从他那儿直接获得了演說的初稿。以后它曾被印成单行本。拉薩尔在为自己辯护时的依据是：他在讲演中激起的不是对一个阶级、而是对一个政

^① 俾斯麦只是通过其秘书簡短地通知拉薩尔，說《巴师夏-舒尔采》已收到。这使拉薩尔大为失望。

党的藐視。他經常大量地采用那种我們在叛国案和龙茨多弗演說中所一再遇到的迂迴手法。拉薩尔引証說，美因茲主教克特列尔（在萊茵的每一个法庭上提到他的名字时都不仅怀着敬意、而且怀着“崇敬”）和大臣馮·爱倫堡，甚至普魯士国王本人現在都說着和他一样的話，从而証实了他从事鼓动的权利。虽然拉薩尔试图用各种办法在政治上击败法官，但是並沒有奏效，沒能像柏林那次一样爭得无罪的判決。法庭只是減輕了刑罰，把一年的徒刑改为六个月。由于拉薩尔在柏林已被判处四个月的徒刑，因而新的懲罰是对他的一个沉重打击。“我已經不是个年青人了”，——拉薩尔在其发言的結尾向法官們喊道。如果說以前他像有些人参加舞会那样輕快地走进監獄，那么現在这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但是主要的不是对自己健康的恶化的耽忧，而是政治上的考虑使拉薩尔对他这为期间較长的徒刑感到如此的难受。沒有他的領導、沒有他的不断影响，联合会怎么办？七月四日拉薩尔在給維尔姆斯的一封信里把杜塞尔多夫的判決叫做“卑鄙的判決”。

这封信上标明是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出的，拉薩尔是从杜塞尔多夫出发經科倫来到此地的。七月三日他在这儿对当地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发表了一次讲演，这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次讲演。讲的主要是进步党对什列斯維希-霍尔施坦問題的态度，帶有全盘否定的批判性质。显然，拉薩尔不认为还有可能建議联合会在这問題上采取某种明确的立場。七月四日他还乐了一阵，联合会会员們为他演奏了小夜曲。七月六日繼續其旅程，起先訪問法耳次，然后在七月中旬經卡尔斯魯厄去瑞士——去迎接自己的厄运。

十五、拉薩尔爭夺海倫·馮·敦尼 盖斯的斗爭。拉薩尔之死

在苏黎世停了一天之后，筋疲力尽、神經受了过度刺激、而且为

联合会前途的种种疑虑所苦恼的拉薩尔在七月二十日抵达里基-卡尔特巴特。从这里他还給联合会書記維尔姆斯发出了几封有关联合会事务的信件，从这些信可以看出，拉薩尔在竭力使联合会无条件地服从主席。在七月二十一日发出的一封信里他反对联合会柏林分会在他所任命的全权代表发出指令之前通过任何决定，认为这是完全不恰当的。因为全权代表“之設立是为了根据他(主席)的指示领导分会，而不是为了让分会来领导全权代表”。然后，他写了一封长达十五頁(八开的紙)的致联合会理事会理事的通告信，要求把尤里烏斯·瓦尔泰希开除出联合会，理由是他表示反对主席关于按章程召开全体代表大会的某些建議。同时，瓦尔泰希在談話中主張联合进步党的左翼和給予會員以更大的独立性。拉薩尔于七月二十七日把这一文件寄給維尔姆斯，并指示說，只有他，維尔姆斯，亲自到达德累斯顿(瓦尔泰希是該地的全权代表)并使当地的联合会會員“认清”了瓦尔泰希这个人之后，才能把信轉交給他。在这前一天，拉薩尔利用其主席的权力任命了律师約·巴·馮-施韦澤和作家伯恩哈特·貝克尔为理事会理事。他已和施韦澤就创办联合会的机关报取得了一致意見，施韦澤和 J. B. 馮·霍夫什特騰一道应在柏林使之問世。七月二十八日拉薩尔給維尔姆斯寄去了下面一封信。

“謹通知您，意外地，明晨我即将离开里基。信件請寄往伯尔尼(瑞士)，留邮局待領。

全屬於您的斐·拉薩尔。

里基-卡尔特巴特，七月二十八日”

这是拉薩尔直接給予联合会的最后一个信息。維尔姆斯按照所开地址寄去四封信(八月三日，十日，十三日和二十一日)，但一封回信也沒收到。这时候拉薩尔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爭夺海倫·馮·敦尼盖斯身上，她也就是他之所以突然离开里基-卡尔特巴特的原因。

海倫·馮·敦尼盖斯，其父亲是巴伐利亚駐瑞士联邦代办，住

在日內瓦，她的性格在許多地方和拉薩爾很相近。她不是個出色的美人，但有一張迷人的臉和一頭蓬鬆的金黃色的頭髮。還在半成年的時候她就出入“社交界”，在這裏她看到了世界上的許多事物，也學到了許多處世知識。這一切加上她那活潑而近乎南部的氣質，使她的舉止富有一種強烈的異域風味，她和那些同年的北德意志姑娘不同，正如拉薩爾和他周圍的男人迥異一樣，在作風上，她也同拉薩爾一樣，常常不顧現存的風習。但她缺乏科學的頭腦，不會科學地工作，缺乏社會主義思想及對政治活動的熱情，而這些東西卻是拉薩爾個性的牢固基礎，並使他不致成為冒險分子。科學和政治當時對年輕的姑娘，特別是對上流社會的姑娘是不存在的。她的舉止行動只遵循外表的禮節，她的社會地位使她也只能是這樣。

海倫從和她以及拉薩爾都很要好的柏林律師霍爾特霍夫那兒得知，拉薩爾住在里基-卡爾特巴特作血清治療。她本人當時在伯爾尼附近的瓦貝爾恩與朋友們一道（或住在朋友家裏）療養。由於到里基的一次旅行，她會見了拉薩爾。是如她所形容的偶然的機緣在這兒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呢，還是照拉薩爾的一封信的說法，是她本人設法創造了這一機會，這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如同海倫已經和一個年輕的傾慕者、貴族揚可·馮·拉可維茲訂婚一樣，這時候業已愛上另一個姑娘的拉薩爾卻又立即對她燃起了熾烈的愛情，並千方百計地謀求她的雙親同意他和海倫結婚。為了正確地估計他同這兩個姑娘之間的關係，應當注意到拉薩爾給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她曾就此事對他提出某些意見）的一封信，其中寫道，他對海倫的愛情決不帶有肉欲的性質；這方面，另一位姑娘對他繼續起着遠為強烈的作用。但從個性講，海倫對他是非常合適的，能找到這樣合適的人，這是他以前所沒有想到的。這是歌德型的性格，其唯一的缺點是缺乏意志。而海倫肯定地說，仿佛她在柏林已經對比她年輕的揚可·馮·拉可維茲說過，如果拉薩爾打算娶她，那麼她將嫁給拉薩爾。

下面是給馮·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的信的一些片斷，它很好地說明了拉薩爾在和海倫訂婚這段期間的情緒和思想。

七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寫道：

“您寫道，‘您就不能在某些時候安心於科學、友誼和美好的大自然嗎？’您這麼說是對我的誤解。您以為我少不了政治。

唉，*au fait*^① 您是多麼不了解我啊！我沒有比徹底擺脫政治，以便投身於科學、友誼和大自然更強烈的願望了。我已經厭倦政治了。不錯，如果發生了嚴重的事件，或者假如我獲得了權力或得到了取得權力的手段——那種適合於我的手段，那麼我將會對它重新燃起前所未有的更大的熱情。因為沒有最高權力什麼也做不成。但是對於搞小孩的玩意我已老了，已太大了。因此我極其不願接受主席的職位。我只是向您作出让步的。正因為這樣，這一處境現在使我感到非常苦惱。要是我能擺脫它，現在我將會非常樂意和您一起去那不勒斯！（但是如何擺脫呢？！）

我耽心事變將會緩慢地、非常緩慢地發展。而我的熾熱的心不能忍受這種呆小症和緩慢的演變。政治，對我來說這就是目前的積極活動。其他的一切可以從科學的角度去處理！我打算去漢堡對事變的進程施加壓力。但這能起多大的作用，我一點也說不上。並且我自己也不抱很大的希望！

啊，要是我能引退那該多好！

當我收到海倫的來信——一封非常嚴重的信的時候，我已經寫完上面幾行話！事態變得嚴重起來了，變得非常嚴重。而此事變的重担重又落在我的肩上。並且，在這時候我已經不能後退，此外我也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我必須讓步！這是個美麗的女人，並且就其個性來講，她是唯一的一個完全適合於我的女人，您也會承認她確是唯一合適的人。這樣，*en avant*——渡過盧比孔河前進！這是通向幸福的道路！對我來說如此，對您，好心的伯爵夫人，來說至少也同樣如此。

① 其實。——譯者注

但是，这本来已够复杂的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了。我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我将如何把这一切进行到底。就是在我处理您的案件的时候，我也常常感受到这种纯粹与个人无关的、客观的好奇心，——就像看小说一样，——想知道，我如何才能把自己和您从这种处境中拯救出来！

您看，过去的力量还全部保存着，先前的运气也依然如故！我将使一切获得辉煌的成就。”

八月三日的信写道：

“所有这些判决和审判对我的婚姻能有什么决定性影响呢？——我的婚姻只能影响我对这些判决所抱的打算，而不是相反。”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伯爵夫人曾表示过某种疑虑：由于即将执行的徒刑，拉萨儿是否应当结婚，而他这一方面则否定了这些疑虑，因为一旦结了婚他就打算留在国外，从而就能逃避他所面临的惩罚。几天之后当拉萨儿到了日内瓦，他真的向约翰·菲利浦·贝克尔提出了下列声明，关于这一点从贝克尔在为拉萨儿申请居住许可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他感到精疲力尽，需要停止工作；他原指望约用一年的时间就能使社会主义运动爆发起来，但是现在他看到，为此需要十来年的时间，他感到自己的体力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特别是无力忍受面临的徒刑。”

贝克尔建议拉萨儿留在日内瓦，在这里两年之后他就可以获得瑞士公民权了。“拉萨儿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一八六四年八月十一日我为他取得了正式的居住许可证。”

由此可见，拉萨儿在这时候已经决定实现他在上述七月二十八日的信中还是作为一个愿望提出来的想法，辞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的职务。在这时候和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的心已不再是属于联合会的了。

上面已经提到的在汉堡所受的打击是拉萨儿想迫使联合会的

漢堡會員通過將會是諸俾斯麥把易北河公國併入普魯士的決議。這自然應當作為讓普魯士吞併各公國的普遍鼓動的開始。如拉薩爾所指望的，這種鼓動，作為一種鼓勵也許能促使普魯士政府（而它在這方面的意圖拉薩爾是知道的）實行普選權。但是拉薩爾能否使聯合會會員通過這種決議是大可懷疑的。當時全體民主派分子是如此地仇視普魯士政府，以至儘管拉薩爾擁有巨大的游說才能，也未必能克服這種反感。勸說會員們站在普魯士政府一邊，這同阻擋他們去支持奧古斯登堡公爵的世襲公侯權（如資產階級民主派集團所做的那樣）略有不同。但無論如何，所有這些做法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拉薩爾七月二十八日給索菲·馮·哈茨費爾特的信是以下列詞句結束的：

“好了，再見，忠實的朋友！激浪卷住了我！是預兆我將走運嗎？”

它是否會使我像席勒的‘潛水者’那樣浮到上面來呢？Faut voir. ①”

它沒有使他浮上來，而是使他沉到很深、很深的底層去了。現在在拉薩爾生活中開始了充滿着不光采的行為的新篇章。在神經遭受過度刺激的情況下，拉薩爾越來越失去內心的穩定，失去道義上的分寸感。他的行為只受一點東西，即奪得海倫這一在其心目中的目標所支配，他毫不遲疑地為此犧牲一個有信念的人所不能顧及的全部尊嚴。只有一個情況可以減輕他的過錯，在拉薩爾心目中，爭奪海倫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把她從她父母的監禁中解放出來。

海倫的雙親對拉薩爾抱有極深的成見。而在這方面，拉薩爾的政治表現起的作用倒不大，更主要的是他那唐璜的名聲和為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所供養的情夫的名聲。為了克服雙親的抗拒，要求有深謀遠慮的措施，因而拉薩爾和海倫一起制訂了如何把雙

① 等落難吧。——譯者注

亲爭取到自己这边来的大規模行动計劃。但是拉薩尔还沒来得及嘗試迈过馮·敦尼蓋斯先生的門坎，海倫为某些情势所迫已經不得不把自己和拉薩尔的关系告訴双亲。回答是断然的拒絕，父亲决絕地声称，他不願和拉薩尔有任何来往，并且，憎惡地对之极口詈罵。在絕望中海倫趁其不防，从家中逃出，立即跑到拉薩尔那儿，并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无条件地交給他掌握。拉薩尔沒有使她的双亲面对既成的事实(例如帶着她逃往法国，并从那儿爭取对他们婚姻的认可)，却把海倫領到一个和她熟悉的太太那里，接着由这位太太把她从这儿交給其四处探寻的母亲。他完全相信，由于他个人的感化力，他将很容易地克服双亲的偏見。他在极力痛罵他的母亲面前，牺牲一个爱他的姑娘来扮演一个装模作样的寬宏大量的角色。尽管海倫拚命反对，他还是吩咐她回到双亲家里去。他想以此向海倫的双亲显示自己对她的无上权力。——但是結果只是使姑娘对他产生怀疑，而双亲在其未婚夫揚可·馮·拉可維茲領走她并和她結婚以前，一直監視着自己的女儿，不让她离开自己一步。

現在，当拉薩尔失去和海倫联系的任何可能性时，他終于明白自己犯了多么重大的錯誤。在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协助下，他不惜任何代价千方百計地設法迫使海倫的双亲把女儿交出来。由于拉薩尔认为海倫是天主教徒，因而他让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到美因主教克特列尔那儿，向他提及拉薩尔在龙茨多弗的演說中对他的社会傾向給以多么热烈的好評，并請他对海倫的双亲施加道义上的影响。此外，伯爵夫人还应当轉告克特列尔，为了和海倫結婚拉薩尔同意轉信天主教。他本人則匆匆赶往慕尼黑，以便請馮·敦尼蓋斯先生的上司——巴伐利亚外交大臣馮·施倫克調解，不得已时甚至准备让汉斯·馮·毕洛夫把他介紹給理查·瓦格納，让他帮忙請求国王路德維希二世向海倫的父亲施加压力。同时其友人威廉·呂斯托夫(曾在加里波的麾下担任上校)和約翰·菲力浦·貝克尔則在日內瓦照顧一切。呂斯托夫得到以拉薩尔的代表

的身分从事活动的正式的全权。而拉薩尔在給他的一些信中最后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海倫居然从她父母家里私逃出来，就委托他作为拉薩尔在她身边的代表。这自然是中世紀才会有事情，然而却完全不符合我們現代的文明观念。

向克特列尔主教的請求徒劳的，因为海倫是新教徒。內閣大臣馮·施倫克在和拉薩尔會談了几次之后（据拉薩尔說在會談的时候还討論了政治問題），同意进行調解。他派了一个叫做亨莱的博士前往日內瓦作为自己的代表。由于他的調停，拉薩尔和老敦尼盖斯进行了磋商。这里应当提一提，在一个多星期以前海倫已經通过呂斯托夫給拉薩尔去了一封信。她写道，她“深悔”过去的行为，說“她和已訂婚的未婚夫揚可·馮·拉可維茲先生言归于好了，并重新取得了他的爱情和諒解”，說她和拉薩尔断絕了“任何关系”，并“坚定不移地决定把永恒的爱情和忠誠献给正式訂过婚的未婚夫”。在亨莱博士和呂斯托夫同敦尼盖斯先生的一次磋商中，被父亲叫来的海倫当着他俩的面宣布，她认为和拉薩尔的私人会見是毫无用处的（会見的要求是拉薩尔提出并得到两位使者支持的），她只同意再一次好好地考虑这一切。沒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是被迫这么說的。当亨莱博士和呂斯托夫把他們拜訪的結果通知拉薩尔的时候，他竟激怒到罵海倫为“下流的蕩妇”，并向其父亲和未婚夫发出决斗的挑战。老敦尼盖斯急忙躲开了，和揚可·馮·拉可維茲的决斗在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举行。拉薩尔下腹中彈受伤，經過痛苦的折磨之后，于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逝世。

决斗前夜拉薩尔立下了遺囑，其中重新談到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他为非常忠实于他的書記愛·維爾姆斯留下一百五十塔勒的年金，“作为对其正直的奖賞”，此外，在五年之内他还应当每年获得五百塔勒供鼓动之用。接着在遺囑中写道：“我建議全德工人联合会选举法兰克福全权代表伯恩哈特·貝克尔作我的继承人。让联合会不渝地坚守这一組織吧！它将領導工人等級走向胜利！”

如果就拉薩尔生活中的最后一段插曲而論，那是不能給他以贊語的。正如害某些疾病时病原体极力往外扩散，并使全身遍布斑疹一样，在这里拉薩尔身上低劣的东西占据了首位，掩盖并压倒了他身上一切美好和杰出的东西。甚至拉薩尔为达到目的而发揮的毅力本身，与其說是坚强的性格的意志力和活力，倒不如說更接近于蛮橫，这种蛮橫乃是出不了外表范围的剛愎自用的产物，这正是道德上的弱者身上所常常看到的東西。在那些成功的首領身上，这种性格上的混合物表现为凱撒狂，而拉薩尔也多少不免有这种毛病，他自命是天生的扮演凱撒的人物，特別爱把自己比作鷹这动物王国中凱撒主义的象征。他在这段时期的行为，他的演說和著作說明他仿佛失去了理智。他最后竟像瘋子（即失去了考虑周围形势的任何能力）那样責难他打算娶之为妻的姑娘的行为，他为了她无力克服他本人为她造成的困难而辱罵她。即使不相信海倫在一八七九年发表的为自己辯护的那些話，她說当时直到最后一分钟她都处在父亲的壓力之下，說在和呂斯托夫和亨萊博士會談时，她同样慑于父威而不敢暗示她是被迫这样做的——即使完全不相信这些話并认为海倫完全屈服于自己的命运，然而事情仍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任何人都沒有理由像拉薩尔那样为海倫的轉变而憤慨，拉薩尔知道她优柔寡断，知道揚可·馮·拉可維茲是多么接近海倫的心。七月二十六日她就这一点給拉薩尔写道：“我面临着—件极其为难的事情，我必須用冷酷的手去打碎怀着真实的爱情而忠实于我的一颗忠誠的心；我必須用粗暴的个人主义去消灭一个青年人的美好的幻梦，这种幻梦一旦实现，就会給一个高尚的人带来幸福，带来終生的幸福。相信我，这是異常困难的事，但是为了您，哪怕这是不道德的，我仍然要这样做。”现在由于拉薩尔本人的过错，她只好違背自己的心願听任父母的支配。她重又會见了揚可，并在双亲的逼迫下重新和他訂了婚。而假如說她甚至是完全出于真意地拒絕和拉薩尔个人单独見面，这也实在不是什么特別大胆的行动，而是完全合乎人情的。真的，只有像拉薩尔这样完

全丧失了理智的判断尺度的人，才能把海偷在这种情况下离棄他的行为看作是世界上最駭人听闻的变节行为”。在这段历史中拉薩尔的全部行为都带有病态的性质。在得知亨萊博士和馮·呂斯托夫同海偷会见的結果后他那瘋狂状态是那种步步发展和越来越沉重的病症的頂点。說拉薩尔好像是为了寻死而故意提出决斗的挑战，这是无稽的神話。恰好相反，他是想在馮·拉可維茲和这个“老逃兵”（他給急忙逃往伯尔尼的敦尼蓋斯起的外号）面前显一手。他企图为所謂对他的污辱雪耻，为自己遭到损伤的虛荣心雪耻。他失去了他那美好的“我”，并越来越失去自制地力求为其遭到凌辱的个人尊严雪耻。他雪了耻，但和原来設想的不同。死亡这一偉大的淨化器恢复了拉薩尔的名譽。当拉薩尔还在为占有海偷·馮·敦尼蓋斯而斗争的时候，与其說他像一个科学王国的工作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倒不如說更像一个具有容克作風的商人的儿子。但是当他在拉可維茲的子彈下倒下，并躺在病榻的时候，这一切消失了，而他的尸体是一具爭取工人解放的先进战士、爭取社会民主事业的战士的尸体。在日內瓦的烏尼圭教堂，为爭取各族人民民主自决权而斗争的侨民和社会主义工人們一起参加了拉薩尔的丧礼。当他逝世的消息一傳到德国，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立即为他举行追悼会，并以他的名义宣誓，为实现他所教导給他們的那些原則而繼續斗争。逝世使拉薩尔重又回到工人运动中来了。

十六、拉薩尔的生平業績

工人运动不能全盘接受拉薩尔所留下的遗产，对这一遗产加以甄別——把有价值的和无用及有害的东西区分开来——的工作已进行了很久，而且有过不少糾紛。一开始，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就为拉薩尔的尸体和他的母亲发生了爭执，在拉薩尔委托的遺囑

执行人——洛塔尔·布赫尔及霍尔特霍夫律师——和他的母亲之間也开始了承认和执行遺囑的斗争，接着在伯恩哈特·貝克尔（拉薩尔曾建議联合会让他继任主席的职位）和拉薩尔的女友及顧問索菲·馮·哈茨費尔特之間也发生了斗争。后来这种斗争变成了以拉薩尔后继者中思想上最接近于他的約·巴·馮-施韦澤（以后还加上索菲·馮·哈茨費尔特）为一方和以馬克思的朋友与信徒威廉·李卜克内西为另一方之間的斗争。在由馮·施韦澤改組了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爱森納赫派的社会民主工党之間也进行着斗争，这个党是李卜克内西联合奥古斯特·倍倍尔及脱离施韦澤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建立起来的。这一斗争对一八七五年在哥达召开的統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还起了一定的影响。起初，在关于遺囑的爭执解决之后，爭执得比較多的是个人問題和形式上的問題，后来政治策略問題才被提到首位，最后仅只剩下有待于探討的工人运动的基本理論問題。在这方面最精采的文献是卡尔·馬克思批判于一八七五年統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的信。

現在可以认为个人的和形式上的爭执在历史上已經結束。今天政治策略問題已和因批判拉薩尔而引起爭論的那个時候不同了。我們知道，拉薩尔非常喜欢和其他政党及官宪进行政治勾結。在这方面就是遭到許多非难的約·巴·馮-施韦澤也沒有超过他。因此現在、以至今后在机会主义和不妥协策略之間所进行的斗争中，拉薩尔是极易被視作机会主义精神之父的。然而拉薩尔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理論家，因此在具体場合中是否可以这样称呼拉薩尔，还是很成問題的。如果說拉薩尔为了取得普选权而在政治上向俾斯麦献殷勤，那么这里也应当看到，他是以联合会的名义去做的，他把联合会看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权把它看作自己的創造物。他建立这个联合会就是为了取得普选权。与此同时，作为它的领导人，他被赋予广泛的权力，并且他非常相信普选权的革命創造力。如果注意到这一切，那么拉薩尔的策略手段从原則观点看来是有充分根据的，对它的評价也只能以其估計的依

据之正确程度作为衡量的尺度。不管怎么样，在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中不是没有先例的。在英国，一些非常可敬的宪章运动的领袖就采取类似的策略，甚至厄内斯特·琼斯有时也毫不犹豫地接受迪斯累里的帮忙。拉薩尔的主要錯誤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

如果注意到拉薩尔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目的，那至少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使联合会具有和他的个性相同或类似的性质。拉薩尔被指责说他给工人运动带来了宗派色彩，使它充满了宗派主义的精神。然而，这是非常不公正，非常肤浅的看法。拉薩尔身上是很少宗派主义倾向的。不管他是个多么唯心的哲学家（然而，我们认为就是在这方面他也是被误解了），但作为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他却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极力教育工人参預政治，他一向把政治斗争、把建立工人政党提到第一位，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推翻说他犯了宗派主义的指责了。拉薩尔在一八六三年四月三十日给洛贝尔图斯的信中写道：“打算在沒有普选权、即在沒有实际基础的情况下实现我們的要求，——我們就会成为哲学学派，或者成为宗教教派，然而决不是个政党。”而一八六四年二月，在寄去《巴师夏-舒尔采》的时候，拉薩尔写道：“順便說說，在这本书中我力图通过个别的考察和全面的論述（在第四章、跋第二章）来证明政治和经济是等同的。無論把两者怎么分开都是抽象的概念，而我认为，我的主要力量也正在于使两者合而为一。”

再从《既得权利体系》的序言中引一段話：“法学中像私法这种看来和政治完全隔絕的地方，却比政治本身更具有政治性质，因为它在这里是个社会性的东西。”有很多这样的引文可供引证，它們可以使拉薩尔永远免于宗派主义的罪名。

不錯，对这点有人可能会反对說，在经济方面拉薩尔使运动采用一种預定的手段——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因而应该把这看作是他的宗派主义的标志。但是第十章已經指出，拉薩尔只是利用了业已存在于工人运动中的这一要求。并且在这里还可以

从另一方面证实，尽管拉薩尔热烈地捍卫这一要求，但是并不以教条主义一宗派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它，而只是把它看作实践和鼓动的場所。当时德国經濟上的落后状态使他沒能产生普遍剥夺的思想。当时也不存在工人階級进行其他的經濟干預的政治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前提。正因为拉薩尔想阻止工人們参加只会分散他們的力量的小资产階級的实验，因而他除了采纳生产合作社的綱領以外别无他法，但是，他已通过扩大这一計劃的范围而使之在实践上較少危害了，因为这样一来，它对当时現存的政府来说是更加难于接受的了。

而如果拉薩尔的运动終究长期带着宗派的色彩，那么这首先是由于它的年輕。任何世界历史性的运动在共青年时代都带有宗派的性质。和拉薩尔組織相竞争的那些社会主义組織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和那种情况下，这在很长的时间内甚至还是力量的一个因素。

只要看一看《巴师夏-舒尔采》这一本书，就能使你立即相信，拉薩尔多么坚定地站在經濟发展論之上，多么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集中的趋势。但是对这种趋势的了解一点儿也沒有解决社会应当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发展进程实行干預的問題。自由派乐观主义經濟学家說：“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問題，社会进步会随着經濟进步自然而然地到来，而竞争保证了經濟的进步。”社会主义經濟学否定了这种自动調整过程論，而我們清楚地知道，正是为了证明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自行調整現象，拉薩尔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但是在原则上这只是证明了干預、正是从工人階級观点出发进行干預的必要性。由于这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成熟程度，而在这方面，当时手工业极其发达的德国还远沒有成熟到实行甚至像英国一八四七年那样的工厂立法，尤其是还没有民族的統一，因此，首先必須爭取民族統一和民主制度，而在这两方面拉薩尔都完全像一个最好的现实主义那样来考虑問題的。由工人階級来夺取国家政权，如我已經說过的，还談不上。但是可以在教育无产階級、使之

成为一支**政治力量**上做工作，而在这方面普选权应当起有力的促进作用。

很难设想，拉薩尔会随着运动的增长因偏爱生产合作社而反对工人阶级的其他改良要求。可以举他对待結社权要求的态度为例。根据英国的經驗，他对工会所抱的希望很小。但是当柏林印刷工人刚一提出結社权的要求，拉薩尔就立即站到他們那一边去了。暂时他只把它当作鼓动的手段（参看龙茨多弗的讲演）；但毫无疑问，他是会继续前进的。他直截了当地把这一运动看作是工人的阶级运动。龙茨多弗讲演中说：“請看这儿鼓动在工人中間所喚起的阶级觉醒的结果。”还说：“我们的原则就是如此确实的空中楼阁！或者說得更明确一点，在下列程度上我们的原则是**现今社会实际关系的简单再现**，即由于这些关系的影响，这些原则必然会产生，并因而甚至在那些对我们的著作和我们的活动没有一点概念的工人中間出现。”只有最严格的唯物史观論者才能写出这样的话来。

因此，把拉薩尔描繪成是和馬克思及恩格斯相反的一个法学思想家，說他把一切問題都简单地解釋成法学問題，并且对他來說一切問題都是单纯的法学問題，这种看法是极端錯誤的。这样看問題是极端片面、极端肤淺的。拉薩尔无疑是个法学家并經常采用法学的語言。同样，諸如**国家**这样一些机构在他看来与其說是具体的力量对比的表现，不如說是个法学概念，或者是一种法律設施，并因而常易于以过分的贊美。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很好地懂得法学和实际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区别，懂得它們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不同。我們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他的长处。归根到底，只要人們还生活在广大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之中，那么其經濟关系上的任何变动必然会轉化为法权上的变动，或如拉薩尔有一次所說的，**在法权和經濟发展之間存在着互相适应的关系**。因而，只要記住存在的联系（而拉薩尔并没忘記这一点），法学的观察方法就有其存在的充分根据。这有个好处，能防止简单化的經濟主义。在这方面甚

至在今天好多人还可以从拉薩尔那里学到某些东西。

不仅仅在这一个方面而已。不錯，我們时代的实践和理論把他的經濟綱領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但是他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能有力地激发和丰富社会主义思想。誰也沒有像拉薩尔在其《巴师夏-舒尔采》中那样清楚、动人、深刻地說明了偉大的社会联系。誰也沒有像拉薩尔在其《工人綱領》中那样通俗、那样激动人心、那样充滿激情地描繪了工人階級的政治使命。通过間接稅制度掠夺工人階級，关于这点我們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比拉薩尔《間接稅和工人階級的状况》的讲演更确凿有力的論证呢？关于国家机构和社会力量对比及社会經濟结构的联系，难道还能比拉薩尔的小册子《論宪法的实质》說得更精采、更透彻，甚至連最普通的人也能完全了解的嗎？我們还可以举出一大批拉薩尔的著作，它們至今保存着生命力，至今仍然值得一讀。

之所以值得一讀，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內容，而更多的是由于它的形式。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拉薩尔的某些著作就形式而論，即从结构和語言的角度看来，仍然是无与倫比的杰作。在这方面，拉薩尔强烈的爱美感帮了他很大的忙，不过这种爱美感也常常使他过分关心自己的外表修飾，使他变成好穿戴、爱打扮的人。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沒有任何装腔作势、过于雕琢的东西。其語言优雅純朴，毫无陈詞濫調，因为它赋予丰富的思想以真正艺术的形式。当拉薩尔使用形象的說法时，他的比喻总是很貼切的。你从其他任何人那儿也不能找到像他那么多深刻而形象的詞句。

但是今天最强烈地活在我们心头的还是拉薩尔向工人证明普选权的意义的那些演說。当然，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要求的人。为了不至于扯得过远，我們只指出，这一要求是宪章运动派的旧口号；一八四八年的法国改良派也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而拉薩尔于一八六二——六三年間在德国举起的普选权旗帜只是接受了他們的这一要求。他的特殊功績在于，正当全世界的民主派对普选权已經灰心失望之时，他举起了这面旗帜。某些不良的选举沒有使

他迷惑，而他比其他人更銳利地看清了选举权的教育和創造作用。如果說今天在德国有了普选权，我們是否能忘記拉薩尔在这方面为德国人民所起的作用呢？無論如何，如果拉薩尔沒有深入研究这一問題，如果他沒有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那么俾斯麦在一八六六年是否会实行民主的选举权，是大可怀疑的。选举权如何有力地促进了工人运动，从社会民主党的利益看来，它在德国引起多大的反响，它在德国国外起了什么样的教育作用，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嗎？要是沒有选举权我們現在会立足于何地呢？自然，我們还会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经济发展会促进它。但是我們未必会有如此强大、如此統一、如此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拉薩尔的独特想法为工人階級作出了最大的貢獻。即使拉薩尔再沒有任何其他的功績，那么单就这一点工人階級就应当珍視他的名字，就应当永远不忘记他。而目前尤其是这样。目前，正当那些企图重新剝夺工人选举权的人在到处叫嚣的时候，拉薩尔的世界历史性的偉大功績特別鮮明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当时他以坚强的意志滿腔热情地領導了初期的德国工人运动，并向工人們发出了下列号召：

“直接的普选权，这不仅是你們的基本政治原則，而且还是你們的基本社会原則，一切社会援助的基本条件。”

願工人們牢牢地記住并卫護斐迪南·拉薩尔留給他們的这句遺言！

第二版跋

拉薩尔和布尔什維主义

十五年前，当我写完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时，誰也没料到，有朝一日竟会有社会主义者宣布民主选举权（拉薩尔要工人把它看作他們的基本社会原则）无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并为了一个由工人、职员等组成的苏維埃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而将它当作廢物棄置一旁。然而，自一八六六年德国工人系统地利用民主选举权以来，它的社会力量是如此显著，不只一国又一国的社会主义者把争取和利用民主选举权当作它们的任务，甚至最初对此表示冷淡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再輕視它了，由于德国工人所取得的成就，他們对它的評價越来越高了。最后，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为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所写的序言中说，德国工人已經懂得将选举权从一种欺騙手段轉变成解放工具。

假如沒有社会民主党的議会行动（社会民主党一直把系统地利用选举权作为这一行动的基础），实行德国工人保險法^①（許多年来它曾是立法中最进步的一种）是不可能的，这是众所周知，甚至連俾斯麦也公开承认的。虽然每一次选举都遇到軍国主义国家制造的重重障碍，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和一般社会影响，反动势力面对选举制度越来越束手无策了。

然而現在出現了一些人，他們认为这一切都被证明是没用的，

^① 指一八八三年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疾病的保險法、一八八四年通过的意外事故保險法和一八八九年通过的老年殘廢保險法。——譯者注

他們宣稱俄國社會主義者中的一派(布爾什維克)所宣布的工人蘇維埃專政是無產階級解放的唯一的有効手段。如果按照馬克思的看法(《資本論》前言)落后的國家應該向先進的國家學習,那麼現在他們認為,西歐各先進國家應從某些仍然十分落后的東歐國家那里吸取社會政治行動的方法。

我認為在這篇進行社會主義宣傳的文章中,對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和匈牙利的實踐活動進行批評是不適宜的。這方面還是讓經驗去判斷吧。問題在於對新的教義加以理論考察。只要問一問是什麼原因和需要促使俄國社會主義者中的這一派別拒絕普選權的,那就顯而易見,藏在這種觀點背后的不是別的,而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科學社會理論的最重要原理的背棄。這一學說認為先進的人類社會是一種受一定的发展規律支配的機體,它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在它的生命過程的基礎上的變化完成之後繼續發展成一定的新形式,而不能任意地使之變成任何一種形式。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先決條件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由此而獲得發展的現代無產階級的高度成熟。這裡存在着因果聯繫。隨着資本主義的向前發展,無產階級的數目和社會作用也在增長,並最終將成為社會中的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使命是執掌政權,把它從資本主義的改變成社會主義的。

一旦成熟到這種程度,普選權就會並且必然會加強工人階級的政治力量,並保證其思想意識在公眾生活的各个方面起決定性的影響。恰好相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越是落后,普選權就越無法保證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對這種多少是來自臆性的意見,過去西方國家的一些社會主義者是抱否定態度的(如果他們不是干脆棄之不顧的話)。歸根到底,布爾什維克的做法是和這種觀點一致的,他們無限期地禁止普選權并用階級選派代表權來代替普選權,但是這種階級選派代表權並不給予全體無產階級,而只給予居民中被挑選出來的若干部分和集團。他們以此在事實上承認,俄國的社會發展還根本够不上實現社會主義社會。

現在，布尔什維克想要通过坚决的干預把这一发展温和地提高到所需要的高度。然而，这样他們必然違背馬克思的学說去寻找人为的方法，而不是在社会生活和工人解放斗争的现实需要中去寻找社会主义政策的必要措施。他們必然退回到馬克思主义以前的那种社会主义的空想方法中去。同时在經濟政策中他們和拉薩尔的境遇也是相似的。我們已經看到，拉薩尔由于接受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形成的还是半烏托邦的社会主义者所臆想出来的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的計劃，而陷入了多么矛盾的境地。国民經济中的苏維埃制度，如布尔什維克早已宣布的，和这种生产合作社的計劃內容极其相像。在这儿被叫做“工人——工厂的主人”的，在那里则被称之为“工人等級——它自己的企业主”。只是拉薩尔的邏輯比布尔什維克强一些。他想把企业主的权利和利益交給工人，同时也給以經濟上的**义务**。他沒有荒謬到把权利和义务分开来。我們在他給洛貝尔图斯的信中看到，他是多么地确信，生产合作社还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在实际政策中他把重心放在爭取普选权的斗争中并对工人說，一旦取得了普选权并且在議會中取得了相应的席位，那时就会对实现这一思想的适当形式提出詳尽的建議。在这一点上他提出的計劃至少在原则上又是烏托邦的，他把选举权看作有組織的行動的保证。布尔什維克拋棄了选举权，因为对他們來說有組織的发展进程是不适用于政治的。然而事物的邏輯胜过統治者的任何暴力。当暴力和发展的規律相矛盾的时候，它只会破坏而不会一致地为进步服务。而布尔什維克就是这样。它的經濟政策和社会政策是由尖銳的矛盾組成的：极端的社会主义和赤裸裸的东方暴君专制并列。只要不及时发生轉变，就必然会成为一個十足的畸形儿。

現在布尔什維主义的主要部分已經是軍国主义，它使人想起土耳其过去揚尼恰尔^①无法无天的情形。官僚机构同样无限地增

^① 揚尼恰尔——土耳其的近卫軍（一三二八——一八二六）。这个词常被用来表示凶暴的討伐者、劊子手和人民自由的扼杀者。——譯者注

长。寄生现象有增无减；相反地，减少的却是生产以及与此相連的人民福利。違背社会主义的要求的现象出现了，而这正是完全紊乱地处理经济问题的必然结果。不是指责布尔什维克想成为激进分子，而是指责他们想在进攻中，而不是在科学地有区别地对待事物中去寻求激进主义，他们在早期的、自然道德化的和形式思辨的社会主义面前干脆抛棄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巨大进步。他们从这一学说中抽取了对资本主义剝削倾向的批判，然而他们忽视了其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必要性的强调，即不承认资本主义企业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所担当的经济职能，因而竟致直接抑制其有效地为文明进步創造基础的这种职能。与对企业主阶级的历史职能的这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所宣布的取消企业主的选举权。选举权不应当是普遍的，以便使企业主不能参加选举。如我在另一个地方所指出的，这种措施只有在企业主的人数仍然多到其选票足以在国内建立一个为其阶级利益服务的国民議會的情况下才勉强具有意义。然而这却是一个国家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的最确实可靠的标志。一直这么规定的阶级选举权会縮小选民的眼界，并且和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相矛盾，而领悟其全部奥秘正是斐迪南·拉薩尔的特出优点之一。

附 录

拉薩尔致筹备工人代表大会 的萊比錫委员会的两封信

一、拉薩尔談他的发展过程和 对工人运动的态度信

柏林，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①

尊敬的先生們，

首先請原諒沒有及早給你們回信。說實在的，这个星期从早到晚我都忙于处理极其重要而迫切的家務，一点儿閑暇都沒有。

我完全了解你們在信中所闡述的观点。你們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到愉快和欣慰。在談严肃的事情时用不着通常礼貌上的客套話了，因此对你們的那种信任，我的简单的回答是：如果我不配得到这种信任的話，我就不会接受它。

这里应当简短地談一下至今我对工人党的态度。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七年我住在杜塞尔多夫，在那里我取得了萊茵工人的极大信賴。一八四九年在陪審法庭上的演說就是我当时最早的一项活动，这篇演說你們手头是有的。甚至在曼托菲尔·威斯发倫·亨克尔代的殘暴統治时期我也沒有停止过这种活动。在我的住宅里，我向工人們作过报告，他們为了躲避当时猖獗的追捕曾在我

^① 拉薩尔致达麦尔的第一封信（柏林，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是对邀請參加“前进”协会成立大会的致謝信。他沒能接受邀請，他在信中说：“但是我希望几个月之后去萊比錫，那时將有机会爽光一下协会生气勃勃的工作。”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初达麦尔又写給拉薩尔一封信，这是萊比錫工人代表同拉薩尔初次眞摯的联系，上面这封信就是拉薩尔的答复。达麦尔的信不詳。——昂肯注

这里得到过保护和帮助。如我今年夏天在访问杜塞尔多夫的时候所确信的，直到今天莱茵工人对我热情而亲切的怀念仍然没有消失。

自从我迁居到柏林（一八五七年）以来，我的主要目标就是在科学中探寻革命和社会的原则，并且为这种原则奠定一个有科学根据的牢固而不可摧毁的基础——对于它的实际实现来说这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虽然是十分缓慢和逐渐发生作用的条件——，同时在必要的时候用传单的形式向人民散布更为直接的政治影响。

一八五七年底我发表了一部关于希腊哲学（《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之后，便开始从事这种活动。这部著作虽然同我的实际目标仅仅具有间接的联系，它展示了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哲学的发展就是世界上自由意识的发展——然而从德意志民族的学术和理论著作的广泛意义上讲，它对于社会原则的一位倡导者来说，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基础。

随后，一八五八年我发表了《弗朗茨·冯·济金根》，在这个剧本中我用美学的形式证明了德意志国家现在瓦解的原因在于农民起义确实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由新教建立起来的公国制度。

一八五九年，意大利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现在随信给你们寄去几册。

过后不久（一八六〇年）我在《民主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费希特给国人的政治遗嘱》的论文，指出自由主义运动的空虚、虚伪和徒劳无益。同样，在该学报一八六一年第二册上我还发表了一篇论莱辛的文章。

通过社会原则及其科学的实施和发展去征服科学必将使社会原则主要在法学和国民经济学这两门科学中得到实际的实现。

我相信，在法学方面（这两门科学中的第一门）我已经通过一八六一年在莱比锡由布洛克豪斯出版的《既得权利体系》（两卷本）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是一部探讨法学中最深奥的部分的内容丰富

的著作，它使民主和社会原則彻底地贯彻于法学領域，并且通过科学所固有的那种緩慢、然而强有力的影响对工人等級发生良好的作用。但是，它对于工人來說自然是不易懂的。

不过我将在这方面单独附上一个較詳尽的注釋（第 259—266 頁），以便使有思考能力的工人能够完全掌握住其中的要点，使你們——你們已經了解著作的某些主要思想——进一步認識它同工人事业的联系；最后，它还同时严密地闡述了經濟領域的任务——其中还同时包括其解决原則。^①

如果你們仔細地讀过有关的地方，你們就会确切地了解，我对运动的最終目的的看法。

目前我从事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著述一部国民經济学，我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部著作来征服經濟科学。这部著作只能是上述原則的严密的科学論述。經過了十六年的經濟研究和准备之后，几周前我已經开始写作。

不久，由于起訴而中断了这一工作，这次对我的起訴是由于你們大家都知道的我的工人小册子而引起的。

一月十六日我将在地方刑事法庭上对于这一控告作出答复，这篇辯护詞随后我将以《科学和工人》为题立即发表出去，目前我正忙于这一工作。

这一攪扰一旦消失，我将立即从事經濟著作。但是这一次我决定采用每个工人都能理解的形式，使之适合于向工人讲解——这是一項极其艰難的任务——，因此我无法預料何时可以完成，也許只需要六至八个月，也許甚至要花上三年的时间。

你們知道我論費希特的演讲以及論宪法实质的小册子。現随信附上几册。

^① 这篇著名的注釋闡述了法哲学的綱要，即试图从对个人私有财产范围的逐步限制上去解釋法历史的文化历史进程，并从这里看到人类自由的积极发展。至于經濟发展的相应趋势，只是略略提了一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拉薩尔一直把这一綱要作为法权的初步基础。——昂肯注

我的《尤利安·施米特》，你們用不着去讀，因為我所反對的瘟疫幸好並沒有在工人等級中蔓延開來。

我之所以告訴你們這些概況，是因為最簡單的和最好的保證就是出於同一種不可動搖的堅定的信念而進行的十六年來的辛勤的科學活動，我可以鄭重地告訴你們，我正是以此獻身於工人事業的。

我認為值得尊敬的首先不在於辛勞，說得更明確點，十六年來我一直遭到政府迫害，但是在任何一次衝突中我從沒有退讓過一步。

因此，我認為我是符合你們向我提供的地位的要求的。總的來說我準備履行你們提出的要求，並且準備從事工人運動的領導工作。

同樣，為了進一步會談我準備前往萊比錫，但是這個月不行了。之所以不行，是因為我在審判之前，即一月十六日之前，不能夠離開柏林。我必須在這次審判中使政府遭受一次決定性的道義上的失敗，為工人的事業作出一次巨大的道義上的貢獻。此外，種種學術活動占去了我的時間。我現在需要養精蓄銳，以迎接一月十六日的戰鬥。

但是，即使我可以把這些放在一邊不管的話，那麼我還是認為有必要讓舒爾采-德里奇先生在我之前發表意見。關於這一點，你們早些時候給列威^①的信中所闡述的是完全正確的。

此外我還要指出，假如我早先已經向工人運動表示了正式態度，那麼舒爾采-德里奇先生根本就不可能再被邀請了。首先我的責任是保持我的名字的純潔性，不准它同舒爾采-德里奇政治流派的人物——我指的是他不久前在法蘭克福的演講——混在一起。

下次來信時請告訴我，你們希望我什麼時候去萊比錫。但務

^① 路德維希·列威是當時和拉薩爾交好的一个廠主，他使萊比錫的代表們首次同拉薩爾建立了聯繫。——昂肯注

必及早通知我，因為你們不只希望面談並且還希望聽我作報告。

此外，我認為最好是在我的報告中闡述一下運動的**當前實踐**目標及其手段。我的行動既要小心謹慎，也應當**勇敢而堅定**。

謹致敬意並握手

你們的斐·拉薩爾

注意：達麥爾博士收到瑞士出版的工人小冊子了嗎？此外，不言而喻在這封信里你們同樣可以看到必要的謹慎，正如你們所期待的那樣。

二、拉薩爾關於《公開復信》和 檢驗工人成熟程度的信

柏林，一八六三年三月十三日

親愛的達麥爾，

雖然我一直還沒有從維甘特那兒得到小冊子（這次印刷的時間特別長），然而我還是決定現在就給您寫信，這樣可以避免最少的耽擱，以便隨後一同寄出。

首先請您把跟這封信一起寄給您的小冊子（《公開復信》）**仔細地、反復地讀**。您會發現，為了使它成為一只破冰船，我已盡了一切努力。困難確實很大，甚至我也曾懷疑過，是否能完全克服這些困難。我需要再進一步研究經濟資料，這方面材料之多遠遠出乎我執筆時的預料。我還必須深入探討，因為我感到，如果不使工人了解自己的經濟狀況，如果舒爾采-德里奇或者其他任何一個空談家還能以甜言蜜語欺騙工人的話，我就會一事無成。問題在於使工人們從內心堅定起來，不僅能反對舒爾采-德里奇已經說過的，而且反對他還可能說的，問題在於一勞永逸地使他們具有自己去駁斥人們打算用來欺騙他們的一切。

另一方面，我自然決不能在一封簡短的信中寫出一本國民經濟學的著作，也不能對國民經濟學的作用進行詳細的探討和分析。

因此，关键在于抓住某一固定不变的、无可争辩的一点，并从此出发，根据需要让工人了解全部问题。

最后，在阐述时需要非常明白易懂。应该把事情写得和阐述得让每个工人（不管他对国民经济学知道得多么少）不仅能完全了解，而且当他读了一遍或数遍之后能够感到，好像这一切他从来就是懂得，就是这样想和这样说的！

这就是我给小册子提出的要求，我想这样已经够了。舒尔采-德里奇和他的整个观点出现了缺口，他的全部货色已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一切幻想被消除了，形势的严峻法则被无情地揭示出来了，并且最后给了工人们个改变这种形势的既简短又实用的口号和公式。

为了这个缘故，我所遇到的仇恨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我了解得十分清楚，我的一些好友们因而劝我别干，或者对这些现象感到不安。我对这些都无动于衷。讲出真理，讲出无情的、赤裸裸的真理，这是我的义务，我也这样作了。其他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对我来说，资产阶级仇视，以至它愤怒得想吞掉我，我都不在乎，但是在工人中的影响，对我来说却不是无所谓的。对我来说这本小册子将是一个检验工人等级成熟到何种程度，或者尚未成熟的有决定意义的试金石。由于小册子是针对一种原来已经存在的运动而写的，如果工人等级不是十分迟钝和没有头脑的话，它必然会产生像一五一七年张贴在维登堡教堂门口的 Theses^① 那样的影响！如果它不能在工人等级中起巨大的鼓动作用，那就充分证明对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这本小册子所能达到的鼓动作用，自然是完全取决于其销售量之大小，而且也应当以这一点来衡量。为了使它能最广泛地传播，我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我已经同出版商商定，卖给工人

① 论纲。——译者注

的價錢為每冊一個銀幣。這是少有的事，因為它有两印張半之多（不錯，出版商和我原先以為只需要一印張半）。相反地，外面書攤上的價格却要貴得多，我估計要五至六個銀幣。因為您答應在工人等級中散發，所以每冊也給您按一個銀幣計價。我已經指示維甘特立即郵寄給您二千份，您按此價付錢就行。如果今後還需要的話，您還可以按此價從克勒爾那里得到二千份。總共印了一萬到一萬二千冊。如果六個月以內還不需要再版的話，我還是認為這是個很大的失敗。我想——請順便告知有關詳情——您在南德也有必要的人情關係，可以將大批的小冊子寄往那里，以每冊一個銀幣的價格在該地群眾中出售。由於工人們不通過您就必須以無力支付的高價（五個銀幣）購買此書，所以您立即在各地細致和廣泛地組織發行，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只有杜塞爾多夫行政區的發行工作我已委託給那里的一位老相識了。維也納的情況如何？您在那里沒有人情關係嗎？在那里的工人中間散發是**十分必要的！**

請您將這一切寫信告訴我。

下一步就要看萊比錫中央委員會如何處理這本小冊子了。如果中央委員會在正式文件中向一切有關的工人協會提到和宣布贊同這一著作，從而將之奉為**運動的正式宣言**，我認為這是合適的。顯然，這也是委員會要求我寫這篇東西的目的和意圖。現在應當極力設法使這一意圖得以實現。

現在我就談談您不久前提出的問題，即我是否願意接受萊比錫人選我為即將召開的籌備會議的代表。對此我答复如下：

1. 萊比錫人的選舉將使我感到滿意，並且我認為它是有益的。
2. 同樣，如果您也能使其余的**尽可能多**的工人協會推選我作他們出席籌備會議的代表的話，那也很好。
3. 然而不管是萊比錫的還是其他城市的當選證我都不接受，我將在一封公告信中婉言謝絕，其原因是，現在我已經向工人們闡述了我的思想和綱領。接受與否，那是他們工人自己的事情，是他們在理論方面的自由信仰問題。在這裡，在這一點上為了使他們

自己去判断，我不便于对筹备会议加以个人干预。否则，我出席的筹备会议所制订的每一项决议会被看作纯粹是我个人的影响和优势所致，而为资产阶级所诋毁和贬低。

这样人们会试图把德国工人的伟大事业和伟大运动降低为某个人的鼓动和名人的影响。因此我个人必须避开现今尚在激烈争论是否赞同我的纲领的筹备会议。如果我不出席，而会议通过了我的纲领，这就表示这些原则是他们自己的，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收获！然后，如果协会主席团委托我的话，我就可以和现在阐述时一样坚定不移地在大会上实施这些原则。但是，假如工人们因名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小册子里面提到的理论发展方式——决定接受这种思想的话，我认为这是一种名人的教唆。您在最近一封信中说，如果我不出席，会议就会被舒尔采-德里奇所控制！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着，我才将宣言作为武器和绝对的手段发表出来。如果工人已经成熟，这就必然会粉碎舒尔采-德里奇的阴谋。在筹备会议上我只能将这些东西再重复一遍或者进一步加以阐述。如果工人们已经成熟到能够接受的程度，那么这里已经给他们讲得很清楚了，他们一定会看得很清楚，舒尔采-德里奇就再也不能遮住他们的眼睛了。

其次，用不着我个人的继续参预，我在宣言中阐发的思想就可以在工人会议上战胜舒尔采-德里奇。这一点，如果我来领导运动的话，恰好是我能作出一些有益和合理贡献的唯一客观保证。您想一想，如果我的思想在筹备会议上之所以取胜，不是由于工人已经掌握了它，而是由于我个人的名望和语言的热情有力才击败了舒尔采-德里奇，这样，我不就是在自我欺瞒吗？当我背后仅仅有一些暂时被我的语言所打动的人们时，我却认为我背后有一批观点上和我一致的群众。我将认为在我背后有一个独立的运动，而我只是它的有觉悟的表现，其实，我所有的只是我自己活动和努力的影子！这样的运动一定会以 Blâme^① 和软弱无力而告终！不，如果

① 责难。——译者注

我将领导你们并且从事你们的事业的话，那么我必须证明工人们具有这种思想基础，这些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不再需要我个人参预，就知道他们应当如何思想。这样，我就能怀着某种信心去干起来。否则，由于工人们还没有成熟到照我的看法去进行实际鼓动的地步，因而一切都会是空话和无稽之谈。而为了工人的利益我倒不如回去重新进行理论研究和宣传，这样好处倒大一些。

如果必要的话，我还要在表示拒绝的信中发挥这些理由。然而选举还是使我感到高兴，特别是如果它能在尽量多的地区举行的话，因为在目前，在宣言发表之后，这是工人的一次重要的公开宣誓和示威。

现在说一说三天以前我在《科堡工人报》上读到的瓦尔泰希所干的令人不快的事情。瓦尔泰希（替我衷心地问候他）在德累斯顿干了一件轻率的蠢事。不错，您会说，他要求的只不过是宣言中所要求的东西。不错，您会说，他要求的只是当您匆匆地离开我的时候（馮·普菲尔将军已经在场）我当作 mot d'ordre^① 向您宣布的要求，这个口号我在给工人的信中将要提到。然而，提出一定的 mots d'ordre，不能是没有根据的，而应当把它和详尽的论据一起发表出去。因此，瓦尔泰希倒不如干脆不提这些事，留下让我的信来处理。

然而，这还是小事。严重的是，不管瓦尔泰希多么有理，他却干了件大蠢事，一件可能是十分有害的蠢事：当时他攻击了社会自助，声称这种做法毫无意义。

这是极其愚蠢的，因为

1. 社会自助是完全正确的事情。而只要它是正确的，无论是瓦尔泰希还是我都不应当反对。

2. 人们永远不必徒劳无益地去反对毫无内容的老生常谈（“社

① 口号。——译者注

会自助”就是如此)。

如果我们说：**社会自助毫无意义**。我们就是把小孩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没搞清楚问题的所在。相反地，我们倒应该说，我们想要的正是**真正的社会自助，是实际的和正确的社会自助**。而且也确实如此。

您将会看到，我在我的宣言中已极有预见地(因为这份宣言是三月一日，即在瓦尔泰希的事情发生和我获知以前寄往印刷所的)阐述和着重指出了这一点。这是十分自然的！要预见舒尔采-德里奇针对我提出的口号，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从对手那里事先夺走这一口号，使他不能去利用这一口号，当时我曾指出，它对我们来说已毫无害处了。正当我准备将之付印的时候，瓦尔泰希来了，他说：这一口号是对我们有害的，我们所想要的东西自然是同社会自助对立的，因而，它是毫无意义的！

十分有害！我简直不知道我个人的能力现在是否能挽回这件蠢事的影响！如果我写宣言的时候多少知道这件事，那我就会对这点作更详尽和周密的阐述。现在已经晚了。自然将会产生许多猜疑，甚至会說：我只是以才干为装饰，瓦尔泰希虽没有才干，然而却是诚实的。这样，这个损害就可能是**长期的**。

您要牢牢地记住，并到处宣传宣言中所要求的(可以说是)mot d'ordre, **也就是正确的社会自助**。社会自助的原则是十分正确的，而这些要求正是根据这种原则提出来的，并且是同它完全一致的。这就是社会自助。是的，只有这样才是社会自助，因为舒尔采-德里奇所想要的根本不是什么社会自助，而只能是个体自助。社会自助只能是前者。这一点必须到处宣传！瓦尔泰希必须本着事业的利益——对他来说重要的确实仅仅是这一点——亲自发表更正的声明，必须收回他在德累斯顿的那篇声明，并且承认他只是暂时的糊涂，说出了根本不是他所想说的话等等。

好，再见！现在我等待着您不断地寄来有关我的宣言好的或者坏的结果的报告。不久前您在致列威的一封信中说：“工人运动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衷心地问候您

斐·拉薩尔

又及：为了争取时间，我还是决定在得到宣言之前把这封信寄给您。您礼拜天去維甘特印刷所（罗斯广场三号），以我的名义让他给您一份，那时一定印妥了。这样就赢得了两天的时间。

船山学社
PDG